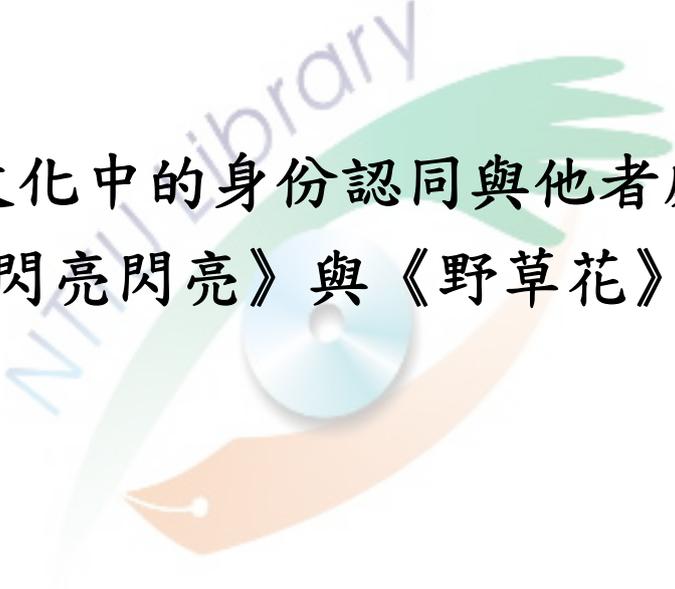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玫瑛 先生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
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



研究生：劉忠岳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
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

研究生：劉忠岳 撰

指導教授：吳玫瑛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劉忠岳 君

所提之論文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陳淑芬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郭建華

吳玫瑰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國立台東大學

-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96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吳文瑛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劉忠岳 (親筆正楷)

學 號：9500106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15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96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以《閃亮閃亮》與
《野草花》為例

指導教授： 吳玫瑛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
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
得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
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
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劉忠岳

簽名：劉忠岳

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15 日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 以《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

摘要

後殖民論述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反動，除了不再服膺於霸權之下，藉由自身對於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身份的自覺，讓外界知道過去這段被忽略的聲音和身影。這些也含括了一群特殊族群的生活經驗，也就是移民族群。移民族群在歷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有著不同的歷史故事與脈絡。這一波特殊的移民背景，正是後殖民論述傘下的離散文化所要探討的主題。

離散一詞是源自希臘文，橫跨到另一個地區耕種或生活的意思，換句話說，即沒有根的家。《閃亮閃亮》和《野草花》兩本文本的解讀與詮釋，是從日裔移民族群在美國社會的生活經驗，從跨國移民族裔的觀點探究——在寄鄉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具體而言，探求出離散文化中離散人的身份認同。在身份認同的部份，經由米食文化的延續、語言命名的採用、私人物品的表徵，發現不同世代的離散人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建構的表現；於他者處境的部份，是由白人主流社會中，觀察到種族主義的不平等對待、族群弱勢的生活層面問題、國家認同與忠誠度的猜疑、以及跨文化身份所面臨的抉擇產生的尷尬狀態。離散族群在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相互影響下，觀察族裔身份混體現象、家與族的歸屬感，以及他者身份的異國生活狀況對身份認同的發展。

在論文的最後，總結文本中離散人的身份流動與定位面向，作為回答離散人的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的論點，並延續至離散氛圍對於兒童的童年影響；最後梳理出四項啓示課題為：多元和同化之間的身份尋找、文化價值的判準、種族主義妨礙多元文化的發展、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挑戰。

關鍵詞：後殖民論述、離散、混體、他者、身份認同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and Status of Otherness

Within the Diaspora Culture:

The Instance of *Kira-kira* and *Weedflower*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postcolonialism is concerned with what exists and happens after the end of colonial and imperial rules. It does not yield to colonial hegemony anymore. It turns out to be by all means of presenting awareness of self ow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for the sake of showing the images and shouting the voices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ges. This includes a group of distinctive people called immigrants.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 has been out there all along. Different groups of immigrants have their own story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Therefore, immigrants' issue will be in association with diaspora culture. This is what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word Diaspora i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Greek, and refers to life across two areas. The research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 texts *Kira-kira* and *Weedflower* are centering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s in America and focusing on the cross-nation ethnic identit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xploring the story context of the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tatus of other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self-identification is portrayed through the continuity of rice eating culture, the use of naming language, and the symbol of personal belongings, which three demonst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self identification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As for the status of otherness in the Caucasian-domination society,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unfair treatment, the everyday life of ethnic minority issue, the

suspicion of n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loyalty, and the contradiction and embarrassment states in cross-cultural identity are observed. Also the hybridity of ethnic identity, the belonging of family and clan, and the roles as the others in oversea life sit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development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interrelation of the homeland, host country, assimilation, hybridity and otherness for immigrants.

This thesis concludes with two possible answers, shifting identity and identity position, to the very first questions raised concerned how a diaspora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and how a diaspora role as others is challenged. The researcher's personal opinion is given on discussion of the diaspora space impact upon childhood. Finally a conclusion to collect four further thoughts are inspired, which are a) the identity pursuit between multi-society and society assimilation, b) the criteria of culture value, c) racism hamp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e, d) and the obstacle and promotion of multi-culture education.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diaspora, hybridity, otherness, self identification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本介紹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11

第貳章 離散文化

第一節 離散的歷史脈絡	14
第二節 離散文化中的身份影響範疇	17
第三節 離散文化的特質整合	25
第四節 離散文化中找尋認同	28

第參章 閃亮閃亮

第一節 米食文化與身份認同	32
第二節 語言命名與身份認同	42
第三節 他者的區分與不同命運	51
第四節 離散族裔的弱勢身份	61

第肆章 野草花

第一節 私人物品與身份認同	65
第二節 弱勢族裔之間的互動	72
第三節 國與族的忠誠度展現	80
第四節 離散身份的跨文化尷尬	87

第五章 總結

第一節 離散文化概括重述	91
第二節 離散文化下的童年友誼	96
第三節 離散文化他者論述的啓示	100
註解	104
引用書目	105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閱讀，是一個滿足自我的好奇心，增廣見聞的來源，激發啓示心靈的活動；閱讀小說，則隨著故事情節高低起伏的發展，角色情緒的變化，在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編織後，讀者從中得到閱讀的樂趣與精神上的洗滌；閱讀青少年小說，是少年與青少年讀者先行探視未來階段可以學習的方針，也是成人讀者重新回憶過往檢驗審視自己與彌補遺憾的新契機。生活中面對眾多現實社會的限制與壓力，閱讀小說可以是將心中的渴望、夢想、遺憾寄託在其中，透過文字帶來的樂趣和洗滌，解除與分擔隱藏在心中某個角落的壓抑與憂愁。

以目前台灣的童書出版市場趨勢而言，青少年小說，在兒童文學文類的範疇裡，是可與繪本並列為市場走向的大宗。今日的台灣出版概況，以青少年小說為例，外國翻譯作品佔了極大的比例，相較於此，對於屬於本地的色彩，出自本土作家的創作，包括描述台灣的地貌、風俗、乃至於地方文化等內容，則寥寥無幾且多半處於遺漏的狀態，而使得小讀者們對自己本土文化、價值、和意識感到陌生與疏離，甚至愚昧的推崇並追求異國文化。

將視野觸角伸入並認識各種異國文化，固然是鼓勵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和發展，然而今天出版市場觀察到書籍的概況上，大量的翻譯書籍對比之下，市場上鮮少台灣本土作品，無形之中，透過大量讀者的閱讀，文化殖民的勢力，悄悄地深植人心。林文寶在〈台灣的兒童文學〉提及：「在多元的吊詭中，我們看到的仍是殖民文學，而非後殖民文學」(40)。這樣的現象確實將讀者的角色放置於被殖民的位置，深深影響著讀者對台灣文化的認識，並且可能導致單方面錯誤的內化思維，並且以殖民者的觀看角度批判與看輕自己固有的本土文化。

因此，這樣的出版與文化產生的現況與氛圍，引發研究者欲探求文學文本，

如何可能在有意或無意的殖民意識中，尋找出遠離權力的中心宰制，以及陳述過去殖民霸權時空中被忽略和遺忘的聲音與經驗。

2007 年的春天，2000 年紐伯瑞金牌獎《碎瓷片》(*Single Shard*)的作者琳達·蘇·帕克(Linda Sue Park)蒞臨兒文所，經由她的演講與對談，從中瞭解到其身為亞裔美國人的背景，以及亞裔族群在美國社會位置為何。但在其得獎作品《碎瓷片》裡，此故事是以古代韓國為背景，並無提及作者身為移民的訊息。此本作品則是介紹一種韓國的當地色彩，在閱讀上，提供非本國讀者的異國情調。關於此點，引發研究者思考——在紐伯瑞得獎系列作品裡，是否有書寫與提及亞裔移民至美國的相關故事？其故事所要傳達的意圖為何？其中不同文化價值觀是否就是多元文化，抑或是特有的族裔文化？在多元族裔的美國，少數族群的發聲，是否想藉此文本發行的機會，表達該族群對自身處境與生活的聲音呢？或者正如同稍早提及有關台灣現有的文化殖民閱讀狀態呢？這些都是引發研究者所要探求作家對移民生活處境與經驗的書寫。

研究異文化中的亞裔移民的議題，研究者選擇的切入點，是從後殖民論述的認識為其起點。論及文學的後殖民論述，焦點著重於一群被忽視至新興起的人們，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自我意識之崛起和重視，不再服膺於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順從生活。因此，這樣的反抗使得後殖民作家逐漸面對文化強權和種族意識寫作上的難關和挑戰。此外，因為意識抬頭的關係，後殖民作家將過去被遺忘的聲音與經驗，以文字的方式將這樣的世界帶入讀者的眼中，從中喚起一絲對強權社會所壓迫該體制底層下的另一層認識和思考。

現今，後殖民論述中主要分為兩個重要分枝，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和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新殖民主義是指殖民形式不再以刀槍砲彈等武力方式，而以商業自由貿易往來等經濟政策來取得控制權，作為新穎的獲利手法，其結果不亞於傳統帝國殖民時期，但是第三世界仍舊處於弱勢位置 (McGillis xxiv)；多元文化的起端是 1960 年代源於歐美的新思潮，亦即不再固守於絕對的單一價值，而是強調個人在文化上、性別上、種族上、階級上、宗教上、族群上

有多重的選擇權，尊重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並接受他人的選項 (Dobie 196-197)。

研究者所要探討的主題主要聚焦於生活在異文化的亞裔移民族群，移民的議題即為多元族裔的國家中一個重要而且值得探討課題——離散文化。在美國的亞裔族群與其他族裔不同之處在於，除了具備原本族裔的獨特性和文化特質之外，不同的歷史脈絡，不同的生存際遇，延伸出的問題在於——亞裔族群移居異鄉美國與故鄉之間，對文化、國家和自己的身份、角色位置，抱有的態度與思考為何，以及在跨文化之中固有的族裔身份角色，處於美國主流族裔的社會裡可能面對的困境與挑戰，並從環境與心理兩個層面來探究移民族群。

故此，為了解析出其中的關連，研究者將以作者與作品的情節內容與意涵引領出來的移民議題為討論的角度，分析日裔美籍作家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的兩本小說作品——《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研究者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在文本中，日裔移民與移民後裔，在跨文化的環境裡，自我身份的認同建構是來自何處？這群具有移民身份的離散人，作者筆下的角色是以何種價值觀和符號方式界定自己的身份，其對國與家的歸屬感為何？

第一代的日裔移民，對日本依舊有懷鄉之情與落葉歸根之念，對其祖國日本，於國族與家庭的認同根基多半存在，身在美國異地，若有合乎過往記憶基模的人、事、物，其心理歸屬相較於其移民後裔，帶有更強的認同感。這也反映出，出生於美國的日裔美人，對原先日本祖國的距離感，比較上遠於非出生在美國的日本移民，因此對日本的認同感不及第一代移民濃厚。然而，在父母親的養育過程中，知道自己並非是個白皮膚美國人，對於其身份認同上，是如何在這多元族裔所構成的美國，找尋與探求自我的身份認同，這是研究者首要探討的問題。日裔移民及後代，可能藉由某些投射狀態與情感，藉以呈現與反應出對日本祖國的連結，可稱的上是一條無法切斷、卻又存在的線，這對他們的生活和己身的定位為何有顯著的影響。此問題勢必存在每一個移民族群中，對於故鄉與寄鄉之間是

無法有完整切割下的選邊站與解答，但在程度上的比重問題，卻是足以影響對家與國家的歸屬態度。藉此，研究者企圖從離散人於自我認同與尋找己身的歷程中，找到研究文本中的移民族裔的歸屬位置，以及可能面對兩難的國家認同所面臨的矛盾情況與態度。

二、移民他鄉之後，保有的離散特質，不同世代於異鄉的生活層面可能面對哪些跨文化影響？身份的影響和轉變又在這樣的生活裡產生哪些問題？

「離散人」對故鄉忘不了的懷舊思念，徹底發揮在第一代移民族群身上，他們從故鄉攜帶許多物品得以象徵與日本的連結以及作為身份再現的表徵。然而，異鄉終究不是血濃於水的母親故土，面對該土地上陌生的文化、族群、飲食、語言，日常生活中每一個轉角都是新的挑戰。下一代移民後裔或稱之日裔美人，經由美國文化的洗禮，身份和意識開始與上一代出現了落差，仍舊以一個非白人的「他者」身份生活在美國白人族裔的主流社會中，同樣出現不同層面的生活挑戰。藉此，研究者第二個要探究的問題，即試圖從離散人的移民生活遭遇和困境過程中，尋找文本中移民族裔在異國生活可能的影響層面，以及不同世代在強烈的他者族群意識和自身集體族群意識之間的生活拉扯與流動狀態。

綜合上述兩個問題，研究者想從後殖民論述中以離散文化的詮釋角度，來探究研究文本。所以，章節結構茲列如下：

第壹章 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問題、研究範圍和文本介紹、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貳章 離散文化。探討離散始末出現的定義，從歷史古典的猶太人離散產出論述原由至當今衍生泛化的離散論述，並結合離散引發的情感歸屬論述。研究者將從離散中整合出一個探討身份認同的建構和流動，以及非白人的他者處境為論述核心，予以作為此論文討論的理論架構。

第參章 《閃亮閃亮》。在離散文化的架構中，以尋找自我定位的思維和異國的生活經驗，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本中人物所身處的環境困境遭遇和身份建構。本章分成四大節，米食文化的身份連結和追溯、語言命名使用的歸屬和根基、

白皮膚與黃皮膚的不同命運，三個方向討論此文本，最後延伸至《閃亮閃亮》文本中族裔弱勢的問題。

第肆章 《野草花》。同樣參照離散文化的身份認同和他者處境軸線，以尋找國家和族群歸屬的矛盾之移民生活經歷，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爭期間文本中人物的身份建構和所身處的困頓環境。本章同上分成四大節，個人物品的身份建構和表徵、他者身份在美國遭受的不平等對待、國家忠誠度的表現和不信任，三個角度來觀看此文本，延續至《野草花》小說中的跨文化尷尬。

第五章 總結。重述離散文化的概論，以離散文化的角度觀看此研究的兩本文本，從文本不同方向的分析，整合探討個人身份建構、家與國家的歸屬認同，以及跨文化的移民生活體驗。並從兒童的生活層面，來體會離散造就的動蕩大環境對童年友誼的影響。也歸納辛西亞·角畑的兩本作品傳達給研究者的價值與啓示，提供未來進一步可能可延伸探討相關移民和族裔族群的主題。

綜合上述的五大章節，第貳章的理論論述是作為文本分析的主要判準依據；文本分析則著重於第參章和第肆章，兩本文本各別呈現二次大戰前與戰後，非白人的移民者和其後裔，隨著環境變遷等因素，兩種存在於美國不同時空和脈絡的離散氛圍，抽離其中一章都會減弱對離散多面向的瞭解；第五章是融合整個離散精華並引導出新的討論議題。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本介紹

(二) 研究範圍

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獎是美國的本土獎項，每年頒贈金、銀牌獎，挑選出當年最佳的青少年與兒童小說作品，從 1922 年至今，累積的得獎作品超過百部，為兒童文學界發掘出許多作家與作品，也成為學界、圖書館、教師、家長、讀者選書的指標之一。

研究者於研究所的少年小說的課程中，接觸許多紐伯瑞得獎系列作品，讓研究者對於此獎項的眾多作品，有了更深一層的閱讀接觸。因此，促使研究者想以此為研究範圍，找出所要討論的文本。

在這些琳瑯滿目的作品裡，以族裔為主角的題材故事，一直是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其因在於，透過跨異文化的生活方式，這些作品多半能以一個「他者」的視野與角度：一個被隱藏的聲音和身影來檢視存在同一個時空中卻被忽略的實體與經驗。因此，在族裔故事中所常論及的「離散文化」，也就成為研究者的研究基準，因此，在選擇文本的過程中，研究者建立了三個選擇文本的限制條件如下：

(二) 紐伯瑞得獎系列作品中，以非白人的族裔主角為先

紐伯瑞金、銀牌得獎作品裡，每一年的得獎作品取向都不盡相同，可能是順應同年時期的潮流和歷史背景。在這些得獎的作品中，以族裔為主角的題材故事，內容的時空背景以及所探討的議題，採用一個「他者」觀看的視野與位置：檢視過去長時間以來一個被刻意疏離的生活歷程，重新編輯被裁剪的身影並重現被消磁的聲音。

本研究的焦點是在探討離散文化，離散文化是後殖民論述下的分枝，因為後殖民抱持的立場是質疑殖民論述，而且揚棄殖民論述，殖民論述是西方白人男性中心權力普世價值的產物，所以主角若以白人且男性來書寫，這可能會再次透露

出同樣的中心普世價值和相同的意識型態，因此爲了避免表面身穿後殖民論述的衣裳，布料底層確是潛藏殖民論述的情況出現，研究者對於這樣的抵觸深感質疑與憂慮。故此，才能在後殖民論述的傘狀範圍裡，有個較於具體而且較穩當的支持。

(二) 以跨異文化背景爲題材，亞裔作者和主角爲主

根據第一項檢視文本的條件，可以從紐伯瑞得獎系列作品中發現不少以非白人的族裔爲故事主角，明顯數量較多的文本是以書寫美國黑人，例如《黑奴》(暫譯，*To Be A Slave*)，1969 年的銀牌獎、《隆隆的雷聲，聽我的哭聲》(暫譯，*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1977 年的金牌獎、《伯明罕的旅途》(暫譯，*Watsons Go to Birmingham*)，1996 年的銀牌獎、與 2000 年的金牌獎《我叫巴德，不叫巴弟》(*Bud, not Buddy*)。這幾本的故事背景都是以美國的黑人爲主角。其中也有幾本非黑人的族裔故事，例如以猶太族爲主角，1990 年的金牌獎《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以中東遊牧民族爲主角的 1990 年的銀牌獎《風的女兒》(*Shabanu: Daughter of the Wind*)、以華人爲主角的 1994 年的銀牌獎《龍門》(*Dragon's Gate*)和 1976 年的銀牌獎《龍翼》(*Dragonwings*)、和 2005 年以日裔爲主角的《閃亮閃亮》(*Kira-Kira*)。

研究者生於亞洲地區的台灣，有鑑於此，相較於談及遠在太平洋另外一邊的美籍黑人，不論是以華人身份和處與亞洲的地緣，兩者間使研究者對陌生的黑人文化進行研究，有明顯的距離感，從一個台灣人的世界觀看美國黑人的世界，除了歷史背景和生活文化完全不同之外，不熟悉、不認識、不瞭解，更重要的是完全沒有接觸過任何黑人的經驗，因此更沒有一個穩定的立場背景來討論黑人族裔的議題，也盡可能避免這些問題產生個人對黑人族群的刻板印象和錯誤認知。對於眾多族裔故事而言，就不同族裔間的價值觀、生活習慣與思考方式，乃至於歷史背景和生活文化而言，研究者認爲，選擇亞裔作者的作品與故事，相對其他族裔而言，研究者較能掌握作品中的族群特性與風格。

在紐伯瑞得獎作品，亞裔作者所撰寫的作品有《龍翼》、《龍門》、《閃亮閃亮》，

與 2000 年的金牌獎《碎瓷片》(*Single Shard*)。在這四本小說中，《碎瓷片》的作者雖是韓裔美國人，但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卻沒有跨異文化作為其背景，所以不列入考量。

(三) 以研究者最接近的時代為主

這三部文本作品裡，分別為華裔美籍與日裔美籍的作者，兩者所述說的故事雖都是在跨異文化的族裔故事，但兩者間的時空背景不盡相同。《龍翼》與《龍門》是以清朝時代為背景，《閃亮閃亮》則為二次大戰後的時代背景，研究者最後以最貼近現代的時空背景為準則，企圖能減少對時空背景的認知錯誤和歷史斷層。依據上述的理由，最後的選定文本就是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於 2005 年紐伯瑞金牌獎作品——《閃亮閃亮》。

辛西亞在《閃亮閃亮》獲獎後隔年出版的另一本新作，與《閃亮閃亮》同樣是探討日裔移民的故事，時空背景更往前拉到二次大戰前後期間移民美國所面對的生活狀態。整本小說一樣以日裔美籍的移民為故事主角，一樣面對文化、身份的矛盾心理處境，更重要是文本中也有濃厚的離散氛圍。兩本小說散發出不同程度的離散氣息，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心理狀況、不同的政治局勢，可以互相增補更多層面的離散探討。所以在比較研究上，研究者綜觀辛西亞·角畑的相關作品，挑選符合上述兩項主要條件之外，並結合與此研究的主調，離散文化的思維，最後挑選的出其 2006 年出版作品，名為《野草花》(暫譯，*Weedflower*)。關於此兩本書，研究者介紹如後。

二、研究文本

(二) 《閃亮閃亮》(*Kira-Kira*)

《閃亮閃亮》(*Kira-Kira*)，是由 1956 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的日裔美國人——辛西亞·角畑的得獎之作。她曾被《紐約時報》贊許為「小說界的閃亮新聲」。《閃亮閃亮》英文原文版是在 2004 年 3 月於美國問世，由 Simon & Schuster 出版，2006

年 5 月中譯本在台灣由東方出版社發行，譯者為張子樟。

《閃亮閃亮》是以一個日裔美國小女孩凱蒂為故事發展主軸，在她的心目中，姐姐琳是全世界最優秀與完美的女孩子，有亮麗的外表、聰明的腦袋，和善良的心。但因環境因素，她與姐姐隨著父母親和伯伯一家人，從愛荷華州搬至喬治亞的一個小鎮定居。

在定居的新小鎮上，雖然包含他們共有三十一位日本人，但到了新環境的他們，仍然得面對遭受排擠與異樣眼光的對待。對於一位小小孩童而言，此種複雜的心理狀況，可以反應在凱蒂與姐姐、家人的一些單純的問話中，但這單純的背後，卻呈現出跨文化中所產生的矛盾、誤解與衝突。

在凱蒂的家中，父母親辛勤地在孵蛋場與家禽加工場工作，隨著家裡的新成員小弟弟出生，家裡開銷持續增加。令人欣慰的是，琳與凱蒂都是懂事的女兒，十分孝順地在家張羅一切家事。在入不敷出的狀況下，凱蒂一家，依舊將能擁有一棟自己的房子，作為全家最大的夢想。

關於凱蒂父母親工作的情況與環境，直接地反映出當時亞洲族裔在白人社經制度中，美國對待非白皮膚、藍眼睛的族群情況。

屋漏偏逢連夜雨，姐姐琳上高中時，身體出現了淋巴瘤，導致身體變得十分虛弱，甚至有精神狀況不佳的情形。此時，凱蒂擔負起照顧的責任，在她與姐姐互動的過程中，看到了凱蒂成長的心境。雖然姐姐終究逃離不了病魔與死神的召喚，但她的樂觀與積極態度，帶給凱蒂很大的影響。讓凱蒂堅信，不管面對生命或是困境，就如同姐姐教她的第一句話「閃亮閃亮」一樣，要保持美好與希望的態度。

(二)《野草花》(Weedflower)

此篇與《閃亮閃亮》都是以小女孩作為其故事的主軸，故事主人翁是一位 12 歲大的澄子（暫譯，Sumiko）。澄子與他的弟弟、伯父伯母和祖父住在南加州，

從事植種花卉工作。雖然在工作時常有許多的瑣事，但澄子十分享受能與百花齊放的花朵為伍，她尤其特別喜愛一種野草花 (weedflowers)。

此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偷襲珍珠港，除了讓美國正式地參戰之外，排日風潮也在美國本土迅速地漫延開來，澄子與她的家族成員，終日都擔心其自身的安危，也害怕他們所居住環境會遭報復與攻擊。

此時，伯父與爺爺被帶至日人的聚集營，其他成員則被安置在一處賽馬場中心，暫時居住在馬廄裡。隨後，他們全部被送到亞利桑那州的沙漠，澄子開始想念起她過去在花場工作的生活，心裡也深深地感到絕望。

幸而此時，澄子認識了新朋友法蘭克，一位摩哈維族的印地安原住民男孩，從此她的生活有了不一樣的變化。在澄子為自己的情境感到失意時，法蘭克對澄子說：「你並不是第一位曾有失去過的人」(160)。她也從法蘭克那裡得知她們所待的聚集營，是位在原先摩哈維保留區的土地，法蘭克族裡的成人非常憎恨這群居留在保留區的日本人，之後澄子逐漸瞭解其原因，因為法蘭克的族人所遭遇的困境就如同她們這群被監禁的日本人一樣，始作俑者就是美國白人。

澄子回想起爺爺曾告訴過她，當時移民來美國的一段話：「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天日，終日與無聊為伴，但那也意味著我與我的決意為伴。內心的我，不斷的在喊叫，但外在的我，是無比的平靜」(92)。

這促使澄子在悲痛與不安的飄泊的生命裡，決定在這片充滿鮮艷、芳香野草花的沙漠之中，重建信心與希望。

在這兩本小說裡，作者辛西亞在故事裡都隨著小主角的成長與發展，放置了一些重要且複雜的議題，看似輕輕的觸感，卻是力道十足。其中最主要的即是日裔美國人的生活文化，尤其是對家或國家歸屬感與自我認同的部份和充滿挑戰的生活經歷，就是本論文所欲探討的部份。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亞裔美籍」以及「跨異文化」文本小說，傳達不同於白人男性世界的另一類聲音，因此，研究者將以「後殖民論述」去解讀詮釋。「後殖民論述」就是對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以及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的反動，不再服膺於霸權之下，並且藉由己身對於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身份自覺 (self-consciousness) 的認識和意識抬頭，由此使得自己可以發聲，也對外發聲，便是傳遞出去讓外界聽到這些過去被隱沒的聲音 (Dobie 186-187)。故此，歷史、文化、身份自覺的認識起步，是第一個予以解讀與詮釋《閃亮閃亮》和《野草花》的序曲。

宋國誠，在《後殖民論述》中提到：

後殖民論述 (postcolonial discourse) 定義為在當代文化 (包括廣義的文學)、歷史和政治領域中作為一種「文化抵抗」形式的寫作與批評，後殖民論述既是一種批評實踐，亦是一種策略書寫。(2)

然而，如此的概括思維來探討兩本文本，容易失去焦點並且可能忽略了許多層面的細節，所以綜觀「後殖民論述」，此概念的研究底下還包括了以經濟貿易形式殖民而獲利和獲權的新殖民主義 (neocolonial)，以及摒棄單一絕對價值而推廣包容和尊重選擇的多元文化論 (multiculturalism)。而且多元文化論的衍生支流下出現一個新穎的研究，即為離散文化 (diaspora)，則是探討一群特殊族裔集體族群飄蕩的生活經驗與聲音，其特殊點在於一個落葉歸根而沒有根的一個移民族群，簡言之，即為一個沒有根的家。這次文本的解讀與詮釋將採用後殖民論述下的離散文化來做討論，企能有一對於跨國移民和跨國社區的族裔研究觀點。

這觀點在於討論亞裔中的日本人，生活在異國文化的美國環境中，他們如何一個不可分割的歷史關係中，對於家和身份認同的表現為何？當中特定的政治

歷史與文化因素為何？跨文化身份的生活處境與遭遇又為何？

文本小說中的日本人移民至美國，第二代與第三代都是出生於美國，依據美國法律，出生於美國的即可成為美國公民。然而，不同的皮膚顏色、頭髮顏色、眼珠顏色，與白人的外表完全不同的日本人，在這個充滿西方文化美國大地上，雖然稱此塊土地為家，一樣擁有美國的國籍，但實際上確遭遇到相當不同的際遇。所以家與認同的問題，對這些出生異國的移民後代來說，是一個外在與內在都需要面對難題。

因此本篇論文的研究步驟說明如下，先進行離散一詞的定義與概念之整理，提供完整的脈絡，以及離散與兩本文本小說的關聯。接著，根據離散所賦予的意義以及現象的觀點面向——即是尋求並再現這一群特殊人的生活經驗，由此經驗讓自身與他者都可以瞭解其生活狀況。更重要的是，也讓原鄉的族群和寄鄉的主流族群瞭解移民者主體與移民主體性，自相矛盾的離散心態，從中聆聽一個弱勢、隱藏，但是在歷史上一直持續存在的重要聲音，從中一一檢示小說故事中的人物、情節與段落。透過文本分析法中的細讀過程，節選出有關家與認同及面對種族歧視的遭遇的段落與章節，並著手進行更深一層的剖析，進而討論出辛西亞在其對族裔的小說書寫上，其中離散文化下的家與身份認同是如何建構、營造與表現，和在異國土地上的他者生活經歷。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所探究的文本《閃亮閃亮》(*Kira-Kira*)已有中譯本的問世，是 2006 年 5 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譯者為張子樟。另一本《野草花》(暫譯，英文書名：*Weedflower*)則無中譯本。另外，就參考書目而言，也多以英文書目居多，因此在進行文本研究與分析時，是需要將英文資料翻譯成中文。在語言與語意的轉換上，由於研究者並非專職翻譯工作人員，所以，對於翻譯後的中文字句，是否能完全符合原意與信、達、雅，研究者未能有十足的把握。

此外，研究者以非日本本國人，非日本移民族裔，來進行日裔美籍的探討，在立場與角度絕對無法與當事者相同，相對於身份上，是一個完整的他者。而且，日本的歷史、政治、文化背景，與日本移民潮或移民的動機，都不是研究者這次含括搜集的資料，所以無法完全掌握與了解，只是僅有從文本入手，尋找作品本身的意義，以及作品中離散書寫的呈現。

最後，僅此兩本的文本小說，日裔美籍對家或國與自我認同的部份，也只是從這兩本小說作品中呈現的單一面向，即使含有大方向的離散文化探討，也無法包含並針對所有的日裔移民族群。僅是從最接近故事當下的時間與空間中的歷史背景、文化社會與生活實況，達成單一的離散分析，畢竟個體之間身份屬性的差異，無法將其思想、情感、經驗劃上等號。因此，這些不足的地方都是此研究的限制之處。



第貳章 離散文化

第一節 離散的歷史脈絡

離散 (diaspora) 或者離散文化 (diaspora culture)，是有關一群特殊族裔集體族群飄蕩的生活歷程與足跡，其特殊生活形態在於一個落葉歸根而沒有根扎的移民族群，簡言之，即為一個沒有根的家。離散族群的活動在歷史軸線上一直都存在且持續不斷的進行，但為了因應當時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不同時空背景的轉換與條件改變，離散的始末也隨著不同的歷史故事與脈絡，出現不同的詮釋和意義。而這一波又一波的特殊移民背景，正是後殖民論述傘下的離散文化所要探討的主題。研究離散人書寫的離散作品，或是解讀離散人和離散作品的深層問題，第一步要做的正是進一步檢視離散的定義和範疇，再則以運用詮釋在此研究文本《閃亮閃亮》和《野草花》上的可能。

離散這一個專有名詞是源自西方世界，從字面上的語意來解讀，是離開、散去、分離、散播等意。回溯至西方對離散的初始定義，需將時間與空間往前追溯至西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時代，甚至更早，「diaspora 這一個字，源出希臘文的動詞 sperio (to sow)和前置詞 dia (over)，因此希臘語的離散就與移民和殖民有了相關聯想」(引述英文原文部份，皆為中文暫譯) (Abdel-Hady 18)。由此可見 sperio 有著播種、傳播的意思，dia 是越過、遍及的涵意，兩者結合即成為群體向外散開、散播 (to scatter)之意，之後人類遷移發展史上，在時間與空間的演變和轉化便延伸至移民和殖民研究上。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猶太裔學者亞諾·艾吉司 (Arnold Ages)認為，對離散一詞的最初概念成形，可以追溯至歷史上的三個大時期。第一、舊約翻譯之譯成希臘文後，文中描述西元前六世紀晚期，猶太人族群成為巴比倫帝國的囚徒之後，引發大規模的猶太人族群的流散和分離，喪失鄉土 (homeland)的遭遇。第

二、隨著基督教的興起，造就了猶太人在北埃及亞歷山大市 (Alexandria) 的流離星散時期。猶太百科全書中對此有更深一層的說明，即離散是用來描述基督教興起前後，猶太人飄遊的生活現象，這散去的起因不是因為需要稱臣獻貢的奴役結果，而是擔負著神諭 (Torah Knowledge) 的指示，一個神聖的使命。然而這兩者之間於基督教興起的時間內，不一樣的考據呈現不一樣的角度，但有一點十分明確的是兩者間對猶太人的飄散人生是一致的。第三、西元一世紀，猶太人族群反抗羅馬帝國的軍隊侵略巴勒斯坦的領土，嚴重戰敗，使得耶路撒冷的教堂就此毀滅，從此猶太人集體流離、分散，遍佈全世界各個角落。此事件也成為歷史上離散概念發源的最明確的指涉開端 (轉引自林鎮山 72-73)。

猶太人的集體離散是離散概念的序曲，之後另一波大規模的離散是十六世紀非洲黑人的奴隸交易。西元 1502 年開始，西非的非洲黑人被迫買賣，送往當時的新世界——北美洲、南美洲、歐洲、中美洲加勒比海等地區，這些地區因應當時的經濟發展，不僅是最需要奴隸的地區，並為該地區提供廉價勞力、成為被買賣的商品。最讓人熟悉的是非洲黑人在美國南方棉花田工作一事，這一波美國的奴隸制度甚至引起美國重大歷史事件——「南北內戰」。過去四個世紀，初步統計總共超過一千兩百萬名黑人被迫離開非洲，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一波又接一波的黑人離散才因為奴隸制度的廢止而結束：

「英國於 1833 年立法廢除奴隸制度，然而英屬加勒比海直到 1834 年才終止；西班牙與葡萄牙於 1840 制定奴隸制度為違規行為，不過葡萄牙直到十九世紀末結束前，持續違法將黑人奴隸運送至南美地區的殖民地；美國則於 1865 年廢止此制度」 (Braziel & Mannur 2)。

當然法律強迫立案，使奴隸制度成功畫下了句點，但這之間不免有違法的交易持續進行，葡萄牙肯定不是唯獨一個無視法律存在，只是其他國家黑市交易未浮出臺面或者以成了公開的秘密。因此根據上述對猶太人和非洲黑人的歷史概述，離散的開始，是受到一個大環境的政治、宗教、經濟的迫害，進行了大規模的族裔非自願性的遷出原鄉的移民活動。

此外，法國社會科學研究員蜜妮·史娜波 (Dominique Schnapper)認為，除了猶太人的古典離散意義之外，其他的離散應該還有許多不同層面的起因，可以一一回溯至最初的原點。例如，最廣為人知的例子為十九世紀中後期，歐洲人橫跨全球各地的殖民活動，遍佈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屬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尤其是非洲地區，例如塞內加爾、肯亞、烏干達、東南亞地區，比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東太平洋地區，例如諾魯、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這些地區獨立建國的國家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主要誘因就是宗教傳播、權力關係、冒險慾望、經濟利益、自我向上的命運等等理由結合，造成大量族群遷移活動 (轉引自林鎮山 14-15)。

因此綜論以上三者的脈絡，得知人類的生活發展史與遷移息息相關，長時間的累積下，演化出不同的面向，此後，「離散」這個術語，逐漸廣泛的被引用，其泛化不再只是局限在猶太人那種單一古典模式的離散情形，爾後也沿用至各族裔散居他鄉的歷史。所以後來也陸陸續續出現各種不同的離散背景的論述：

「歷史上的案例可以闡明每一種離散類型：非洲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巴勒斯坦人是受難離散；印度人是勞工離散、中國人和黎巴嫩人是交易離散；英國人是帝國離散；加勒比海人則是文化離散最典型的代表」(Abdel-Hady 19)。

猶太人的古典離散、黑人奴隸的販賣離散，以至於現當代的交易離散與文化離散等等範疇，不管那一種性質和起因的離散，鄉土對於這群被迫移出的人群來說，是飄蕩不定，寄寓在一個不屬於自己鄉土的他鄉，而心懷思念的故鄉，只是另一處距離遙遠且陌生的異地。

第二節 離散文化的身份影響範疇

如同上一節對古典猶太人離散和後現代各族裔離散現象的開端，到目前為止，對於離散一詞的定義，還沒有完整明確的字詞範圍來界定其意義，人類學家、文學理論家、文化批評家等人文領域的專家學者，都還在對這一詞的定義進行協商。不過，就大體上離散的比喻稱號 (metaphoric designations) 所包含的種類¹，可以大範圍地包含以下，流放國外者、政治避難者、旅外僑民，甚至因為商業貿易往來的需要，在國與國之間往來的商務人士，這些都是現今離散所含有的範疇內。在不同原由遷出原鄉的動機與行動，影響範疇中每一個層面的關連，也需進行不同層次的思考問題。離散文化的研究，更在於二十世紀後半時期，二次大戰的結束閉幕曲，以及被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後的開場白，成為人類學、文學理論、文化批評的焦點，藉以被大量的研究和引用，進行談論各種可能性的離散原因之移民情況。除了移民研究為核心之外，離散研究也是地區研究、族裔研究、文化研究不同層面探究的範圍，也都是離散理論必定出現的討論範疇。

二十世紀中期後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代的離散移民運動脈絡必需考量到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包括殖民主義終結和共產主義的瓦解。此脈絡的發展下，地緣政治、國家系統以及意識型態的轉換，並與所謂地球村和全球化的驅使下，全球佈局密切的商業行為網絡，使得一個國家無法獨立在外，而可以獲得富裕的經濟狀態，所以出現從第三世界遷入第一世界健全和強大經濟圈的經濟移民，進行學習、結盟、投資，一方面是因為個人、財團的財政實力，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層次的獲利和獲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潮，殖民現象瓦解後的移民出現，遷移的原因有其差異性，有被殖民者從被殖民地移出至原殖民帝國，反之亦然，也有從原殖民帝國的殖民者移入被殖民地，原因多元，但不外乎與經濟、權力、宗教有正相關；這其中也包含當時軍國主義侵占下的東亞地區和東歐等一些

國家的政變、分裂問題；以及冷戰時間的古巴、越南、阿富汗、瓜地馬拉等國家的政治避難者的遷出 (Braziel & Mannur 18)。

因此，根據上述脈絡可以得知，古典的猶太人離散是因為來自權力高壓迫害或者驅使所導致，因而出現「根」不在原鄉的生活經驗，是非自願性的遷出；泛化的現當代的離散則因為全球化的變動下，導致「根」無法留在原鄉的生活經驗，即可能是自願性，亦或非自願性的遷出行為。然而，儘管離開原鄉的理由可能是情願或非情願的兩種態度，兩者皆產生了一層原鄉與寄鄉之間的跨身份流動，更影響著離散人在原鄉與他鄉之間身份拉扯。原因在於離開原鄉之前，自我的身份屬性來自故鄉的形塑，原有的社會和文化灌輸，意識認同上成了一個獨有的特質，表面上與內化上訴說著自己和寄鄉土地上原先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或簡言之，如同母子間臍帶連接，雖然表面上已經切斷，兩個人身上依舊流著相同的血液。基於這一層原鄉的身份屬性以及血緣關係，離散人對原鄉的國家和地區賦予一個集體的族群文化記憶、族群的團結和意識型態，而且不忘對原鄉保有一股濃厚的忠誠度和思念的懷舊感。

此外，離散人士在他鄉或者稱之寄鄉 (host country) 的社會型態、文化層次、政治考量、經濟層面等生活方面上，有可能或者是無法被寄鄉視為一體，這過程出現兩種可能相互衝突的國家、種族意識型態，而產生排他的他者現象。這促使一個思考的方向，「當文化和文學評論日益高漲地針對重新思索國家狀態與國家身份，如此的批判分析理當質問當代各種形式的變動 (movement)、移位 (displacement)、轉位 (dislocation)——從旅遊到流亡」 (Braziel & Mannur 3)。這迫使離散人在變動、移位、轉位的複雜關係之中，在寄鄉和原鄉中間的國家認同、身分認同的問題裡是一大重要課題，主要在於離散人該如何於跨地域情況中定位自我的身份角色，以該身份角色賦予的國家所屬。也牽涉了流動離散人的角色於原鄉和寄鄉之間的位置關係，原鄉對於離散人的態度、寄鄉對於離散人的觀感、和離散人看待原鄉和寄鄉的心態。其中，移位的位居特別是在於殖民時期結束後更加突顯，因為包含更多元化的政經局勢影響，以及自願性遷出的意願比例，都

不再只因應單一的權力，而是自身也擁有了決定的選擇權。所以，離散族群的生活經驗是在一個簡化僅有的過去與現在的時間線，在原鄉與寄鄉之間成爲生活在異地的一個他者：

飄零的離散 Diaspora 人士，擁抱著不止一個以上的歷史、一個以上的時空、以及一個以上的過去與現在，還歸屬於此間與他地，又背負著遠離原鄉與社會的痛苦，成爲異地的圈外人，而淹沒在無法克服的記憶裡，苦嚐失去與別離。（林鎮山 114）

故此，離散現象中的各個族裔，有自願性和非自願性的，從原先的國家或地區（稱作原鄉），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留居（稱作他鄉或寄鄉）。隨著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發展過程，離散的演化，經由不同的文化、地區、族裔、意識等等的背景理由爲泛化程序，在遷出原鄉前往寄鄉的過程裡，即可能離散人的移民屬性，於身份認同建構和國家認同歸屬的部份，將會涉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²、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³、和移居(transmigration)⁴的討論範圍，提供更進一步對於離散人在原鄉與寄鄉之間流動的思考角度與分析思維。

漂洋過海遷入寄鄉之後，離散人對於原鄉出現一種懷念的迷思，即「有些實例裡，有些人也許沒有得以返鄉的祖國，有些即使祖國依存，但對於離散成員並不是一個歡迎的地方，問題在於政治、意識、社會自我識別」（Abdel-Hady 21）。原因在於離散是人類個體與群體的離鄉背景，對原鄉仍保有鮮明的記憶和密切的聯繫，任何方法都無法切斷與原鄉的根，或許是因爲原鄉的家族血緣關係，離散人心中總保有重返原鄉 (return)的思念。但有趣的是，這種曖昧的行爲和思念，始終沒有一個完整付諸的重返行爲，也就是並沒有真正的回家(homeland)，所以對於有祖國可以回去卻沒有返回的離散人，主因基於經過多年的身處他鄉，自我原鄉的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等各種認同問題，潛移默化的出現了變化，不再與原鄉土地上的族人那樣相近、雷同，正是如此，所以產生一種與原鄉特殊的疏離感。導致這一層疏離的發生，就是寄鄉文化與生活在離散人身上產生了同化效應。

同化效應的出現是移居他鄉後，經由四個階段而生成：接觸、競爭、適應、

同化。這過程是遷入的離散人，藉由與寄鄉原本的人民和文化呈現一種生活型態的整合。一般認為同化即消除能與主流族群區別的外在符號與特性，進而達到接近主流族群而沒有顯著的差異性 (McLemore & Romo 8-9)。

然而這四個階段對於不同世代的移民離散族群和後裔，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影響。第一代的移民族群，保有原鄉的文化和身份屬性，包括名字、語言、穿著、宗教、傳統、食物等等，其實在第一階段的接觸部份，已經具體的表現他們在於寄鄉主流社會中是一個明顯的局外人。他們必需以一個非主流族群的他者身份，在這陌生的寄鄉中與原先人民競爭，尋找得以生存以及立足的空間。但因為那股濃厚的原鄉意識，在第三階段的適應上，則是一大困難與挑戰。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都有某族裔形成的社區，例如：中國城。因此，第一代移民族群的同化效應是微乎其微。

移民族群的兒女，也就是第一代的移民後裔，他們的原鄉記憶、行為、傳統是經由父母親傳授與教導。比起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後裔出生於寄鄉，在接觸與競爭的初步階段顯得比較輕易，因為沒有厚重的原鄉包袱。而且接受寄鄉的教育，生活於寄鄉的文化氛圍，適應階段也就不需要刻意去強調，因為不知不覺已經進入該寄鄉的生活文化模式，同化現象明顯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蹤影。不過上一代的原鄉事物灌輸，他們也自覺與寄鄉居民之間有一層族裔隔閡存在，寄鄉居民也會持著他者視野觀看這一群不同族裔的新居民。因此根據上述的思路，可以推測第一帶移民後裔，對於原鄉與寄鄉之間都有著完全不屬於的心理態度。

第二代的移民後裔，似乎更加能完整符合並達成上述的四個同化階段，基於祖父母和父母的原鄉記憶更加遙遠，他們完整接觸的是寄鄉生活文化，說的是寄鄉的語言，接受寄鄉的教育，遵循寄鄉的傳統，因此在競爭與適應階段上，比起上一代，有較小的問題與挑戰，即使他們也認知自己是與寄鄉族群不同族裔，但是文化和身份的同化效用，這一層隔閡就不是問題，甚至祖父母和父母認定的寄鄉，對他們而言就是原鄉；反倒是上一代認定的原鄉，對他們而言，更可能是遙遠且陌生的他鄉。

因此，從同化的四個階段所推論對於移民和移民後裔的不同層面，可以得知，同化現象並不是一定指完整的將自我身份屬性，徹底與寄鄉原先居民等同或雷同，而是不同世代出現不同身份的流動與轉變，這一股身份的流動與轉變則稱為身份混體 (hybridity)。混體的援用和流行是從後殖民理論學家霍米·巴巴開始，他不認同愛德華·薩依德闡述東方主義時，即殖民權力完全是屬於殖民者的，他認為這是過度簡化歷史脈絡與論述的結果，並且過度依賴只從中間的二元對立去找差異，因此巴巴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是處於矛盾關係，即彼此相互吸引但又排斥的狀態。而混體概念就是從這邊產生，它是一個消除兩種對立關係的最佳策略 (生安鋒 132-133)。

混體是指，文化事件和實踐的形成是因為不穩定和非合成的權力關係所產生，換句話說，文化事件和實踐不是為了與寄鄉成爲一體而出現同化效應 (assimilation)，而是在寄鄉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找尋一個可以生存擁有的符號與位置，亦即介於個人主體身份與透過寄鄉生活文化而內化至某程度的個人主體身份 (Lowe 138)。而不平等的權利關係意指弱勢與強勢族群之間的競爭，也是兩者系統拉扯之下產生的身份位階，更因為弱勢與強識族群彼此的差異，使得弱勢的他者角色在主流族群統治的社會裡，持續不斷的在定位一個最接近與符合主流社會與自身的身份。

根據上述的解釋，可以看到接觸、競爭、適應、同化四個階段的影響，也看到混體的產生的過程，是原鄉本有的身份和寄鄉身份兩個並存的身份形態，因應不同理由而有不同的程度比重。故此，混體現象在離散人的生活層面中，從飲食、命名、習慣、穿著等等，都有可能同時間包含原鄉與寄鄉兩者間共同賦予身份結合，換句話說，這混體現象不是絕對單一國家、文化、意識的身份表現，而是兩個國家、文化、意識共存的身份展現。

既然身份的表現不是單一層面的影響，移民寄鄉的離散人就得面對另一個特殊情況，即寄鄉上與其他移民族裔不同而產生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異質性是指，一定的界限裡，存在的差異 (difference) 和可區分的關係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例如，在美國，同為亞裔美國人，但有來自印度、日本、菲律賓、中國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所以在亞裔美國人這界限中，存在著國家、國族的差異性和可區別性 (Lowe 138)。

在美國，離散人遷進寄鄉後，接著要面對的問題是成為該國公民的同時，成為 (becoming) 與身為 (being) 的這個過程轉換中，使得離散者變成了次等公民和少數族裔的美國人，因此出現非洲裔美國人 (African-American)、西班牙裔美國人 (Hispanic-American)、亞裔美國人 (Asian-American) 等等。這是什麼族裔的美國人和英文用字使用的連接號，除了是兩個身份結合的身份混體表徵，也是在告知全體美國國民其中的族裔的差異和區別所在。

然而，這個是一種階段性的矮化，大聲的宣示在此社會中，如此特殊的身份與寄鄉的主流人民是這般的不一樣。如果不是一種階段性或者階級性的矮化，其實「什麼族裔」的美國人，可以將「什麼族裔」取消，統稱為美國人，與白人族裔的美國人是平等的。因此，這異質性的表現在美國社會中，即成為非白人族裔他者的分界點，雖然同樣是美國公民，但是附加了「什麼族裔」的美國人之後，就是一個鮮明的他者畫分，更是這些移民與移民後裔在生活層面中，一直得面對非白人的弱勢他者處境。結果迫使離散人的根和命運是不在移居的寄鄉裡，但是整體的生活又是完整地在寄鄉上進行。因而這類狀況的發生，離散就不只探討移民社群本身，也要探討寄鄉原民族本身對這些離散社群的看法。

此外，這些離散人從早期原鄉遷出前，就已經擁有確定身份的屬性和群體意識，自我的思維和意識和寄鄉的另一個原本居民，呈現兩者截然不同的內化價值，以及雙方面的現實狀態，因為「處與兩個文化之間的身為情況對於移民者是一種現實，移民的流動性對於固有的人口有著相互作用的影響，在這離散場域裡產生掙扎拉扯和適應效用」(Spencer 192)。不過更重要的是，外在的樣貌也顯現出質地上的差異性，膚色、髮色上的族裔區別，以白人族裔的角度，看待其他有色族裔的少數族群，不論是社會上或文化上，仍保有典型的他者歧視的眼光，所以在美國的有色族裔，在白人世界中就是一個他者的角色。

就目前為止，離散人的身份認同經由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五個身份階段的影響，可以歸納出其離散人的身份需要同時面對原鄉給予的距離和寄鄉他者現象，兩種情結間共存的疏離感，如此二元對立的「內」與「外」並存的雙重注視。此外，原鄉和寄鄉的認同情結矛盾生成，所以民族主義在此階段也會被納入分析及討論離散人的認同態度，藉以使得離散人得進入這一個雙重矛盾的自我思索，畢竟身份混體的產生已經不是單一範圍，而是跨越兩個地域和文化範疇，另外一個原因也包括離散人的集體族群記憶和寄鄉的排他意識型態。

依照上述五個身份認同階段的影響，在這樣充滿差異的環境當中造就所謂的離散空間，即「離散空間是一個關鍵概念，由舊有的身份與新興的身份在權力拉扯之間所創造，影響參數的接納(inclusion)、排他(exclusion)、他者(otherness)、歸屬(belonging)都會受到挑戰」(Spencer 191)。結果是原鄉的身份加上寄鄉賦予的新身份，造就了混體的產生，而包含兩個以上的混體身份在寄鄉主流族群之間，無法完整融入主流社群，而依舊是一個遷入的他者角色；另一方面，他者的角色，不論是對於寄鄉或者原鄉，都會遭受對於國家認同的質疑，如此二元論的情況之下，離散人似乎就陷入兩難的窘境。然而，這也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方向，究竟身份是發明的，還是身份是與生俱來的呢？從以上論述可以確定的是，歷史告訴我們自我認同、傳統及天性會隨著遷移而改變，所以才有文化上的同化、混體和異質性的產生，它們的產生也造就了身份的流動和定位對於個體在大環境中，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與寄鄉和原鄉的族群協商。

因此，從古典猶太人的離散概念到今日含括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五個離散身份認同層面的泛化離散概念，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不同的族裔和鄉情等，這些多方面的原因及背景，在如此多元的架構下，離散可以歸結出八大特點：

- 一、自願性或非自願性的遷移他鄉。
- 二、對原鄉懷有一個濃厚集體原鄉的文化、族群、思念、忠貞等等意識。
- 三、離散人心中一直保有重返原鄉的思念。

四、多年生活於寄鄉後，自我的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等各種認同問題，潛移默化的出現了變化，不再與原鄉土地上的族人那樣相近與雷同，產生疏離感。

五、於寄鄉的主流族群間有另一層種族或族裔隔閡，因此離散人成為他者角色。

六、生活與文化同化產生，造就身份混體和寄鄉上的其他族裔的異質性現象。

七、寄鄉與原鄉共同造成的疏離感，需要面對寄鄉與原鄉的兩邊雙重注視，於歸屬與認同部份會有雙重矛盾，並遭受其質疑與不信任。

八、原先舊有的身份與新興的身份，持續在該大環境權力拉扯之間所創造與建構。

由是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五個離散身份認同交織層面，所構成的八大特質，便是離散人不可獲缺的身份元素，也是下一章文本分析中，用來進一步解讀、詮釋、討論角畑兩本小說裡角色身份認同以及他者處境的重要的架構。



第三節 離散文化的特質整合

上一節談及的五個影響身份認同階段的因子，即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瞭解了移民族群的離散人，處在寄鄉和原鄉間的雙重經驗中產生的矛盾情結，這矛盾過程中的獨有文化、語言、族裔、國族的保留，爲了與原鄉保有一個可以直接的連接，並且圍繞於寄鄉社會和文化染缸中，執行的適當同化作用，使自我更能融入寄鄉的生活現況，儘管原鄉同化作用達成的身份混體，但對於寄鄉的主流族群，離散人仍舊是被視爲他者。這樣雙重的矛盾，或稱爲移民的矛盾心理，也就是離散人獨具對家的心理認知和旅外生活型態的特質。因爲如此，在離散研究中，就是要尋求並再現這一群特殊人的生活經驗，由此經驗讓各界瞭解如此的生活狀況，並從中探究離散人身於異鄉中，心中自我認同、國家認同的態度與角色。更重要的是，也讓原鄉的族群和寄鄉的主流族群瞭解移民者主體與移民主體性，於自相矛盾的離散心態，從中聆聽一個弱勢、隱藏，但是在歷史上一直持續存在的重要的聲音。基本上，離散人是情願和非情願的離開原鄉前往寄鄉生活，不論目的爲何，這特殊族群都被迫在多元文化之間徘徊，從自我經歷異質性和混體發生的反應過程中，對自己、家族、族群、國家上的定位等思維，或許某些層面上，比原鄉的同胞和寄鄉的人民擁有一個更寬廣和多元的視角，這力量得以讓離散族群重新參與文化的改造、顛覆、和傳承。雖然主要是發生在寄鄉，然而，也從不同管道間接改變了原鄉。

根據離散脈絡的演變，以及造就離散人的身份流動與認同的五大元素，即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的推論歸納：離散人，原爲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在原鄉受到創傷或失敗後，非自願性的遷離到異鄉去，如政治避難者；也因爲求職經商的需求，或者群體間對生活的希望與寄望，自願性的選擇離開家鄉前往一個生活條件更優勢的地區定居，如海外僑民。他們一般皆是保有對原鄉的集體記憶，對原鄉的歷史和文化有一份濃厚的迷思和思念，重視同樣生活在他鄉的異鄉

人，以及原鄉的親戚和朋友。因為對原鄉的濃厚情感，所以仍然擁有強烈的族群意識，獨特的鄉土情，賦予背負著延續原鄉族群共同命運的信仰和沉重的歷史責任。雖然定居在異鄉，但這樣的狀況並非永久，但絕對是長期的，只是心中一直懷有一份返回的動機。即使離開散居世界每一個角落的異鄉，同樣都會對原鄉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活動保持密切的互動與往來。相對的，雖然定居並歸化了寄鄉社會，因為強烈的原鄉意識型態，與寄鄉社會生活關係常常有所抵觸和不悅的事件發生，這也包括原寄鄉人對他者歧視，因此兩者的相互對立觀感，產生的陌生疏遠與刻板誤解就造就了排他現象。一樣都留居異國，不管是同族人或非同族的離散人，彼此間的瞭解更因為建立在同理心的出發點，彼此更能接受和包容，因為歸化於寬容多元的國家，大家的目標追求就是要擁抱一個更佳的生活條件和水準。

身處寄鄉為了尋求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優良環境，不同世代在衝突之間尋找符合自己的平衡點，因此原鄉的族裔血統以及寄鄉的新賦予身份，共同合成了混體身份；而寄鄉土地上其他離散族裔，在個別混體現象當中，呈現出族裔彼此之間不同的異質性。因此混體和異質性在離散文化裡，是不能忽略的作用與效應。此外，同化混體效用對於寄鄉的主流族群而言，新身份的擁有並非絕對等同於寄鄉的主流族群，這之中仍存有等級與階級的區分，依據該族裔所來自的原鄉，這也是導致異質性現象出現的主因。異質性不僅僅是標明其差異和可區別性，更是離散身份一個非主流族群的弱勢他者符碼，對於不同族裔的離散人而言，不論混體效用多寡，就是披掛一件「弱勢」與「他者」的隔紗。就如同霍米·巴巴所說的⁵，社會的差異從社會弱勢角度來看，是個複雜也持續在進行的協調過程，試圖尋求出現在歷史轉換中的文化混體身份。所以混體與異質性，其實就是對於身份本質的抵抗，另一方面牽涉到政治需求。

以上歸納的要點，即離散是橫跨單一界限區分的地域身份，探究文化上的、語言上的、族裔上的、國家上的重疊範圍，進而深入洞析離散者關於國家歸屬、種族族群、語言命名、他者主義、飲食內容、政治局勢等方面認同的文化建構

以及身份建構。它是一個擁有歷史脈絡，其歷史經由回憶、想像、敘述，或是遠至古老的神話，保有一個含有實質具體符號象徵的意義和影響，所以單一個體的人，佔據了整個脈絡中一個位置。即離散人的跨國主體產生了「文化身份是認同識別，是流動的識別或縫合，這些都在歷史與文化的論述中成形。不是一種本質，而是定位」(Hall 237)。所以離散人身份定位，是持續不斷透過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在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建構過程，藉由文化、語言、傳統、飲食、意識等等不同生活層面，看到該過程的轉變與流動。

以飲食文化為例：當一個文化與另一個文化相遇時，透過一系列的文化藝文和文化習慣的直間或間接交流，會促使人去思考自己與他者間的定位關係。在他鄉生活的離散人，飲食更是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遍及全球族裔和文化現象的復甦，必須被視為自我的表現與再現，引用食物當作自我的譬喻」(Ohnuki-Tierney 4)。從其中的飲食材料、飲食習慣、飲食用具看到自己與他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所以挑選的食物必定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食材。

離散人透過各種方式表現自我的身份認同，飲食文化是其中的一部份。但不管是從何種角度檢視離散人的身份認同，都與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有絕對的關聯和影響。因此，這五大因素是離散人普遍具有的生活型態和心理狀態，和離散概念帶出的離散思維。離散人保有原鄉在文化上與社會上的屬性與特質，並非絕對的雷同，亦非同化等於寄鄉人，然而確依舊與原鄉人十分相近，以這樣的文化和社會背景，透過自我相互交流而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習慣、風俗、信仰、意識、價值觀等等，相異於寄鄉上主流族群的生活模式，以此為生活準則，就是離散人一貫擁有的離散特性。然而這樣的特性經過一代代的消磨之後，因為寄鄉的同化元素逐量增加的滲入，而斷絕與原鄉的連結，那麼就喪失了離散最根本的基礎特點，也就不應該再稱這類身份為離散人。

第四節 離散文化中找尋認同

依循上述幾節對離散的脈絡與概念和它所賦有的特質，以及離散身份與認同透過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的影響而流動和轉變，所以一個身處他鄉的遊子心境，對於原鄉情懷的想像與思念，發展出一套不同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此緣故，離散人在異鄉中因為追求民族的聯繫與結合，至此獲得自我的滿足感和認同感，使排他性的文化心理結構的產生。此外，「在某種意義上，族群意識歸屬於某一種文明範式或地緣文化系統，這是形成民族力量和歸屬感的根本」（郭洪紀 3）。至此，離散人對家與族的歸屬感依賴，身處離散文化中是十分重要和支持的安定媒介。

「家族」一詞，是由家與族二字所結合產生的一個複合詞彙。家，可以是國家、家鄉、家庭，一個親屬共同居住的土地、共築的居住環境；族，則種族、族群、宗族、民族，一群擁有共同的血親、祖先、外表特徵、語言文化等元素。因此家與族的結合其產出的實質和字面上的意義是十分深遠和廣泛。另外，兩個層面相互合併的力量，讓人對家與族會有一股強烈投射情感和依靠的歸屬感。從個人出生開始，面對的依賴和扶養即為家和家人，在成長過程中，社會化的學習逐漸對家與國的認同和歸根，直到死亡的終點，還是回歸到家與家人的情懷思念，可想而知，家與族所帶給人一生的力量與聯結。人生常見的劇碼，是家給予流浪在外的人心靈上一種安定的倚靠，一個不論在外頭受了多少氣、多少委屈、甚至多少傷，都會一直默默守在那裡向你展開雙臂的地方，因為，在那有家人的鼓舞和支持，可以減低心中那份不安、沮喪和氣餒；同樣地將範圍擴大，家變成國家，家人成為族人時，當一個人遠在他鄉，遇見同樣膚色，說著同樣語言的原國家的族人，剎那間的慌張和不安也稍稍因為這樣的同族情結，心中油然而起一陣安全感和信賴感。這些都是人類普世情感價值中一份對最熟悉的味道和共同聯繫因而出現的情感歸屬，自此，家，家與族對一個人情感的歸屬是一股無形和有形共存

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強大的推手。

家與族的價值尤其可貴，那麼遠離原鄉居住於他鄉的離散人，對家與族的依靠和歸屬是在何處呢？從古典猶太人離散概念到殖民瓦解後當代的離散意義，各種因為時間、空間、歷史背景、文化因素、經濟條件等不同的條件，使離散者追尋不同的方向，造就遷移出原鄉的各種可能的因緣，同樣地，也因此影響了離散者看待原鄉和寄鄉的情感與情緒。當離散者自願性或者非自願性的從原鄉遷出居住在他鄉時，雖然定居於海外，是一個沒有限期的時間線，即有可能短暫的幾年定居，也有可能為一輩子的長期居留，然而，原本固有的身份所攜帶的文化和社會特質，踏入他鄉之後，與原鄉保有的集體記憶和屬性有著格格不入的對比，也因為寄鄉土地上文化種族優越感和文化歧視的合理性因素，便會支配一種排他主義的情緒發生，因而無法被他鄉視為一體，嚴重導致出現排他的現象。此外，對鄉土情中的家與族的懷念，離散者保有一種重返的思念，即使無法真正的付諸重返行為，但不減對原鄉歷史、傳統、道德、習俗、文化等等的集體記憶，藉此擴充離散人族群的族體價值、獨特性、以及地緣文化的個別性，使與寄鄉的主流文化、文明，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文化、文明有了顯著的差異。

檢視這些離散者的心理狀態和行為後，那份苦嚙失去的分離，對照著原鄉和他鄉今昔的滄桑和創傷，以及面對矛盾心情的現實困境，如此的生活體驗和遭遇。心中的轉變從一開始的他鄉的理想的生活環境，優渥的經濟狀況，良好的教育政策等的期望；到了第二階段踏入理想大地後，對事先的期待展開一連串對美好生活的追尋，然而面對身在他鄉的外在威脅的壓力，從語言、習慣、宗教、生活、社會至整個文化的差異，面對寄鄉一個排他的他者行為，產生一陣陣的挫敗感，最後因為這整個調適過程中經歷的挑戰，則產生一股失望與失落等等的心情轉折。人常常在於最脆弱的時候，會與自己最為親近和熟悉的人事物尋找慰藉和支持，從一個最小的單位開始則為共同在外的家人和族人，因為彼此間擁有高度相同的道德、哲學、藝術、習俗、心理情感等共同的文化信念和背景，身上流著來自同樣土地根源和共同族人祖先的血，外表型體有著相同的特性等多方面的屬

性，例如，膚色、身材、相貌五官、性格、和氣質等；此外，民族之間的情感連結，「民族主義的深層涵義是一個族群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並產生文化危機感時出現的強烈反映」(郭洪紀 3)，所以同樣居住在他鄉的離散者，族人間面對同樣的經歷，寄鄉給予不同層面的外在壓力的挑戰，使彼此之間更能產生同情與疼惜，對彼此的依賴以及一個情感歸屬的置放點。

不僅於此，從離散人的生活裡，觀察其中會發現保有許許多多與原鄉有直接和間接的相關事物、習俗，例如使用的語言、飲食的內容、文化物品以及含有原鄉特徵的個人物件等等，這些之所以保存下來，就意味著它是作為一種凝固了身在寄鄉的原鄉思念而存在的，是另一個十分重要的離散者情感歸屬，使得對家國的想像轉為對家國之愛的心理投射，更加凝聚民族血緣間的情感連繫，也是某一族裔文化及意識不斷提升的過程。所以從最小的單位家人，逐漸放大到最大的單位國家或者原鄉，都可以察覺到離散人心中那一份無法割捨，並且十分依賴的家與族的情感歸屬。

具體而言，家與族的歸屬感源自共同體的觀念，透過共同的語言、神話、風俗、價值、族名、族體等等的符號，並以共同祖先來自的居住地、歷史敘述、民間傳說、宗教信仰為文化的根源，以及土地的根源和共同祖先構成了民族倫理價值的重要核心，成爲一種獨有的文化模式、歷史模型、社會形態的民族之大概概念的泛化 (郭洪紀 5-6)，如此的聚落方式來找尋家與族的歸屬。

然而，在家與族的歸屬感之中，一個層面中出現了一個十分弔詭的情況，即第二代與第三代的離散人中的家國或原鄉的歸屬，是否如同第一代離散者如此的鮮明和強烈呢？原因在於第二代與第三代離散人出生於寄鄉中，在寄鄉的整體生活文化背景中成長，實際上對於原鄉的生活文化瞭解存有多少呢？是否與第一代具備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民族觀呢？對於自己家與族的歸屬自我認同、傳統及天性，是否會也隨著成長環境而改變，出現了原鄉文化上的同化、混體和異質性現象而轉變呢？如果以上皆是，這樣對家與族的歸屬感又在何處呢？第一代移民的離散族群和第二代與第三代移民後裔的離散族群間出現的不同情感歸屬，將依據

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五大因素來分析文本中的離散角色。

從上述綜論得知，離散文化的面向寬廣，則本篇論文將採取前幾節內容的離散概念之下的民族共同體概念，著眼在自身與自身、自身與他者、寄鄉與他鄉的跨文化間的文化身份認同，從飲食文化、語言命名、私人物品來檢視離散人在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之間如何建構自我的身份和找尋身份認同，並從中延伸至離散人獨有的特殊身份所面臨的他者處境。便是以如此的角度視野，更進一步分別來觀察與討論《閃亮閃亮》中族裔弱勢的身份與《野草花》文本中跨文化身份的尷尬。所以，以身在寄鄉和對原鄉思念的雙重注視與雙重經驗矛盾之中，移居和定居的階段生活，面臨到混體、異質性的接觸，家與族的歸屬位置等等的離散屬性，這些屬性雖然並非創新，但其獨有的特殊體驗與深刻感觸，讓研究者過目難忘。因此藉由辛西亞·角畑的《閃亮閃亮》和《野草花》兩本小說中的角色，帶讀者進入作品刻畫出來的感動，也引領研究者走進離散文化研究裡，認識如何從原鄉的思念到寄鄉的生活環境去尋找自身與自身、自身與他者、寄鄉與他鄉的跨文化間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各種可能流動層面。

第參章 閃亮閃亮

第一節 米食文化與身份認同

第二章的「離散」論述與討論，從為初始的猶太人離散，至二次大戰後殖民帝國瓦解引發的泛化離散，離散人在不同時空裡面臨不同的處境，尤其是身份認同與歸屬層面上，似乎很難具體和明白的告訴自己的確實身份與國族。然而，離散人因為跨地域的文化身份，從原鄉遷入寄鄉後，受到寄鄉文化的影響出現的同化與混體現象，與寄鄉主流族群更進一步貼進，但是與原鄉族群的疏離，以及寄鄉族群的排他情結，陷入兩難的矛盾局勢。因此，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影響，予以觀看離散人身份認同的發展。第一步就是從每天都要接觸的「飲食」談起，進而審視文本角色中，離散人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建構與發展。

一、米食文化的身份連結和追溯

自古以來，由於世界各個民族、族裔居住生活環境的地理、氣候、物產、習俗的差異不同，伴隨著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每個民族在吃的經驗累積上，孕育了獨特奧妙的飲食文化，並且塑造了特殊的民族性格和特色。飲食是人類身為生物必備的本能行為，雖然看似是一個簡易的活動形式，其中卻往往蘊含深奧且複雜的精神與意義，而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滿足口腹之欲。飲食更是人類生活發展史中一種重要的追溯與呈現的線索，透過漫長的歷史階段，從簡樸到精緻的表現，都可以摸索找到一個具體的文化代表。因此今日的社會，民眾往往會將某些獨特的飲食內容視為該國民族的飲食特色和個性，例如：印度的咖哩、英國的魚和油炸薯條 (fish and chips)、泰國的酸辣蝦湯、德國的香腸與啤酒、日本的壽司、中國的北京烤鴨、瑞士的麵包起司、韓國的泡菜、義大利的義大利麵、台灣的魯肉飯等等，如此五花八門的菜單，皆透露了包含各種可能潛在的民族性格與特

色。畢竟在文化之間，被人民選擇可以代表自我身份的食物，從過去到現在都是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深遠的象徵意義。

米食是亞洲地區重要的主食與產物，全世界高達百分之九十的米是來自亞洲，超過六成的比例是來自東亞與東南亞 (Ohnuki-Tierney 12)，日本則座落在東亞。亞洲各國對米的認知價值有所落差，另有各別的含意與歷史發展，日本當然也有自己的故事述說其重要性和代表。根據資料記載，西元前 350 年的日本原是以狩獵和採集果實賴以維生的社會，但隨著當時米這種農作物經由韓國半島從中國引進，日本從此漸漸轉型為農業社會 (Ohnuki-Tierney 30)。由於當時日本權勢處於佔地為王、各佔山頭的分裂狀態，米食仍是權貴間的稀有奢侈品，更被賦予神聖的角色。直到整個日本統一之後，米食便成為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的中心，之後發展出一種所謂的農業意識 (agrarian ideology)，從古代的帝國政府到後來的軍事政府，透過宗教、民間傳說、文化習俗，跟人民間之間維繫的重要性 (Ohnuki-Tierney 94)。加上此時的米，一直只屬於皇室貴族專用的食材，只有極少數的百姓才有機會食用，米的食用並非如同今日已經成為日本普遍的主要食物。一直到今天的日本，天皇仍是稻作收成儀式祈求產物豐收的主祭，米所象徵的意義遠遠大於實質的意義。

日本古代流傳的民間故事更是有不少是與米有直接的文化關連和含意。日本傳統中，富裕被比喻成黃金穀 (gold grains)，因為成熟的稻穗是金黃色的，而整片的成熟稻田隨風飄蕩如同一波又一波的黃金海，擁有整片的黃金海就如同擁有整個財富。黃金的誕生來自於神的賜予，使得黃金穀在民間傳統故事裡成為神恩賜給好人的禮物。眾多的民間故事，有些至今仍被頌揚流傳，而其中都有一個明確的表達象徵的主題和涵義，即米等於財富，是天神賜跟人民的恩典，也增添了日本文化意義的豐富性 (Ohnuki-Tierney 65-66)。此外，米被視為賦予含有神的力量，其中也象徵著米是精神與力量的源頭，代表著源源不絕的季節的轉化更新和新年來臨。所以在新年期間，米成為極為重要的貢品；米製品也是孕婦生產過後、孩童生病時、少年參加比賽前，必需採用的食物，作用為恢復體力、養精蓄

銳的營養來源 (Ohnuki-Tierney 74)。除了民間傳說的比喻，也有不少傳統俗語突顯出米的重要性，例如：吃冷飯，即表示家的沒落，沒了溫暖與安慰的幸福，是惡運降臨，因為日本傳統觀念上，飯是一定是要趁熱食用 (Ohnuki-Tierney 96)。

在日本傳統的鄉村社會，人民會彼此交流米製品並共享一桌，且一起食用同一鍋米飯，以表達人們間親近的關係，藉由食物的共享來強調強烈的團結感。因為一起吃飯，意味著自己是此團體的一份子，所以從單一個體的「我」成為了團體的「我們」，而不是「他們」，就此成了彼此認同交集的重要比喻。吃飯使用的飯匙也有聯繫團體彼此之間的象徵，原因在於日本傳統吃飯時，是由母親這個角色為丈夫、父母、子女盛飯，如果有親戚或者客人來訪，皆由她為大家服務，這表示母親角色為家的奉獻。母親長期以來一直是維持家庭團結的角色，「家被建構成女性的領域，家庭結構的維持被認為女性的責任範圍，而且準備食物更是日常生活作息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個簡單平庸的家常活動，只是社會建構下的普遍認知為此」(Mannur 34)。就此身為人婦與母親連結了彼此情感的團結和歸屬，展現集體「我們」的概念。除了共食米飯和母親使用飯匙的例子外，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日本認同象徵——稻田。稻田成為日本國的意象代表，因為稻田的美和變化，表現了日本的四季。因此日本的集體自我認同，是米和稻田的共同結合 (Ohnuki-Tierney 97-98)。

日本過去深受中國唐朝文化的影響，歷經多年的鎖國時期，至十九世紀開放後，發現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和新穎。在這過程裡，中國與西方世界使得日本在與他者之間透過鏡子影像的反映中，試圖在尋找一個屬於日本的形像、符號、和認同 (Ohnuki-Tierney 101)。其中米食就是日本的形像、符號、和認同的重要指標之一。雖然亞洲地區有許多的國家是以米為主食，但日本的農業意識型態卻細膩地表現日本米與其他國家的米不同之處，加上在許多不同的米食文化相互搓揉下，也就激發出新的意義。日本短白米，或者國產米，被日本人視為純淨之意，其意義是外國米所無法取代。原因很簡單，外國米不是出自日本國土、吸收其土地上給予的養份，更不是用日本純淨的水來灌溉；與西方飲食的區別，在於日本

自古流傳認為米是有神力給予人們靈魂，所以吃米的人類和荒野世界中彼此掠食的動物是不一樣的。這是因為人的靈魂有了理性和感情，加上佛教的傳入，因此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更與食用肉為主食的西方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基本上日本的飲食文化除了米之外，「日本的官方飲食是由魚和蔬菜組成」(Ohnuki-Tierney 106)，即今日大家所熟悉的壽司、生魚片、和火鍋類料理的主要食材。

總之，每一個民族和國家對自我的食物都有很強的情感，予以區分出自己與他者的差異。在今日的美國社會裡，普遍的認為亞裔美國人的代表食物就是米，與食用大麥麵包的美國人，和食用玉米薄餅的拉丁美洲人是不同的，從食物間明顯有了認同的差別。所以「每一次日本遇到不一樣的他者，米就成為不一樣的米，作為來自亞洲的米、米相對於肉，日本短米相對外國長米，日本短米相對外國短米，從過去到現在每一次米都是最好的自我表徵」(Ohnuki-Tierney 129)，這些都足足說明了日本人對米的看重，因為米代表日本的精神與靈魂。並隨著歷史發展，米和稻田已經成為代表日本人的身份認同、國族認同、國家認同。所以當日本遇見中國以及日本遇見西方世界，彼此間都會出現個別的團體集體共識，這是兩者間一個協商的對立過程，概念化自己和他者之間，個體族群間通常會因此變得彼此不相關連，飲食往往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尤其是談及到國家主義和身份認同時，即使離散人的單一個體也無法脫離如此社會文化脈絡。

日本的飲食文化既精緻美味而且包羅萬象。從過去到現在，先後吸收了中國文化並接納西方文化的影響，一方面不斷擁抱接觸異國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持續固守日本某些與現代社會相互衝突的獨特傳統。這正反映了日本社會在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的相互混合，新舊並存的影響下追求完美、開放、念舊的個性。更於食材、用餐禮儀等規範中，可體會到日本人對家族觀念有深厚的重視，並深刻感受到日本是一個富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族群。以上是日本境內的日本人生活外顯的行為。然而，身為離散人的日本移民者，其生活情況也盡如此嗎？接下來研究者將從辛西亞·角畑的作品《閃亮閃亮》中去尋找其中的離散象徵。

《閃亮閃亮》小說故事裡，小女主角凱蒂(Katie)的一家人，是日裔美籍的日

本移民，故事中描寫了他們遭遇的生活與環境的各種挑戰，其中「米」或者「米食」，更是他們生活飲食中不可獲缺的必需品。隨著故事的發展，作品中出現了茶泡飯、米果、飯團、先貝、米飴、糯米麻糬、清酒等相關的米製食品，這是否象徵與原鄉日本的一個連結符號呢？移民的生活裡，不論是自願性或非自願性的離散人，皆對原鄉的國家或地區保有一個集體的文化記憶、族群的團結和意識型態，更擁有那一股濃厚的懷舊情結，而其中，飲食文化的連續性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呈現部份，代表著離散人的特質。

上述是從米與自我認同之間的觀點，來切入米與認同的歷史和功能，對於離散人與原鄉集體懷念而言，雖然不見得具備明確的發展領域的知識，不過，研究者仍可以將自己對於米與認同關聯的看法，從藏匿於作品之中，讓讀者或研究者進行閱讀和研究時，並可以從米的在故事的象徵中，覓得字裡行間的意義。細讀《閃亮閃亮》之後，研究者找出米與自我認同在離散文化中所發揮的主要功用與層面：對原鄉的國家或地區仍保有一股濃厚的忠誠度和思念的懷舊感、凝聚民族血緣間的情感聯繫和情感歸屬。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閃亮閃亮》一書中，凱蒂一家人是居住於愛荷華地區的東方人，因為所經營的亞洲食品雜貨店生意欠佳，決定結束營業搬去喬治亞。身為日裔美國人的第二代與第三代，處於寄鄉文化的美式生活與原鄉文化的亞洲食品雜貨店之中，透過一系列的文化差異的直接或間接的、正面或負面的交流，在這樣的情況下容易觀察到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位置關係。因為凱蒂父母所經營的亞洲食品雜貨店，不是該地區主流食物和原有的飲食文化，只是針對來自亞洲的東方人為主要銷售對象，因此導致營運不善，這顯示了寄鄉文化會對這異文化的產物接受程度低，產生了亞洲飲食與美洲飲食之間的區別；同時，這也表現了凱蒂一家人食用的主食與當地民眾不同。雖然身在美國，但是仍是以日本原鄉的飲食文化為主。這初步

突顯了以飲食生活做為第一步與原鄉的連結。

爲了介紹米食文化與日本自我認同的關連，上述已探討過米食對日本人的文化表徵和內涵的意義。過去日本眾多的民間故事，有些今天持續被頌揚流傳，都有一個明確的表達象徵的主題和涵義，即米等於財富，是天神賜給人民的恩典，小說中描繪米的重要文化意涵：

每年我們都會一次買下許多大包裝的米，能買多少就買多少。這樣，一直要吃到最後一袋時，我們才會感覺到壓力。家中什麼東西都不可浪費。早餐，爸媽常用鍋巴做成茶泡飯。這次搬家，爸爸和伯父把我們店裡沒賣完的米統統裝到卡車上。卡車上有這些米，我看得出來爸媽覺得很開心。米讓他們有安全感。（角畑，《閃亮閃亮》25-26）

凱蒂家所開設的亞洲食品雜貨店的主要商品之一就是米，父母因爲有了米糧就覺得很放心，並且有安全感，除了米是在日本文化象徵財富，也是精神與力量的源頭。他們一家即將搬遷到喬治亞生活，面對新的未知生活與挑戰，人的心理難免會產生恐懼和緊張，尤其是剛結束一家人所經營的商店，挾帶失望與挫敗的情緒，在兩者的衝擊下，更是增加一家人的擔憂與壓力。然而，凱蒂的父母看見這些米，它所蘊含的文化力量，減緩了心中許多的不安。有了這些米，也意味著他們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吃媽媽煮的米飯，家中並不會因爲搬家而缺少了溫暖與幸福，此外擁有這些米，他們能在白人世界中找到與其他日本人的聯繫。

全家隨著勝久伯父一同來到喬治亞，定居柴斯特菲爾德小鎮。抵達的第一天，全鎮的六個日本家庭，共三十一個日本人，在那一天晚上將在勝久伯父舉行一場迎歡會，就在那一晚：

等其他日本家庭到達時，我們便開始大吃：鹹味飯糰、魚板、仙貝、米飴、和烤雞。其中飯糰是我唯一會做的東西。要做飯糰得先洗手，手掌上沾上鹽巴，再抓上一撮飯，捏成一團。我媽媽會做包了海苔和醃梅的別緻三角形飯糰，我只會做簡單的。等我年紀再大一點，我也要學做別緻的飯糰，要不然我會嫁不出去。（角畑，《閃亮閃亮》49-50）

這是一場只有日裔美國人參與的歡迎會。聚餐所飲用的食材，充份的表現了「日本的飲食文化」：鹹味飯糰、魚板、仙貝、米飴和烤雞，幾乎都是米製食品。整個聚會呈現了這群日裔美籍的離散生活狀態：第一、它呈現了這群日本人對原鄉飲食文化的保留；第二、它表現了族群孤立的窘困；第三、日本傳統米食文化的集體共食的意義。

首先，這群離散人以日本飲食文化作為與原鄉的集體記憶、鄉愁和族群意識的連結，其共同文化是來自米的食用所賦予之。其次，這場歡迎會中，完全沒有當地白人相關文化代表的出現，意味著他們強烈的原鄉意識型態，以及寄鄉白人族裔的有色眼光，具有典型的他者歧視意識，而產生了少數族群被孤立而無法融為一體的問題。最後，歡迎會上所有的日本家庭，同桌共食分享的米製品，這些米食來自同一鍋的米飯，如此的米食共用，意味著這群日本人彼此之間的親近關係，由共享共食傳達了族群的團結感與族人的歸屬感。凱蒂一家人也從單一家庭的我們，在這新環境裡與原先的日本家庭成了團體的「我們」。其中十分有趣的是凱蒂所說的那一句話：「等我年紀再大一點，我也要學做別緻的飯糰，要不然我會嫁不出去」（角畑，《閃亮閃亮》50）。傳統的日本觀念，母親會以飯匙盛飯給每個家庭成員，意思是說母親的角色是一個家庭凝聚團結的表徵，凱蒂言語之間透露著：如果自己無法為將來的丈夫與子女盡到基本奉獻，無法扮演好為人婦與為人母的角色，這樣家的團結與歸屬就不會完整。所以在此，無法製成別緻的飯糰，有著濃厚的日本文化意涵。

然而，歡迎會的食物中，出現了一道非日本傳統的菜色，烤雞，在滿滿一桌的日本料理中，十分的突兀，但這一隻烤雞則代表了美國人的飲食特點，也意味著雖為日本人，但是在寄鄉文化的洗禮下，飲食習慣上漸漸出現了混體的文化身份內化。離散人在文化身份認同中，會經歷雙重矛盾情結的認同問題，一方面原鄉意識的深化，告知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面對寄鄉文化的撞擊，必需找尋一個新的文化身份定位。不過對移民的下一代，則出現了更加明顯的飲食文化改變，試圖表現離散人在一代接著一代下的內化改變。

回顧以上米所象徵的日本人精神，是身份認同的因子，然而居住於寄鄉，從未踏入過原鄉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離散後裔，則在當地的主流文化中成長，也潛移默化的出現了寄鄉給予的文化內化：「平常琳放學回家後，我們會去店裡，在那兒研究半天，才挑出我們最想要的東西：多半是一個撒上糖粉的甜甜圈」（角畑，《閃亮閃亮》58）。甜甜圈是美國文化典型的食物，製造成份是由麥類捻成的麵粉，與米食兩者不同。「吃完早餐，我們做了一些野餐吃的飯糰。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用一部分的錢買甜草根汽水，剩下的買甜甜圈」（角畑，《閃亮閃亮》155）。吃完飯糰，決定買汽水與甜甜圈，顯示著凱蒂姐妹們對美國文化的融入。「就這樣，正方形一幕接著一幕，直到琳打了個呵欠。我知道比賽結束了。山姆坐在幾尺外，吃著飯糰和甜甜圈。多美好的一天啊」（角畑，《閃亮閃亮》158）。弟弟同時間吃著飯糰和甜甜圈更直接顯示了深受兩個文化的洗禮；外在是日本人的樣貌，內在則受到美國飲食文化的潛在影響，更進一步出現不自覺的身份混體。

除此之外，飲食文化的區別，在從中畫分出族群間的差異：

接下來的幾天，希莉想辦法盡快做完工作，好騰出時間跟我說話。我們請他吃飯糰和海苔，她把三明治分給我和山姆。三明治上的麵包真是不可思議，吃之前你可以撕開中間的白色部份，把它壓成硬硬的麵糰，或把它捻成長線，纏繞在舌頭上。山姆從沒見過麵包，他愛死了。（角畑，《閃亮閃亮》126）

此階段彰顯了凱蒂一家人生活在喬治亞所面臨的窘境：經過一段日子的生活，還未受到該地區主流社會的包容，明顯的排他效應，也包括這群日本成人的強烈原鄉意識，所以沒有將當地的食品帶入家庭飲食中，其中有兩個可能：第一、麵包的價錢是他們一家人無可付擔，第二、山姆的爸媽對寄鄉文化的飲食刻意保持一段距離，為了避免讓下一代忘本。研究者認為，後者的可能性遠遠高於前者。除此之外，凱蒂用飯糰與希莉的三明治交換是十分有意思的文化交流的舉動，凱蒂吃三明治有著融入同化寄鄉社會的主流文化，希莉吃了飯糰則意味著這為白人族裔對異文化的接納，也象徵著族群對立和排他意識的消滅。

雖然離散人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後裔會比第一代更多元，也更加融入當地的文化，甚至也可能認同自己是美國人。然而，因為整個日本家庭遭受到大環境的孤立，在這樣成長環境裡，除了家庭教育會傳達自己與外面的白人不同外，也會在自己成長的經驗去體會到，所以在即使出現混體的改變狀態，但深層內化的族群意識還是會保留在心中。當凱蒂與希莉隨同勝久伯父一家人去露營的途中，遭遇卡車差點摔進懸崖的瘋狂事，勝久伯父爲了彌補凱蒂便以米果和巧克力棒賄賂她不許將這件事傳出去，之後凱蒂說：「我拿了米果，巧克力棒給希莉」（角畑，《閃亮閃亮》206）。這似乎透露出雖然我們彼此接納與包容，但是自始自終我們都是不一樣的，因此藉由食物的分配，表現了後面族裔身份的現實差別。

檢示完飲食文化表現的身份區別與身份混體的轉變後，再回歸到米對日本人的重要性和象徵的意義。因為父母親的工作因素，自從琳開始生病後便都是由凱蒂照顧。隨著琳的身體狀態每況愈下，出院之後，「我每天坐在她床邊，餵她米飯和肝臟」（角畑，《閃亮閃亮》144）。根據日本傳統，米是作用爲恢復體力、養精蓄銳的營養來源。除此之外，其他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凱蒂不瞭解那些可以取到的西方食材能幫助琳的健康，在於凱蒂的日常生活中能觸及到的西方食物有限；第二、米食的食用對於凱蒂是普及的，該飲食習慣和價值深深默化於她的心理，所以直覺的飲食文化反應就是米飯。當然也有可能是經濟財源有限，無法供應購買其他食品，不過這不足以構成影響凱蒂只能選擇米飯的主因。重要的是上述的兩個原因，是基於凱蒂的父母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教育而生成的文化思維。之後琳逝世，凱蒂描述：「我開始幫媽媽煮每天要吃的飯，同時不忘天天替琳準備一晚新鮮的白米飯」（角畑，《閃亮閃亮》246）。雖然傳統上米被賦予有神的力量，是精神與力量的來源，四季的變化使新年到來，所以米成爲貢品是爲了表達感謝與尊重，另外米是有神力給予人們靈魂，因此也成了祭祀亡者祖先的祭品。由此觀之，米在日本人的傳統思想裡，不論是對於崇高的神靈、活著的人體、已故的亡者皆是十分重要，並不可忽視的精神與身份媒介的連繫與延續。

除此之外，重要節慶也是米食出場的重要舞臺。被主流白人族群有意識隔離

的日本人，在新年時期更加顯得團結和快樂，因為只要新年一到：

對日本人來說，新年是一年裡最重要的日子。自從搬到喬治亞後，每一年村本太太都會舉辦一場派對。她用清酒、糯米麻糬和各式各樣的點心招待大家。（角畑，《閃亮閃亮》212-213）

再一次以日本的角度來慶祝新年節日的到來，藉由米食製品等共享，來凝聚這群離散人的集體文化意識，交流生活的點滴。這過程裡，不僅僅是吃吃喝喝，也是成人之間分享各個家庭的喜怒哀樂的事件，彼此相互發發牢騷訴說大環境下，面對種種不公平或者歧視，所以這一場的新年派對，更進一步凝聚了日本人的族群意識以及強化了日本人的身份。

米對於日裔離散人身份的關鍵就在於持有日本原鄉股濃濃的忠誠度、凝聚民族血緣間的情感連繫和情感歸屬。米與其他食材如此的不同就在於米連結的時間與空間，土地與歷史是無法切割的。離散人保有原鄉的米食文化，以此食材做為自我、團體、族群的集體代表，米的符號代表在概念上與心理上被賦予強而壯大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食物與他們的食物就堅強的成了表達我們和他們的身份差異，這不僅僅是透過食物而建構「我們」的再現，也是透過食物的差別來區分與「我們」的不同，因此凱蒂一家人和其他日本人吃的米飯，就不只是簡簡單單的主食米飯了。

這一節討論的內容，是日裔美人的離散身份從米食文化的傳承，進而達到與原鄉日本的身份連結；也從分析中發現日裔美人從其他食材的取用，同化與混體的發生，與寄鄉美國之間獲得另一層身份連結，這之間也透露了日裔美國人，依舊無法融入當地白人的主流社群，仍是處於一個他者位置。接著，下一節，將從語言命名的角度，來觀察離散人的身份認同與流動，是否發揮了如同飲食文化的效果，以及面臨到同樣他者角色的挑戰。

第二節 語言命名與身份認同

一、語言命名使用的歸屬和根基

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免不了透過語言來接受訊息、實施指令、尋求協助、表達慰問、八卦聊天、進行協商、問候道安等等以進行溝通行為。這些溝通行為是日常作息的一部份，我們輕鬆地參與整個過程，也很容易地區分出不一樣的溝通性質與內容。例如，當在台灣聽到「吃飽了沒」，並不是真正問對方是否已經進食，而是一種問候之語並帶點關心之意，十之八九的回覆會是「吃飽了」，如果收到的回應是「還沒」，這反而會讓人感到不知所措。同樣地，當被問及「最近什麼時候有空啊」，指的是對方有活動要進行想邀請一起參與，而不是真的在問你具體的時間安排和行程。因此這兩個例子皆是使用語言來當作一種問候的方式，我們也從中瞭解當語言溝通在進行時，彼此之間在此建構一個合理的應答內容。

然而，如同這樣的語言溝通模式產生的意義中，可以觀察到「意義並非皆源自某些普世和通用的邏輯準則，而是從過去某特定脈絡裡的某特定族群為了達到某特定目標而生成，經由大量的文化、歷史、社會環境演變成型」(Hall 11)；也就是說「吃飽了沒」和「最近什麼時候有空」的意義是在台灣的文化、歷史的影響之下而塑造出來的溝通內容。因此，身在台灣，如此的主流語言的使用和價值關連，反映出台灣人整體歷史文化背後的社會政治權力的運作與建構，而且毫無疑問地，這樣的主流語言使用在台灣是被認可與信任。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樣的主流語言不是指官方語言，而是該地區通用且眾人所知的語言。

當一個人在使用語言時，通常都是採用自己慣用的語言系統裡所偏愛的用詞和用字，因為使用語言是基於自由意志，並且擁有絕對的決定自主權。畢竟，每一個體是獨立的單一單位的運作，可以表達個人的意念傳達和意義呈現。此外，「因為每一位個體的行為是由內在心理動機所驅使，所以每一位個體的語言使用

包含高程度的不可預期性和創意性，這出現在每一位個體根據個人身處的環境所需要的訊息和溝通型式的關連」(Hall 31)，也就是說當兩個人要表達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時，表達的語言是不會雷同的，而會隨著個人在此環境脈絡下的連結與經驗而產生不同的感覺。

透過個人在社會文化脈絡裡特別溝通行為，傳達上的不可預期性和創意性，將使一個人穿上這個社會身分的衣著，使用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瞭解角色的位置與關係，認識自己和來自非同一個社會身份的他者，在自己與他者的互動中斡旋，因為這些身份不是恆久不變或是處於穩固的脈動中，而是持續在每一次的談話和思考中，在當下時間與空間裡不斷的改變與成型 (Hall 46)。也就是說，在個人經驗中，我們不僅僅將語言使用當成是發聲的單一不變的意圖，也是在流動的社會中，用自己的聲音定位自己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因為社會行為是一連串的對話，有些是妥協，如老師與學生，有些則是拉扯，如所謂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在這些對話過程裡，每一個人都試著在這些位置裡塑造出更加符合自己的需求與目的。因此從這觀點來看，文化社會不是獨立於語言和語言使用者之外，文化社會是經由語言建構與再被建構，藉此反映其生活經驗，透過這些因素而成形的一個熟悉的空間機能。簡言之，語言是可以反映文化層面。

然而，必需先理解語言是一個抽象化的概念，它將真實世界具體的人、事、物，透過文字的描述而抽象化了。因此在探討語言與身份時，「使得我們去形塑自我的概念，而不只是簡單的成為自我」(Joseph 11)。從語言的角度審視，一個人的身份不是簡單的單一單位，而是一個「我的概念」使用語言來反映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等脈絡下個人經驗的構成。

不過，通常一個人的出生背景可以決定其身份，尤其是出生的地緣位置和區域，是促成第一個歸屬感的成立，成為歸屬於該地區一份子的開端。從最小單位的家、鄉、城至最大單位的國、洲。一個人身份會經由各種形形色色的團體身份的認領歸屬界定自己與他者，然而仍有些人會認為自己是跳脫這樣範圍圈套的界定，因為自己始終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只是基本上這樣的地緣使得國籍身份相同

罷了，例如：都出生在台灣為台灣人，出生於日本為日本人。所以「相同的身份原則是透過與不同的身份來區分，則獨有的身份主要是透過相同身份的類別交叉而建立」(Joseph 37)，換言之，身份是同時間包含有關一群人透過與他者不同之後而成立的相同性，以及處於相同的類別中一個人身份的獨特性。不過以離散人的角度來看身份界定，其根基建立在相同性上，畢竟歸屬社群會使自己有一份確切的身份，如果沒了，會出現內在與外在的孤立感而感到不安。此外，這樣的歸屬是透過與他者間的不同而出現的，他者之間容易因為文化、語言等等不同，導致不瞭解而產生隔離、衝突或者是敵意。

但隨著離散人遷往他鄉居住時，身份與語言的關係的改變衍生了對家與國的持有心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張國家的概念是一個想像的社群集合，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認識彼此、沒有見過彼此或甚至聽過彼此，國家只是一個形象化的比喻。現代所討論的國族主義，根本上不是自我意識的甦醒，而是它發明了一個不存在的國家。但薩依德(Edward W. Said)則有不一樣的觀點，他說國家並不是一個想像的抽象名詞，而是一種詮釋，根據不同的歷史角度來觀看，自然就有了不一樣的歷史觀和記錄。不論國家是一個想像的概念或者是一種詮釋，兩者間皆對身份與語言有一定的程度影響，即所謂使用的國語(national language)或者母語(mother tongue)。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以初步判定身份與語言之間的關係是溝通與再現，一個人的國籍身份、性別身份、族裔身份等等各種可能的身份，都是因為溝通與再現的表現；身份是經由自己認定而存在，「一個人的身份自我再現是來自個人對世界的再現而組織和形成。同樣地，於溝通中我們對所說的話與書寫的內容詮釋，藉由整合與塑造周遭我們溝通對象的身份來解讀」(Joseph 20)。在此語言亦指國語或者母語，不管是溝通或再現，它的發揮的功能是講同一個語言的社群裡有一個強烈的連結，國家的語言或者是母語不是被賦予的，而是國民之間共同認可的國族建立而成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之一；相對地，當放棄自己的國語和母語，經由新的語言建構自己的新身份，如此的意識型態在此過程裡可能消失，不過會依據

新語言的使用和身份延伸到外界的環境國家或整個世界。

若就以上述整個身份與語言的脈絡而言，語言的單位縮小至一個人的名字使用時，應當也是同樣的邏輯思維可以追溯。

命名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在所有的人事物上，而是人的天性根據不同的國族與地貌環境而擁有特殊的情感和獨特的感想。這些情感與感想會造就不一樣的命名。不一樣的國族與族裔也可能出現不一樣的感受，甚至連五官感受也會不一樣，如此的演變就會產生他們獨有的語言表達。最讓人耳熟能詳的例子即愛斯基摩人對雪有超過數十個的字詞可以形容。這樣的情況當然就不可能出現在沒有鄉同生活經驗的台灣。離散人居於他鄉的生活裡，母語或者原鄉的國語的保留，保有特殊的情感和獨特的感想，成了一種與原鄉連結的符號。因為當一個符號存在時，符號背後存有的意識形態並不會消失，換句話說，當人們使用語言為特定的信號時，他們的文化身份也包裹在這個語言文化中 (Joseph 167)，不同的語言包含不同的文字信號。然而這個語言不一定需要完全嵌進文化習性裡，它依舊保有身份溝通的傳播媒介功能。

離散人的族裔身份，關心著原先自何方來和即將往何方去，這樣的情況下大部份的人會給自己的名字一個特定的意義用以辨識自己。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保有原鄉母語的命名更是影響著自己對人生、世界和一切的觀點。因為有了名字，就會發揮語言指涉的意義，這意義也正是辨識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不同功能，也連帶著自己的族裔、宗教、和家庭歷史以及個人身份的符碼。大多數的人是可以說出自己名字的意涵、名字的故事、自己的家族歸屬、或者是父母親命名的動機與啟發等等，因為一個人的名字就如同一個人的一生，反映了其文化、歷史、社會的生活經驗，亦指「命名是讓一個事實獨特與真實的方法。這也就是為什麼使用對的名字與語言是如此的重要。」 (Chow 105)。

總之，語言(在此章節強調的為命名)是一個認識世界和再現我們思維的方式，也是與他人的溝通工具。經由語言的自我思維與溝通反映生活的文化社會，從一個團體的相同性和團體間的獨特性界定出自我的身份，以及身處的位置。同

時也因為自己國家語言的使用，背後隱藏的包含有意識型態表現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差異，以及語言符號代表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的身份表徵。所以下一節將以凱蒂一家人名字的語言使用，從原鄉的國語——日語，以及寄鄉的國語——美語，聲稱自己的國家、族裔身份，然後說話者與聽話者可以從這語言的使用去詮釋他們的身份歸屬。重要的是，從這名字的語言使用，可以觀察離散人的心理態度的轉變以及對下一代的期許，也可發現這樣的語言使用在離散文化扮演的重要觀點。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閃亮閃亮》小說中，凱蒂(Katie)與她的姐姐琳(Lynn)和弟弟山姆森(Samson)，和兩位雙胞胎堂弟大衛(David)與丹尼爾(Daniel)，這五位第三代日裔移民小朋友的名字都是以英文命名，不過於姓氏部份仍然保留日本姓氏——竹島(Takeshima)。凱蒂的父親與伯父則完整保留了日本的全名，凱蒂的父親姓名為竹島雅夫(Masao Takeshima)，而伯父是竹島勝久(Katsuhisa Takeshima)；凱蒂的母親名為清子(Kiyoko)，伯母名為富美子(Fumiko)。故事中並沒有提及凱蒂的母親和伯母的名字，不論兩位女士是否有依照日本傳統貫上夫姓，但是可以初步推論，母親與伯母應與兩位的先生一樣，都保有原先的日本姓氏。此外，故事中出現的金川(Kanagawa)夫婦與村本(Muramoto)夫婦，兩者只有姓氏沒有名字，他們與凱蒂的父母親為同一輩份，可以初步判斷出兩對夫婦的名字，皆是以日本名字命名可能性比例偏高。從離散角度所具備的保有對原鄉的集體記憶，對原鄉的歷史和文化有一份濃厚的迷思和思念，以及混體和異質性於生活經驗產生的狀態兩個重要觀點予以觀察，可以對這一群日裔美人區分出第二代與第三代所擁有不同層面的離散經驗。

首先，從凱蒂父母親的那一輩日裔移民的名字意義。凱蒂的父母輩雖然是在美國出生，但卻是回去日本接受日本教育的第一代日裔美國人；意思是凱蒂的祖

父母是移民至美國的第一代日本人，但未擁有美籍身份，而凱蒂他們為第二代的日裔美國人。因此，凱蒂的祖父母是以一個擁有完全異文化的身份背景來到美國，亦即使用的語言和母語是以日語為主，在美國生活而學習美語為輔，這是第一代移民必須面對的第一個挑戰。第一代日本移民族群踏進美國土地，原先日本文化、歷史、社會環境的深根，加上日語是日常生活的基礎用語，在這樣的脈絡下可以溝通的目標以及對象應是同一個族群團體的成員，也瞭解到，日語的使用，是根據第一代移民採用自己最後熟悉的語言系統，除了表現了自由意志和自主權，也宣示了自己的身份是來自日本的日本人。這樣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權，延伸至對下一代的命名，也是宣告自己的下一代與自己是同樣身份的表現。出於這樣的動機，凱蒂的父親和伯父才會仍保留了全日文的姓與名。這樣的過程，在與寄鄉的主流族群的語言使用上，自己對美國人以及美國人對自己雙方面產生了一個明顯的他者位置。他者位置可能導致的排他狀況，也正是離散移民者在寄鄉文化社會裡是絕對的挑戰以及無可避免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凱蒂的父母親雖然回去日本受教育，保有完整的日本姓名，是上一代的刻意行為，也是上一代所要灌輸的原鄉聯繫與歸屬。不同於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日裔美國人的生活環境、文化社會與所謂原鄉的差異，其經驗似乎也告訴自己所遭遇的種種一切，不管是歡樂或者悲痛，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被這寄鄉文化所影響，也隨著個人在此環境脈絡下的連結與經驗而產生不同的感覺。所以對自己的社會身份的角色、關係與位置的瞭解，完整的日本名字在美國社會中不斷進行著一次又一次與他者的對話。也就是說，這樣的個人經驗，名字的語言使用不僅是唯一且單一用於發聲告知自己身份的意圖，也是在這過程裡用如此的聲音定位自己與他者的關係與角色位置。上一節有談到文化社會是經由語言的建構和再建構，藉此反映了其中的生活經驗。所以在美國，其文化社會是被英語建構且再建構的，那麼說美語和擁有美語名字也正是這樣社會理當反映的狀態。反之亦然，凱蒂的父母親同時在美國講美語並且擁有日文姓名，反映了兩個文化社會並存於一個人的身份裡。這也意味著凱蒂的父母親不同於祖父母，他們的身份不是單純

的由出生的地緣位置和區域而促成一個來自同一個地區的情感歸屬，而是在這雙重並存的文化身份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換句話說，混體的心理反映已在此階段有了基本雛型。然而，他者之間容易因為文化、語言等等不同，導致不瞭解而產生隔離、衝突或者是敵意，仍然使同樣的日本族裔有互相依賴和連結的歸屬感。

以上是闡明第一代日裔美國人的可能心理狀態。一個人的身份自我再現與溝通透過語言命名的發揮效用之後，或許會產生對下一代進一步的改變。所以在《閃亮閃亮》故事中日裔美籍第二代幾乎皆是以美語命名，這直接反映了上一代在語言與身份的溝通與再現上的轉折，也是一個離散人在寄鄉生活文化的驅使之下，身份混體與異質性的明顯表徵。

首先，凱蒂、琳、山姆森、大衛與丹尼爾的父母親是出生在美國的日本人，而不是出生在日本的日本人；其次，這五位小朋友都還未回去日本接受日本傳統教育，是在美國接受教育。這兩項因素是區分第一代與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的基礎。最直接的文化吸收就在於語言上的使用，出生在美國，並未回去過日本，對原鄉日語的認識與薰陶顯然較低於寄鄉的美語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對日語是感到陌生及疏遠的：

我好愛那個字！年紀大一些後，便用 kira-kira 去形容我喜愛的每件東西：美麗的藍天、小狗、小貓、蝴蝶和五彩繽紛的紙巾。媽媽說我們亂用了那個字。沒人用 kira-kira 來形容紙巾。（角畑，《閃亮閃亮》11-12）

從故事一開始，讀者其實就可以觀察到雖然身為日本人，但是對日語的掌握度卻非常欠缺的。凱蒂與琳分別也有日語名字——夏子與秋子，指的是兩位小女孩出生於夏天與秋天。而弟弟山姆全名為山姆森·竹島一郎，意思是說第一個出生的兒子，即長子之意；這是語言背後反映的文化層面。這名字的取得是根據不同的國族與文化環境才擁有的情感與思維，這種思維與情感是影響著一個人對人、事、物的命名。儘管凱蒂與琳都有日語名字，皆非為大家所稱呼的，取而代之的是她們自己的英文名字。小孩子在年幼階段其實也不太瞭解，甚至不知道名字語言背後所隱藏的意涵與故事，更不會曉得有意識型態的存在，而是會隨著成

長的過程自己與他者的對話與交流之間，透過語言名字來溝通並再現自己的身份。小孩子的名字，是成人將自己的意識與意圖注入其中，所以在凱蒂、琳、山姆、大衛和丹尼爾的名字中，保有日本姓氏是爲了不能切斷與原鄉的特殊情感與感想，是一個與原鄉連結的符碼。但是美語的命名，一方是成人自己成長過程裡在美國遭受的對待，避免重蹈覆轍的遺憾，另一方面是混體和異質性在移民社群裡的深化效果。畢竟爲了在這個異文化的主流社會裡要佔有一席之地，必須學習去接受與融入，但並非全然的同化作用。加上美語的命名採用，予以告知著日本移民族群、美國主流社會的他者、和其少數他者族群，使用了美語爲特定的共同分享信號，也是期許在下一代的生活經驗中，與主流社會的連結能增加，彼此他者對立的情況能減少並且妥協。因此，以凱蒂爲主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透過同時保有原鄉語言與原鄉的歸屬，以及寄鄉語言的命名，兩者不同語言符號共存的思維方式，讓這樣的離散移民族群加以思考自己的身份詮釋與位置，也讓寄鄉的他者得以採取觀看這群特殊族群解釋的可能性。

第一代日裔美國人的日文姓氏與日文名字與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的日文姓氏與英文名字，在離散人的脈絡裡是一個多功能和自我反映的社活交流，藉由心理層面的影響塑造自我的意識和身份結構。語言作爲一個社會交流的媒體和溝通系統，名字使得小孩在此過程裡參與了社會文化體系和對話的他者，這之中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建構與身份主體的發展。這一次又一次的建構與發展不僅僅是依據溝通系統所導致，而是一種日裔美人自己對自己，與美國白人他者對自己的一種再現；因爲名字代表身份是語言本身如何運用、如何產生、如何演變、如何學習等等的發展，所以凱蒂與父親那一代的名字在這樣的發展脈絡裡是清晰可見，也判斷出一個人的身份歸屬不在於個體與誰溝通和交流，而是個體是被誰建構與再現，影響對其身份的理解和詮釋，給予一個最明確的定位。因此凱蒂一家人從年長至年幼的命名過程，都是一直進行如此的過程。

有這麼一種說法，就是當一個人會說一種語言，她/他可以掌握一個文化與世界，那對於離散人位處於重疊語言的特殊身份，應該就是掌握兩個文化與世

界，又或者可能迷失於其中。兩者之間的拿捏，就取決於離散個體自身對於所接觸的社會、文化、價值觀等等的態度傾向。



第三節 他者的區分與不同命運

一、白人優越意識的他者論述

身為移民他鄉寄居的離散人，從原鄉遷出之前就已經擁有原先的身份屬性和族群意識，自我的文化與社會思維方式顯然與寄鄉的原本居民族群有一定相當程度的差異。截然不同的內化價值深深影響兩者間對同一件事件的判斷與詮釋；除此之外，外在的實質樣貌條件更是反映了與寄鄉的居民族群的差別：膚色、髮色、五官、身型等等，都表現了兩者間的外在落差。以不同的「種族」角度以予畫線區分成一個鮮明的「他者」，因此就美國文化的白人族裔的角度，不管是社會或文化層面上，都對外來的「他者」族裔或種族持有一種典型的歧視眼光。

一般所謂的「他者」，簡言說就是不是「自己」，亦即在性別、種族、階級、習俗、文化等等，所表示的特性都與自己不同而產生的注視與觀感的差異。「他者」的身份形成過程是除了根據「我們」是屬於一個範圍內以及「我們」與誰的關係，也根據了「我們」不屬於其他範圍以及「我們」所恐懼和厭惡的關係。「我們」與「他者」主要意識界線的劃分就界定了國家和領土的範圍，以如此的框架展現一個想像的群體社群意識的連結，表現於同一領域範疇的一致認同，刻劃自己的方式，並且分享同一個文化價值。因此可以說「他者」的出現，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思維，並非一個具體不造作的實體本質，所以，當論及「他者」時，正說明與自己處在不同情況的溝通與對話中一個符號象徵呈現的型式，例如：膚色、種族、階級等等都是其象徵符號。

當一個「他者」的概念是集體代表時，是倚重其指涉國家的社會與歷史狀況，也隨著該國家的經濟與科學的發展，以及宗教信仰系統和語言系統的運作產生一個國族的身份，同時間也造就了一個核心的社會價值，聯合起該範圍界線內的所有人民 (Spencer 13)。所以種族和族裔成爲了他者的集體代表時，反映了其社會建構的產生，並決定著接納(inclusion)與排他(exclusion)兩個對立的條件。「他者」

的身份認同建構，不論是來自西方或者東方，任何可以區別的集體經驗，不同的差異處最終都是成為他者的建構重要條件，一再地被創造出來，也就是說他者的建構是一個流動的動態演變，不同的時空背景、歷史環境都是影響著一個他者身份的創造因子，不斷地詮釋和再詮釋。

「他者」論述通常涉及的範圍就是種族和族裔的區別。種族一詞的源來使用是指著非白人族群和表示文化差異：

十六世紀初期種族是生殖之意，同一個家族的成員來自相同祖先，如同其它字一般，是可以同時運用在動物和人類身上。種族的意思在十七世紀為一個國家或同部落家系的人民，也指示同一個地區的人民或者同一個社會階級的人，例如當代的英雄人物。直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種族一詞開始作為人類細部分枝的意思。（Fenton 18）

然而，實質上依據生物分類，劃分為界、門、綱、目、科、屬、種，從如此角度來檢視，人類都歸屬於同一種，若以十九世紀末一位學者巴倫(Baron Cuvier)，出版的著作《動物王國》(*Animal Kingdom* 1890)中對人種所提的基本分類，人種在分界上，區分成四大類別，分別為黃種人(Mongolian)、白種人(Caucasian)、紅種人(American Indian)以及黑種人(Negro)。不過這樣的區分從今日的全球化角度而言，尚待商榷並有不妥之處，種族應該不是黑人與白人的顏色符號差別而定，而是應當以族裔取代種族一詞，比較沒有帶有偏見和貶低的意函，並具有包容性且和緩的態度表現。只是在白人世界中，區別非歐洲白人族群時依舊慣用種族一詞。

至於族裔詞義的概念是，「今日族裔普遍被使用來指涉集體文化身份，當種族將其他外面的他者分類，族裔亦指共享同一個價值和信仰，是同屬於一個團體的我們」(Spencer 45)，簡言之就是同一族群的人分享了同一個文化、信仰、價值，即屬於同一個族裔。值得注意的是，現今美國族裔的使用仍然圈定於某特定範疇當中，即「族裔就是非美國白人的少數族群」(Fukao 3)。族裔之間的界線透過不同歷史經驗、文化價值、社會環境的交流對話過程而產生，所以族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斷地隨著不同因素而改變與流動，這些變動與流動可能是正面的

融合，也有可能是負面的衝突，不管是正向或者負向，都在持續塑造與申明彼此的身份。

因此當不同的離散族裔來到以白人族裔為主權的美國社會時，得面對強烈的白人中心的排他挑戰。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指出，對於歐洲人而言，以地理的視野觀看，在地域的劃分中，呈現的是兩個二元對立的想像世界——西方和東方⁶。從這樣思維走向，西方和東方之間就存在著絕對的差異性。他認為西方世界是理性的、已開發的、有非凡的人道價值觀；相反的，對於東方世界的解讀，則是原始的、未開發的、並且是卑微低等的。這是歐洲人「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所發展而來。以歐洲是唯一的世界中心點，以及唯一利益的思考出發點，一方面以歐洲自覺中的自我權力為中心，另一方面是構成西方人看待東方的角度，以這樣的對立二元意象，幫助西方自己對西方的定義和提昇。因此，歐洲中心主義下生活的歐洲白人，以一個白人的身份自我為傲，所以自然的擁有某些權威形式的姿態。他們也將身為白人的身份當成是一種理念、性格和存在的條件，更是與生俱來的強勢標記和特權，以「我們」白人的觀點永遠的超越非歐洲白人的東方「他們」。只要採用歐洲自覺為出發點，認為自己是開放的、人性化的、理性為強力後盾，所以更順理成章的就此為自己背書。如此的歐洲中心主義影響著每一位白人成員，這樣的白人意識並非個人獨有，而是一個整合的集體族群意識。因此它產生一種自動確認的標準，這標準就是白人意識的自我標準，只要將它判定黑為白時，那麼黑就是白而不是黑的絕對價值，所以經過歐洲發展史的演變和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的殖民統治，白人變成是一種優越，也是一個非白人得面對的現實情況。加上白人優越感的觀看和凝視，更深一層的將非白人的其他有色人種刻板化，並且將不同的他者簡化為單一不變的刻板類型，例如：中國人都是會中國功夫。因此深化了某種屬於負面的刻板與定型，再次組成一個等級之分的高低程度。

長期以來，美國文化與政治社會中擁有主導權和強制力，一直都是以英裔美國人為首。而他們也將歐洲中心主義的白人意識橫跨大西洋引入北美洲。回頭觀

察過去的歷史，留下的足跡訴說著，歐洲白種人的原本自我意識和對他者的鄙視的實踐，在美洲這一塊新興的舞臺上表現的更加精彩。從早期他們從歐洲踏入美洲後：

白種的早期移民已經一步一步地迫使北美印地安人後退，屠殺他們的戰士，攫取他們的土地，分隔他們的部落。他們把非洲人帶到美洲，為他們在種植園勞動，把中國人帶來為他們修築鐵路。他們閃爍其辭地大講自由的原而又從有色種族那裡收回了這些原則。（阿瑟·施勒辛格 22）

因此回首看待歷史的發展，白人逼退並屠殺印地安人，為的是土地利益；黑人奴隸交易制度成立，為了發展其農業利益；引進中國勞工，為了其交通建設的利益需要。過去的這一切，不管發展動機和項目為何，非白人的「他者」都是吃苦受罪的一方；「他者」在應該保護人民性命財產的法律下，只是被犧牲的一方，因為過去的美國律法曾經保障過奴隸制度，也曾經刻意的強調種族分化，甚至也實施過禁止移民排他條款的法律制定，一再的重覆顯示著白人文化意識對他者的處理態度和對待心態。因此以白人世界為主流的美國社會，一頁頁的歷史記錄透露著非白人的有色「他者」，在這一個強權社會中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與白人平起平坐。

依據上述的白人中心論述，不論是以種族或者族裔一詞對他者認定使用，白人族群世界對待其他有色族群世界，產生以我獨尊，貶低看輕對方那更是家常便飯，也正是如此非我族類的負面思考，蒙上了一層對與他者的不信任感。所以「像是黑人、紅種人或者白人用語都是政治和社會界線畫分，而不是代表真實分類的象徵符號」（Spencer 225），因此在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裡，非白人的有色人種身份，不再是一個簡單並且單純的人種分類或者族裔分線的顏色象徵，取而代之的是一層又一層的政治權力操縱和意識型態的灌輸。

整體而言，在美國，族裔身份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意圖。一個少數族群族裔缺乏和不同於主流族群所擁有的各種文化上、樣貌上等種種特徵，那麼這欠缺的部份就有可能也可以成為當家作主的一方，可以操作並駕馭之上的方向和作

爲。接著就依循著這樣的「他者」論述來檢視《閃亮閃亮》小說中凱蒂的日裔美籍身份所有可能經歷和生活體驗。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凱蒂與琳是日裔美國人，在外表上與美國白人有著不一樣的樣貌，「她跑去追那隻狗，黑色的長髮很快就消失在玉米田裡」（角畑，〈《閃亮閃亮》12），以及「她的雙眼和我的一樣，又深又黑」（角畑，〈《閃亮閃亮》14），呈現了與金髮碧眼的白人是有顯著的外貌特徵的差異。如此的顏色差異在「他者」論述中，兩者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環境下，溝通與對話裡產生一個象徵的型式：凱蒂一家人的日本東方身份象徵是黑色雙眼與秀髮，與西方白人金髮藍眼的對比，他者的建構在此有了第一步的劃分，也造成了種族或者非白人族裔在美國社會一個集體代表出現時，造就一層包含和排斥的二元對立關係的產生。

以自由、平等、人權等著稱的美國社會，依舊無法跳脫歐洲中心主義延伸的白人主義身份的思維，對於非白人族裔的鄙視態度與刻板印象，充斥在美國社會各個角落。以下的對話充份表現了一個白人自傲思維的他者歧視：

她拿開電話筒，對我爸爸說：「印地安人住後排房間。」她將一把鑰匙和登記卡堆了過來。

「我們不是印地安人。」我說。

「墨西哥人也一樣」。那年夏天爸爸常在後院工作，皮膚曬得黑黑的。

「我們不是墨西哥人。」我說。（角畑，〈《閃亮閃亮》38）

不論是印地安人、墨西哥人或者凱蒂父親真正的日本人身份，對於一個白人而言都是一樣的非白人的他者身份，因爲白人身份是一種優越的觀念，在白人優越感的觀看和凝視下，印地安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的不同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爲皆是他者的身份。白人對此的歧視並不會因爲印地安人、墨西哥人、日本人三著之間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改變，也正是這樣的觀看方式，造就白人對其他有色

人種簡化成單一的刻板印象。所以凱蒂父親只是單純的因為曬黑，就被歸類成印地安人或者是墨西哥人，也一再突顯白人世界的顏色界線是如此的二分法。也因為這樣的刻板化，突顯了白人在這樣的種族凝視的表現中，為自己與他者找到了一個等級之分的定位，高人一等的態度。

然而，白人優越感的是散播在美國社會中各個兒角落，因為當凱蒂全家來到餐廳時：

進餐館時，人們瞪著我們看。餐館的告示牌上面寫著「有色人種後面用餐」等。白人都坐在前頭。我們不知道該坐哪兒，因此，我們永遠叫「打包帶走」的食物。這裡見不到其他日本人，我們經常被人盯著看。有時候，白人婦女會彎下身來看我們，驚叫著：「好可愛啊！」有的甚至會撫摸我們的臉，好像不確定我們是真的，還是假的。（角畑，《閃亮閃亮》46)

凱蒂一家人選擇打包帶走的食物，一方面不認為自己是有色人種，所以不想選擇到餐廳後面用餐，畢竟這樣的思考邏輯是源自白人中心主義。另一方面，面對於坐滿著白人的餐廳前座，他們自己知道他們是日本人而不是美國白人，所以兩者抵抗之下一種尷尬油然而生，進退不得，因此選擇外帶。凱蒂對婦人的行為推論也顯示這樣環境下族裔的界線漸漸影響至她們看待自己和別人看自己的態度。即使對方是善意的表達，也免不了使得自己存有猜疑心，畢竟他者給予的形象建構是有絕對的影響力，可以改變自己對自我的形象建構，藉由建構的過程去瞭解自己在美國的定位和可能扮演的角色。

歐洲中心主義的白人意識在生活環境中也隨處可見。雖然不是刻意的種族教育宣導，但是白人父母的態度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下一代。重點也是著重於一個整體的集體族群意識所展生的白人自動確認標準：

「妳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出門買東西的時候，有些人不跟媽媽打招呼？」

「嗯。」

「所以有些學校裡的孩子也許也不會跟妳打招呼。」

「妳是說他們不認識我？」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們不想認識妳。」

「為什麼他們不想認識我？」（角畑，《閃亮閃亮》61-62）

白人小朋友和非白人族裔的小朋友，都會在這樣對立的氛圍中去感染到成人的態度與互動。白人小朋友會從父母親對待非白人的行為，找到白人自動確認標準的觀看模式，運用在自己面對他者的身上。也許在這過程裡會加深一層自己對非白人族裔的錯誤認知以及種族歧視，所以從中可以推論種族歧視的產生，家長的言行教育是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非白人族裔小朋友同時面對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從懵懵懂懂的單純想法，轉成體認到外界現實壓力的存在。因此也加深了小朋友在這成長過程裡一個身份區別的負擔和壓力。

尤其是這一層壓力與負擔對於人口極為少數的日裔美人而言：

「鎮上的人口超過四千，卻只有三十一個日本人，四千除以三十一等於……總之他們比我們多得多。妳懂嗎？」

「我不懂。」

琳的臉上帶著憂鬱的表情，這有些不尋常。「妳沒有注意到媽和爸的朋友都是日本人嗎？」

「這我知道。」

「那是因為其他的人都不願意和他們往來。那些人認為我們像是擦鞋墊，或者像螞蟻之類的東西！」她忿忿不平的說。

「螞蟻？」（角畑，《閃亮閃亮》62-63）

因此，第一代的離散移民族裔，和第二代與第三代的離散後裔，都得面對不同層次的他者歧視對待。出生於美國的第二代與第三代，即時在身份混體和文化同化方面的表現比前幾代更加卓越，但仍然得面對寄鄉土地上主流族群一個有色眼光的注視。在此，得思考到離散族群的後裔仍然與同樣族裔有親近的連結；一方面是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日本人身份，另一方面則是白人的排他行為，使得少族族裔不得不連結在一起以予找到歸屬和平等待遇。人類終究是群居的動物，無法完

全擺脫絕對的孤立和互動。所以凱蒂和琳的父母親友人都是日本人，並不是絕對意味著他們只願意選擇與日本人往來，而是美國的主流白人族群不願意與少數族群有交往，因此有了這樣的同族裔相互依靠的生活現象產生。

從過去到現在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以來的社會發展，卑微低賤的工作主要都是由非白人勞工從事。從黑人奴隸引進從事南方農業發展到中國勞工為首的修築鐵路工程，皆顯示著白人文化意識對他者的處理態度和對待心態。所以美國家禽加工業的發展可以看到都是日本人的身影：

辨識員的待遇是每隻小雞半分錢。為了得到這份工作，他們必須到芝加哥或日本受訓，小雞的性別辨識是日本人發明的，後來有個日本人到芝加哥設立學校，教日裔美人如何辨別小雞性別，爸爸就是在那裡學會這門技術。（角畑，《閃亮閃亮》180-181）。

也就是這樣，凱蒂的父親和勝久伯父等日本人，於當時的美國社會只能從事這樣的事業，而無法有所突破。即使擁有其他十分專業的技術與能力，還是受於限制：

「伯母，什麼時候勝久伯父會辭掉孵蛋場的工作，去當土地測量員呢？」

「親愛的，在喬治亞州，沒人會用日本男人當土地測量員。」

「妳怎麼知道？」

「他已經吃了五次閉門羹。」

「不過，他還是可以做他想做的啊。琳想當火箭科學家或者有名的作家。」

「妳們孩子不同。妳們年輕，世界正在變。」（角畑，《閃亮閃亮》210-211）

這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日本移民到美國，美國政府為當時制定一些法案，防止移民者侵占了本地白人的工作機會，當然這樣的法律，也是站在一個排他主義的立場上。隨著時代的變遷，族裔的多元文化在美國也日益著重，確實對未來下一代的移民族群提供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此外，當時普遍的白人排他主義行為與態度，一方面凱蒂身為日本族裔的美國人身份，另一方面母親從事的是當地認為卑微，並且非本地主要從事的汗穢工作，雙方面的合併也再一次加深了喬治亞州白人社會對非白人的日本人之排斥。

如上述的討論，這樣的歧視行為會由成人的示範延伸到小孩子身上，所以也就造成凱蒂不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家禽加工業是喬治亞經濟命脈的最大支柱之一。儘管這樣，還是有許多人對幹這行的人非常歧視，加上我的日本血統，這兩個理由使得學校裡的女孩都不願意理我。有時候，媽媽和我在路上遇到女同學和她們的媽媽，這些同學的媽媽根本不跟我們打招呼。（角畑，《閃亮閃亮》102）

不過，在故事中依舊有幾位白人角色對凱蒂他們有和善的互動，例如琳班上的葛瑞格喜歡琳、同班的女生安柏突破種族界線與琳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家禽工場凱蒂認識了希莉並成為好朋友、山姆遭到捕獸夾夾傷後，漢克·加文的熱心幫助送他們前往醫院。這些人物在離散移民族群間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關鍵點：除了有著種族界線往來的突破，也述說著有少數白人族群並不會抱著歧視的角度對待來自他鄉的其他少數族裔；然而，這只是少數的案例，當時以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上，多數人依舊帶著有色眼光看待非白人的他者，即使如此的少數友善案例，也並非表示著凱蒂他們完整融入且被接受為白人團體的一份子，依舊是自己過著披上種族隔離面紗的生活，只是在某些生活層面中有脫下這層紗的機會。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從這些友善的對待幫助及小朋友的交友圈情況來看，可看出一個社會包容上的進步、美國多元文化社會的成長，也看到下一代的離散移民族群在美國土地上，文化和社會對於個人身份混體表現和進一步的同化狀況。

最後一部分就是林登先生，猶如整個美國白人社會的象徵。他擁有好幾家的肉雞加工廠，如同美國的資本主義家，財富對他而言就是力量，有無盡的資源和權力；他有一座美麗的莊園豪宅，是過去黑奴曾經住過的地方，它潛藏著過去南北戰爭時那一段黑人與白人的衝突歷史。更重要的是，琳對凱蒂說：「林登先生擁有的每件東西，都是繼承來的！」（角畑，《閃亮閃亮》156），正是每件東西都是繼承來的，也包括了白人優越感和種族歧視吧！凱蒂也想過大人們常常說著林登先生的事情，他不需要像他們一樣付出許許多多的辛苦與勞動，需要為自己的生活計較每一分每一秒，是否也試圖在告訴凱蒂或者讀者們，當時身為他者的族

裔在美國是一種艱辛的挑戰。

究竟離散移民族群能對這樣不公平的他者歧視和非友善對待能有多久的忍受度，這部份應視個體在生活條件和環境中去調整，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不悅的心情會不斷在這樣的生活上發生，然而是否有具體的表現和表達就因人而異。凱蒂的父親似乎藉著摧毀林登先生的車子，以表示長期壓抑在心中那股不滿，「今天我終於看到他對不公平的事有不一樣的反應」(角焯，《閃亮閃亮》230)，凸顯了族裔族群在白人世界中因為排他(exclusion)的情況得被迫接受各個層面的不公平。

目前為止，採取族裔與種族的角度來看離散人的生活面，似乎可以確定一點的是他者的身份會持續在轉變並且反映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概況。差異一直以來是社會總體的一部份，當然這差異的層面也包括各個少數族裔出現。然而主流族群試著去否認掉這一層差異，並且藉由隔離和採取界線分離，勢必可以將他者排除在一個認定的範圍內，但是這樣的行動只是更加強調不平等的存在和反對多元包容的態度。即使第二代與第三代移民後裔非常努力地讓自身更能融入寄鄉社會、同化自己的身份，但看到的結果似乎並非原先所預期的那樣圓融，這就可以推測今日離散族群為什麼大多數依舊只能與相同族裔活動主因之一，因此也使得離散特質可以不間斷地延續下去。

第四節 離散族裔的弱勢身份

離散日本族裔的身份，經由第一代移民傳承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從中可以看到這一份日裔身份的保留與原鄉的連結，藉由米食文化的傳承得以顯現，也從小孩的名字命名中，得知原鄉連結的身份與寄鄉同化身份的交替轉換的過程中，反映了離散人面對外在大環境社會生活型態的心理態度；此外，更以一個跨文化的身份不得不接受寄鄉上的排他情結和白人強勢意識的壓力。《閃亮閃亮》的故事經由凱蒂的角度，帶出了一條離散移民族群在遷移美國之後，成爲一個弱勢族群的故事線，一一反映了身爲弱勢身份的挑戰與不平等。

弱勢是指在一個環境範圍內數量及力量都不及另一個相對詞——強勢。族群弱勢身份即一個族群在一個國家或社會中，無論在數量或力量上與主流族群所佔的比例是無法抗衡的，因此少數族群在這樣的環境中，會因爲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國籍等等因素，使得族裔的身份在如此的脈絡裡被再現 (Eriksen 121)，而且往往這樣的族裔身份就是一個弱勢族群的代表。弱勢族群與強勢族群或者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的關係，是一個流動與改變的相對關係，隨著國家政局與國際局勢不斷在重新更動彼此之間的界線劃分，因此不會有絕對的永恆不變。凱蒂的祖父母是第一代的日本移民，他們在日本出生成長，其身份在日本是屬於社會裡的主流與強勢族群，日本的原住民蝦夷人就是處於弱勢的族群身份。然而，橫越來到太平洋對岸的美國之後，遷移並定居於此。在這樣的寄鄉環境中他們反而轉變成爲一個弱勢的少數族群，與美國白種人與白人文化爲主的主流社會是格格不入，因此弱勢族群與強勢族群的身份是相對的流動關係。

他者的論述中有談論過族裔涉及的層面是一個政治議題，常常被主流社會視爲一個重要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主要包括了政府身爲主流族群對於這些少數族群的猜疑與顧慮的二分思維，因此有政策上的立法或者實施，況且「政府機構尤其容易採取兩分法的方式，來解釋政策的正當性」(石之瑜 37)。例如美國嘗試對

外來族裔的一些同化政策來達到一個共同族群的理想境界，也試著以同化效用去幫著移民族群獲得與主流強勢族群相等的權利、義務以其改善主流社會對他們的觀點、接納度和他們在美國的位置。這樣的同化政策不見得可以成功的獲得成效，但是確實可以看到這樣的同化作用，其背後潛藏著美國當局對這些移民的不信任的立場，同時也倡導其它族群對少數族裔固有文化的包容與尊重，以及鼓勵少數族裔對固有文化保存的兩手策略。此外，有些接受了同化政策並產生效果的移民族群，常常在這個過程裡喪失了原鄉的文化與自我。主要原因也在於寄鄉的主流社群對這些異文化視為毫無價值，因此移民族群接受寄鄉認可並推崇的文化價值。

除了同化政策以外，當然也包括主流社會每一位個體對他者族裔的包容與認識，這產生了另一個常見的移民族群的生活型態。美國主流社會的統治與掌握大多數是操控在白人的手中，於族裔層面上的所導演的戲碼就是隔離，亦即有意的展現將少數族群從頭至尾與主流族群分開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沒有生活交集。凱蒂一家人來到喬治亞州後，父母親的社交往來對象都是生活在此的日本人。他們大多數也是彼此的鄰居，與美國白人的生活圈是有一段無形的距離。凱蒂學校的同學也不與凱蒂往來，他們的母親遇見凱蒂的母親也視而不見，連最基本的打聲招呼的禮貌都沒有。就因如此的生活隔離，移民族群的生活圈只能局限於與自己相同族裔的日本人內，而且這樣的隔離主要是因為主流族群認為有關移民弱勢族群的一切都是次等的。當然這樣的排他與隔離並非是絕對刻意的國家政策，它只是在這樣的主流族群的強勢氛圍內，建立起一種持有的生活強勢與排他的意識形態的表現；這樣的意識形態藉由所謂族群優勢和階級差的認定與設定，有了一條族裔或族群界線的二元論產生。因此凱蒂的父母親在這樣的環境裡，不論是生活、工作、角色、權利都遭隔離效用得面對弱勢無能為力的委曲求全與有失公平。

難道離散的移民族群就會靜靜的接受這一切的不公正與不公平的欺壓與對待嗎？倒也不盡然。上述談到國家實施同化政策來試著解決一些不同層面的族裔相關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力量走向。不過離散族裔為了替自己爭取多一點的權利

和爲自己發聲自救，也爲了避免一切不必要和不公平的麻煩以及展現自我對寄鄉主流社會的忠心，予以降低這些無形但有意的不信任與猜疑。移民族群爲了使自己的身份更接近寄鄉的強勢族群，會自己採取自動的身份同化轉變，成立另一個由下而上的力量走向。這是在移民族群的第二代與第三代最容易產生的過程與階段，有意識的同化選擇則十分普遍。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凱蒂的父母給予他們的子女英語命名，以及他們接受美國的教育，與其他美國白人一起上課。採取這樣的行動，嘗試打破文化隔離以及生活隔離來達到一個最接近的美國人身份。雖然這樣的突破有助於減輕中間那一條無形的分隔線，然而在外貌特徵的差異上，使得族裔的刻板與誤會幾乎成了無法改變的印記。

不論少數族群是否選擇去強調他們擁有一樣的族裔身份，但是白人族群確會特別去點明並突顯它，就像凱蒂她已經與美國白人小孩的生活與心態十分接近，但是因爲她的樣貌與白人不同，而一再地被白人的大人和小孩提醒她與美國人是不一樣的。當然也有移民族群不會刻意去選擇同化自己，因爲族裔族群經由主流族群長時間的隔離之後，往來的對象都是來自日本的日本族裔，生活圈也都是以日語和日本傳統進行，所以免不了會看見有些個體不願意，或者是說沒有如此必要的同化步驟，畢竟猜想可能不會有任何改變。凱蒂的勝久伯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雖然在故事中無法明確推斷他是否擁有同化行動，但是當他曾經多次爭取土地測量員的工作一職時，吃了五次的閉門羹，只因爲他是日本移民後裔。這也就說明著即使勝久伯父有了同化效用，但因爲外貌的族裔特點，導致在工作上和權利上都沒有太大的改變，或者可以解釋爲不會有任何改變，所以同化效用是否存在都不再是重點了，終究是不會發揮效果。但這並非消極的指示同化階段是多此一舉的行動，而是指族裔的寄鄉同化效用並不會因這樣的過程進行就能達到完整的融入與接納。

每一代的日本移民族群面對的社會環境與條件都不盡相同，美國的社會環境也持續在更動。弱勢少數族群其實同時間也持續參與美國主流族群社會的運作與進行，即使隔離現象產生疏遠與距離，他們仍然是生活在同一個環境的個體；也

爲了改善如此的不公平並爭取自己的權力，一直不斷地努力加油，在白人族群強勢的環境裡，設法再現自己的族裔界線和族群身份，增加不同於白人片面的詮釋與誤解，最終的目標當然是爲了減少不公平的對待與差異產生的緊張局勢。改善並不是單方面的族裔力量就能完成，也不是改變個體自我的文化認同與身份同化，而是必須在這整個政治生態的走向中，去瞭解並掌握各種可能性的推動和改變。正如第一代與第二代的日本移民族群，和其他族裔一樣，來到美國所從事的行業與工作都是處於次等的社會角色與工作分配，幾乎是長時間的勞力工時且薪資微薄。這些都是弱勢族群常見的現象，不是沒有其他的工作選擇，而是其他的工作選擇沒有給予開放的機會。凱蒂的媽媽在肉雞加工場工作，因爲工場的其他白人員工想組織工會替自己爭取更多的福利，不論將來工會的組成是否成功，但凱蒂的媽媽卻在這樣的政治活動中，有可能改善自己原先意想不到的權利和福利，也增加了她表達的機會，因而脫離困頓以久的生活。

移民族群一代比一代多了更多的文化同化，心理狀態與外在的社會環境相互拉扯影響，身份弱勢的改善也似乎可以從時間的演變裡看到了希望，只是通常強勢族群還是擁有最大的權力，甚至可以決定少數族群要做什麼、該做什麼、或者是成爲什麼。以《閃亮閃亮》故事背景的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弱勢族群的身份差異、壓力，以及不公平的生活遭遇和排他情況，這樣看起來，當時的美國可以說是對於其他族裔移民和其後裔的包容與接受度甚低，儘管美國當時已經是一個族裔多元的國家型態。不過這樣的大環境，也使得不少的移民族群在主流族群的外在排他與生活面獨立發展情況下，相異於寄鄉主流族群的生活模式，得以延續保有離散特性。

第肆章 野草花

第一節 私人物品與身份認同

依據第二章「離散」論述與脈絡，檢視了《閃亮閃亮》小說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離散空間，日裔美人透過飲食文化與語言命名的使用來表現自我身份認同的歸屬，存飲食與命名看到與原鄉之間的連結，和寄鄉賦予新興文化的影響，展示了日裔美人的身份流動和認同，以及面對當時大環境下非白人族裔的他者位置。《野草花》的故事背景為二次大戰前與戰爭期間，因此當時的離散氛圍與政經局勢，對於日本移民和移民後裔更是處處充滿了壓力和緊張狀態。因此，同樣以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五個關鍵因素來觀看這個時期的離散人，身份認同與建構是透過那些方式而產生與發展，以及當時動蕩的他者處境。首先，將從文本中物品的使用來觀察這一層身份認同的關係。

一、物品符碼與情感投射

離散身份的日本移民族群從家鄉橫越寬宏廣大的太平洋，千里迢迢來到另一邊以自由與民主建造的美國夢想大國。從最大範圍的亞洲黃種人身份，到了美洲以白種人身份為主的國家，成為最小範圍的日裔美國人身份和歐裔美國人身份，這之間不斷地隨著自我與他者的一拉一扯的互動，在大環境的時間與空間下建構和再現自己離散移民的身份定位。一個人的自我身份是持續透過文化與社會進行一場又一場精彩細緻的建構、再建構以及互惠共同建構的戲碼。因此，離散的移民族群在這場戲中所扮演的角色，經由文化脈絡、場域、活動、行為與實踐的表現，一方面局限了個體行為與舉動，另一方面同時也供給一個嶄新的機會。因為這場戲碼表演中導演的位置不是由一個人所主導，而是呈現一個流動的主導位置，使得個體扮演的角色得以依戲、景、人、物的不同而可以調整。

一個人的身份建構無法跳脫文化與社會的框架，「透過社會互動構成的身份基本上是經由自我最接近的文化行為與活動產生²³」(Fuhrer 6)，即使是一對擁有絕對相同基因的雙胞胎和絕對相同的人格特質與個性，分別於兩個不同脈絡的文化社會裡生活，數年之後，兩者所展示的是兩套不同文化脈絡賦予的文化個人身份。這除了說明個人身份建構是深受文化的陶薰，文化認知也是使用者分享共有的集體身份概念；換句話說，日本人喜愛的生魚片飲食，是該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的文化身份代表，所以未參與這樣文化認知的局外人和集體，是無法對此感受到那股連結的氛圍以及從中的身份建構，這也就是意指身份經由文化脈絡、場域、活動、行為與實踐的表現。

文化脈絡、場域、活動、行為與實踐的表現中，生活在同一個文化裡，不同的個體可以在這文化各種層別中，找到並分享其代表的意義或是符號，經由這些意義和符號找到集體身份概念的接觸點，包括人、事、物等都可以是同一個文化認知底層下的一個符號意義代表。不過並非單一指這些人、事、物的概念意思，而是這些人、事、物背後集體共同分享的隱含或是明示的意義。例如：2006年台灣社會出現穿紅色衣服的熱潮。這一股紅衣潮是特別標示出一種集體的訴求——「倒扁」，即反貪污的社會運動。因此，沒有這一層共享的文化認知，不會瞭解這紅衣符號的意義。

從這一層符號與文化認知的連結來思考身份認同時，自我的身份是一直根據不同的物質符號在進行建構，這物質符號指的是有形和具體的物件、人、甚至地方，從這一層建構「身份成為我們瞭解我們自己是誰和其他人是誰，並且，也讓其他人瞭解他們自己和包含我們在內的他者」(Jenkins 5)。因為一個人會將自我的身份情感投入在這些具體的物質符號中，將部分的身份寄託於其中，讓自己或部分其他人從中去認識一個人的身份和特質。這樣的身份置放階段是從孩提成長過程裡就開始陸續發展。例如，男孩普遍熱愛的玩具是鐵金鋼模型或者恐龍怪獸模型，女孩則偏好可愛的絨毛娃娃或者芭比娃娃。不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會對自己的玩具有一種寄託的情感，因為玩具象徵著父母親不在身邊時，一個可以陪同

的對象以及提供安全感。此外，小朋友也時常將自己的心理狀態投射在玩具身上，藉由與玩具的對話反映小朋友的心情與感受，初步表現自我的身份建構。逐漸地小朋友學會玩具物體是取代父母親不在身旁的象徵陪伴，也慢慢體會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所以物質符號呈現自我身份，是從年幼的兒童階段所開始的。即使小朋友長大成人後，這一種對物體的身份投射不會中斷過，甚至對於大部份的成人而言更加看重，因為它所持有的物質事物可以幫助一個人更明確的界定自己的身份位置；被視為重要的物質事物敘說了一個人一生的故事，所以會將它留給下一代去緬懷；另外許多的成人情緒反應會表現在所珍愛的物質事物上，因為它等於他 (Fuhrer 15-16)。因此可以發現，這些物質物體所代表的是一個可以告訴他者自己身份的符號，他者也從這些符號中去定位使用者的位置與身份。

然而，這些物質物體所表現的身份符號不只是單一的象徵。物質物體同時也是一個穩定劑和潤滑劑，它可以安定擁有者的心理狀況，並且是一個驅使行動前進的力量。例如：有人出遠門需要帶著一條自己專屬的毛毯才可以入睡，其他毛毯都無法使他入睡，這就是穩定劑和潤滑劑的作用。所以這一個物質物體除了是一個自己身份符號的象徵功能，也有穩定和潤滑的功能。隨著人的成長，物質物體的身份符號的表現會根據不同階段而有所改變，不管是長期或者是短期，這些物質物體都是過渡性的 (Fuhrer 31)。身份的基礎點是我，我所擁有的某物質物體會在某階段有著強烈的情感投入予以表現我的象徵；但可能會因為新物質物體出現取而代之，也有可能自我的心理狀態的改變而對於這物質物體不再有那一層強烈的連結，因為漫長的一生「一個人的身份不會是停息的終點站」(Jenkins 5)，每分每秒都在變動，因應不同時期的不同轉變，因此在人的一生中會有數次這種過渡性產生。這種情況的發生，最容易出現在移民族群的身上，因為在橫跨兩個文化的身份衝擊下，為了與原鄉文化保持親密的聯繫，會持有與原鄉過去有關的物質物件，但也隨著於寄鄉的文化混體和同化，出現該寄鄉文化的相關物質物件，直接與間接述說著融入了寄鄉生活也與原鄉的文化不再雷同，所以勢必出現這樣過渡性的物質物體符號。

一個人的身份形成是在文化與社會互動中，以各種方式和活動在建構與再建構。生活在於該文化與社會中會分享共同的文化認知，以集體方式訴說著與非同文化社會的他者的身份區別。個人則在該文化與社會中的生活裡，從私人擁有的具體物質物體，賦予符號的功能以代表著一個人的身份。因此，本節將採取以上個人與物體符號的身份建構，來探討《野草花》中日裔美國人的離散族群遇到危機，如何從這一層關係來表現自己的身份，也同時檢視危機中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因為「扮演的角色不是為了保留而是協商自己的文化身份，對於他們而言，機會出現是有危險的，但這危險就是一個很好的轉機」(Chow 25)。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野草花》的故事背景是建立在二次大戰日本突擊美國珍珠港前，以及美日戰爭的過程。此階段的日裔美國人面對的外在挑戰，應該是從日本人移民至美國的歷史中最有挑戰和故事性的一刻。生活在加州務農的日本移民族群，在耳聞原鄉日本對他國的侵略以及對美國的挑釁，個個坐立難安。有些人認為美國會以他們為人質反制日本，有些人則認為美國和日本不會有戰爭發生。然而，就在日本突擊珍珠港的消息傳達到這一群日裔美國人時，身份的角色位置面臨了一個很大危機。

日裔美國人認為他們自己也是美國人，政府是有義務保護他們；但無可厚非的，日本人的身份仍無法從中免除，反而帶來更多的麻煩。澄子的爺爺是第一代來到美國的日本移民，但不是美國公民。而澄子的伯父也不是誕生於美國的美國公民，所以在美日決定參戰的同時，不屬於美國公民的日本人被特別安置在獨立的集中營，因為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日本人身份有絕對的不信任感。

澄子的爺爺與伯父是典型的離散人，離散移民族群對原鄉保有一個親近的連結，也從這些與原鄉的連結來說明自己的身份，所以離散移民族群，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對自己的原鄉身份有更強烈的歸屬，他們會將原鄉帶到寄鄉的東西予

以保留，一方面是對物品的情感寄託，另一方面就是身份的告知，因此美國政府對他們有強烈的警戒心。這些離散者保有的原鄉東西是可能含有原鄉文化認知，讓同樣是日本人的離散族群得以分享集體的身份建構。

除此之外，身份的開端是由我而開始的。所以一個人擁有某件物品和東西會有強烈的情感投入，也是表現自我個人身份的符號象徵。所以當澄子的伯父與伯母知道日本攻擊珍珠港後，他們認為美國會採取行動，最直接的可能性目標就是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因此他們決定焚毀象徵日本人身份的各種物品：

接著伯母通知大家，「我們必需燒掉我們的東西」。她轉向澄子，「快去拿你練習日文的習字簿」，並轉向孝雄且說著「找出所有我們的日文書籍和雜誌。」（角畑，《野草花》48）

澄子是第三代的日本離散後裔，她離原鄉文化的日本記憶是遠遠不及第一代和第二代，甚至是陌生的。然而從她的日文習字簿可以看出長輩對他的教育有一部份強調她是擁有日本人的身份。雖然出生於美國為美國公民，說的是美式英語，接受美國的文化教育，然而從這日文習字簿的存在表現了移民族的日原鄉身份建構。只是年幼的澄子，還不瞭解這一層與日本的關連，在這複雜的政治背後與戰爭期間所帶來的一個衝突點，所以當伯母說：

「任何會讓人起疑心的東西」。

澄子說，「但為什麼？起什麼疑心呢？」（角畑，《野草花》49）

在這段簡單的對話，澄子的兩個疑問試著在透露美國政府或者是美國白人會對他們所採取的負面行動。對一位出生於美國具日本血統的小朋友，外界政治環境的紛擾和她單純的想法，是無法理解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一方面她可能覺得她是美國公民，是政府有義務保護的對象，另一方面認為她沒有犯任何錯誤。然而，從澄子的伯母角度，伯母知道美國政府會因為日本攻擊珍珠港，將仇恨轉移至生活於美國的日本人，她也知道即使她們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最大的錯誤就是日本人的身份。

以上論及到身份的展現是會藉由個人擁有的物品，以物質符號的樣子表達，

所以讓人會起疑心的東西就是指與日本有關連的任何物品。擁有這些原鄉的物品除了表現自己還是一個日本人的身份之外，另一方面，卻因為自己仍擁有日本人的身份，使得美國政府當局會去質疑其效忠的國家是日本還是美國。面對原鄉日本攻打寄鄉美國的雙重矛盾的局面，為了自身的安全與想繼續在此安居樂業，必要選擇一個最符合當時利益的決定。

澄子一家人和其他的日本鄰居挨家挨戶都焚毀一些物品。有些鄰居的火焰和濃煙特別猛烈，可以判斷出他們保有更多與原鄉身份有直接關連的物品。當澄子還懵懵懂懂不清楚的狀況之下仍需要焚燒一些物品，尤其是她的習字簿，就在此刻伯父對她說：

「照片中有一幅日本國旗」，伯父說著，「保留它會有危險的。」（角畑，《野草花》50）

這張照片裡是澄子已故的父母親，也是唯一僅存的紀念照片。要焚燒這張照片時澄子更加的反彈，雖然她轉向爺爺祈求能保留這張照片，然而爺爺並沒有支持她。畢竟爺爺和伯父都知道照片中的那一面的日本國旗，可能比日語雜誌和書籍更加的危險，因為國旗的符號象徵所表現的身份意義，會比其它單品表現的身份意義來的更加強烈。國旗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日本人的身份表現，也會直接使人連想到一個人他願意效忠的國家選擇；換句話說，國旗的符號意義是不同的個體可以在該文化個種層別中找到並分享所代表的統一意義。

隨著焚燒的東西越多，澄子似乎更不能瞭解這一切，所以當伯母要她進屋去找更多的物品時：

她不曉得什麼東西會被認為是表現「不忠誠的」。假如連習字簿都是非忠誠，那麼日本絲綢扇也是不好的東西囉？那她的和服又該怎麼說呢？無疑的和服一點都不是危險的東西。（角畑，《野草花》51）

事實上，焚毀這一些東西的危險並不是澄子想的那一種危險。習字簿、日本絲綢扇、和服、日本國旗、日文書籍和雜誌，這一些日常物品的危險是建立在於離散人與原鄉的連結，這一份連結也是身份的表現。美國白人會認為這些東西是對美

國不忠誠的表現，這是由於當時仇日的現象所致。日裔美國人的日本血統是無法抹滅的事實，但經由焚燒的儀式表現與日本物質符號象徵的斷裂，企圖來說明他們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所效忠的國家是美國。也因為建構一個人的身份是持續不斷的篩選和轉型的過程，同時間如此的身份建構會進階影響著個人的行為和思維，所以切斷這些擁有日本身份特質的物件，減少其中與這些物件的日本身份可能的行為和思維，達到更接近美國人的身份轉型。

雖然焚毀了與日本一切相關的文化物質符號的東西，仍沒有實質上為他們避開不必要的麻煩。沒有美國籍的澄子爺爺和伯父被移送到如監獄般的集中營，澄子和她的伯母、堂哥、弟弟則和其他有美籍條件的日本人被送進另一個自由性較高的日本集中營。此外，澄子對焚燒這些東西的總總疑問並沒有獲得解答，畢竟對一個小女孩初次碰到這樣大環境的政治紛爭問題，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的身份思考層面還得持續從她往後的人生經驗中去學習。因此她只能從主觀意識去判定周遭發生的事件中，盡可能找到能滿足自己的答案。然而，在澄子長輩的心中，焚毀東西的舉動減輕一些不必要的心理恐懼，並且可能遠離不必要的麻煩和結果。所以在這一個過程裡，可以看到的是離散人的原鄉文化的相關物質符號物件，就像文化一般，不僅僅是一個表現「我是誰」的反映象徵，也是一個告訴他人「我將成為誰」的思維表徵。

第二節 弱勢族裔之間的互動

一、白人族裔的排他論述

遷移他鄉的離散人，在遷出原鄉之前保有原先家鄉的身份意識、族群屬性、文化與社會的思維方式及走向，與寄鄉的主流族裔族群有明顯的差異。其文化和社會的思維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習俗、語言、價值等等的思考與判斷，因此面對同一件事情時就會出現不同文化社會思維的詮釋和解讀。種族(或者應稱族裔更加貼切)的外貌和體型也是呈現一個與他者不同的感官，所以在他者的劃分之下，膚色、五官、體型等等都是有顯著的差異。特別是亞洲東方的亞裔族群與美洲主流的白人族群之間的對比一覽無遺；加上美國文化中白人族裔的有色審視，在各種文化和社會層面上都會對所謂與自己不同的他者持有一個典型的歧視觀感。

上一章第三節談論到「他者」的定義與意涵，即在性別、種族、階級、習俗、文化等等方面所表示的特性與自己擁有的不同，而產生差別的注視與觀感。「他者」的身份形成過程除了根據屬於一個範圍內的「我們」以及「我們」與誰的關係之外，也根據了不屬於「我們」的其他範圍以及「我們」所懼怕厭惡的關係，在他者的內容中包括了接納(inclusion)與排斥(exclusion)兩個對立的條件。族裔作為他者的畫分，是不同族裔之間的界線透過不同歷史經驗、文化價值、社會環境的交流對話過程而產生，所以族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斷地隨著不同因素而改變與流動，這些變動與流動可能是正面的融合，也有可能是負面的衝突，不管是正向或者負向，都在持續塑造與聲明彼此的身份。因此當不同的離散族裔來到以白人族裔為主權的美國社會時，得面對強烈的白人中心的排他挑戰，但是同時也更能瞭解彼此的困頓和危難。

飄洋過海來到美國的日本離散移民和原先就住在美洲大地上的印地安人，兩者皆為美國社會的少數族裔族群，在美國建國以來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背景。但

相同的是，兩者都是遭受排他待遇的對象。長期以來，美國文化與政治社會的主導和強制一直都是以英裔美國人爲首，他們將歐洲中心主義的白人意識橫跨大西洋引入北美洲。在美國建國以前，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荷蘭都試圖佔有美國的控制權。在當時，印地安部落曾經與這些國家結盟過，而獲得最大部落支持的英國最終贏得勝利。然而有些印地安部落爲了防止白人社會的擴張而與英國國王簽訂協議 (Mclemore & Romo 290-291)。接著越來越多的英國商人、新移民、政客等陸續設法說服印地安人進行交易和割讓他們的土地。但是終究來者不善，多數土地都是以欺騙和詭計不法手段獲得。隨著美國的建國，美洲印地安人與白人的相處情況每下愈況：

獨立戰爭時並非沒有內敵，這個敵人就是印地安人。美軍相信印地安人與英軍有所勾結，這卻是個歷史矛盾。因為，在波士頓的獨立宣告茶會上，美國領袖穿的正是印地安人服裝，以求凸出英國的老舊墮落與美洲的新鮮活力之間有如天淵之別……因為他們曾經一再地用英國文化的立場，將印地安貶為野蠻的一群，而且在開拓西部的過程中，不斷自以為是滿懷好意地要摧毀印地安文明。（石之瑜 21）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之後，隨著一方面白人族群的勢力強勝壯大，對彼此簽訂的協議不再有義務遵循，另一方政府運用權力成立印地安事務局 (BIA,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將印地安人安置到不同地區的保留區生活並予以監督，更在美國內戰其間與戰後，出現越來越多的印地安人抗爭 (Mclemore & Romo 295)。爾後，印地安人就彷彿成了原鄉土地上的被殖民者，權力、義務、自由、身份都由美國聯邦政府決定，而不是自己的印地安族群。而從離散的觀點來看印地安人，他們也是擁有些許離散人的特質以及類似的遭遇：被迫遷離原鄉來到保留區，雖然居住在保留區生活，但仍然保有原先的文化、語言、身份、傳統等等屬性。當然這並非聲稱印地安人的歷史得以向世人宣示他們是離散人，而只是說明他們擁有與離散人許多相同的特點。

因此，就白人族群對待其他有色族群世界，似乎擺脫不了稱霸爲王的強勢心

態。自從美國建國以來至二次大戰前後期間，從印地安人、黑人、亞裔移民等等的有色人種身份來看，這些族裔族群身份成了聯邦政府政治政策下和社會畫分的一個界線，「他者」也不單單只是一個有色族群的象徵符號，而是一層層政治權力和意識型態表現的舞臺。就以上觀點，美國印地安人和移民的日裔美國人，兩者都不是白人社會裡的主流族裔身份；來自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生活條件以及經驗，而且「二次大戰初起，日裔美人成了內在敵人，證明了彼等原本只是一群內在的殖民對象，他(她)們被大規模地遷移拘留，待遇不比印地安人優渥」(石之瑜 22)。然而，印地安人和日裔美人都擁有強烈的族群意識和獨特的鄉土情，也試圖延續自己原鄉的文化、語言、習俗、宗教、價值觀、意識。

因此，在同樣面對白人族群給予的不公平對待與排他歧視的有色注視下，似乎是生活在異地的局外人，兩者不是同一族群的弱勢族裔，對於彼此似乎更有寬大的包容心，也似乎因為以同理心為出發點，即使沒有完整的包容，也或許有些刻板印象的產生以及誤會，但是彼此似乎更能瞭解彼此所面對的困頓以及展現更寬廣的接受度，而超越單一的白人優勢由上而下的欺壓。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澄子與她的家人隨同其他日本人被安置在亞利桑那州，一個沙漠環境的集中營。充斥在營中生活的，除了外在環境的炙熱、蠍子、響尾蛇，以及內在心理的不安、擔憂、猜測，就是平淡無聊的日子。小孩子不遵守家長的規矩，到處亂跑、撒野，大人漫無目地的打發時間，過一天算一天，就這樣漸漸走進一個慣性的生活步調。澄子有一天在這樣的生活中認識了一位印地安小男孩，名叫法蘭克。當時澄子與一位名叫小倬的女孩子在營區外圍看見一群印地安小男孩時，她對澄子說：

「是印地安男孩」，小倬私語說著，「他們不應該出現在我們的營區中，假如我們被抓到，頭皮會被他們剝下。」……「剝下頭皮後，他們會

將我們的手指剝掉並水煮它。」（角畑，〈《野草花》121〉）

小倖告訴澄子這一件恐怖且野蠻的可怕事件，讓她們倆在看到印地安人時驚嚇感油然而生，導致當她們被印地安人瞧見時，小倖更是嚇到拔腿就跑，如果不是澄子腳下那隻響尾蛇使她動彈不得，想必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失。這邊可以看到他者論中一個顯著的例子，亦即在族群或者族裔彼此之間的不甚瞭解，不論是文化、樣貌、宗教等等往往會將對方的誤會，簡化為單一方向的刻板印象，將他者定型。小倖對印地安人的瞭解，似乎停留在與野蠻人是相等的，他們是一群未開化並且沒有文明的族群。這並非是小倖的錯，只是在當時印地安人被圈限在特定的保留區，日本族裔也是以團體的模式生活在特定的加州地區，之間沒有往來的歷史，就在這樣以英裔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中，兩個少數族群的族裔，在白人的隔離之中再被隔離開了。所以如果不是日本人被安置在一個印地安人保留區內的集中營，當時兩個族群能夠碰面與接觸的機會幾乎是零。

不過，不僅僅是小倖對印地安人有刻板印象，印地安小朋友也有著濃濃的日本人刻板迷思：

「她看起來並沒有那麼危險啊」，其中一位瘦高的男生說。

另一位男孩說，「假如他們知道你要殺他們的話，他們會在你動手之前先切腹自殺。那是我從書中看到的。」（角畑，〈《野草花》123〉）

顯然地，印地安小朋友也從書中以不客觀的方式吸收了有關日本遠古時期的武士道精神，也將此簡化為單一對日本人認識的刻板印象。同樣的，這樣的誤會也不是該位小男孩的錯，畢竟在書中讀到的只是片面訊息，況且他也從未接觸過日本人。這樣的短暫接觸，並沒有解開兩者之間的刻板與定型，但是留給了澄子一個新的思考問題，使得她一步步的去真實的認識一個完整的他者。至於奮命保身的小倖，不知道她是從那得知一些道聽胡說的訊息，依舊持續著她的刻板論述。等到澄子回到自己的棚屋後，小倖這樣說著：

「笨蛋，他們無所不在。他們是印地安人。晚上他們會躲起來的。假如你的行為舉止不對，他們會在夜裡綁架你的家人。你尤其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就住在營區的邊邊啊。」（角畑，《野草花》124）

事情的發生往往不會只有一次，尤其是好奇心驅使。澄子第二次與印地安人接觸，是跟一名叫法蘭克的小朋友有更進一步的往來。這一次的見面，兩位小朋友的對話和語調依舊存有懷疑和不信任感；法蘭克使用日本鬼子(Jap)來指稱日本人，而澄子語氣十分不和善的回答法蘭克的問題。法蘭克想知道關於灌溉系統的事，於是澄子跟他聊灌溉與她們以前種花的故事，也提起他的表哥與一些日本人正在興建灌溉工程將水引進保留區內的集中營，而設計這引水工程的工程師是美國白人。因此法蘭克向澄子提了一個請求並說著：

「我不介意與你那位在興建灌溉工程的堂哥碰個面。我哥哥們將來也想自己耕作。現在保留區有些地區已經可以引水了，但是我們的土地上還沒有。」（角畑，《野草花》142）

「他們奪走了我們的土地，然後將你們放在這邊。他們給你們電，也給你們冰塊。我甚至在路上發現你們丟掉的三明治。」（角畑，《野草花》143）

這說明著自從白人在美國建國以來，強佔原住民的土地以後，將他們集中在保留區內生活，卻沒有提供完善的工程建設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印地安人似乎過著資源貧乏的生活。這意味著從印地安人被集中到保留區後，白人政府並沒有妥善給予照顧，是白人主義排他的運作典型代表。而澄子與其他的日本人佔領了法蘭克的族人的土地，他們兩者之間都沒有錯，這個錯誤就在於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下的產物。

之後，澄子只要與法蘭克見面，都會談到兩個族群彼此間的生活與事務；藉由這兩位小主角的對談，反映了當下印地安人對生活在印地安保留區的日本人一些想法：一方面是印地安人與日本人沒有正式的生活接觸，皆處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各別生活圈。兩者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遵循白人政府要他們怎麼做，他們沒有自由的決定權，而且兩者之間的他者建構是依賴著彼此的觀看之中。有一天，營區中舉辦了印地安人和日本人的籃球友誼賽，印地安隊以三分差距贏了日本隊，雖

然兩者的互動十分冷淡，但是賽後握手的那一煞那表現了對彼此的一種認同，這種認同並非是絕對的肯定與贊同，但在最基礎的層次中是一個突破的舉動。它是象徵著彼此可以和平共處的開幕曲，畢竟這類型的友誼賽和握手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不會看到白人的手與印地安人的手雙握，也不會看到白人的手與日本人的手雙握。因此這場友誼賽的開打，使得有些印地安人漸漸接受日本人居留在他們保留區的事實。

然而這只是一個嶄新卻短暫的突破，兩者間對彼此還是有某些程度的不認識與刻板作用，用眼光打量彼此來建構這一個他者：

雖然印地安人和日本人似乎對彼此很好奇的樣子，但是澄子不曉得他們是否喜歡彼此。他們似乎故意分的很開。她可以看出來他們注視彼此時是保持一段距離的。（角畑，《野草花》171）

儘管跨出了一步，結果並不是一場簡單的友誼就可以打破族群之間的隔閡，而是需要持續在保留區內展開一場又一場社會與生活觀察，以慢慢揭開一層又一層的迷紗。至始至終，印地安人當局們並不贊同將日本人安置在他們的保留區內，但是反對的聲浪並沒有被白人政府所認同。當初白人政府會接受他們的意見時，就會遵守最開始的契約協定，也不會被迫遷離自己的原先家原來到保留區定居。美國政府針對印地安人的政策改變是十分緩慢且不積極：

「印地安人投票是違法的。直到1924年美國聯邦政府才承認印地安人為美國公民，但是有些州有權決定個人是否有投票權。在亞利桑那州印地安人的投票權是不被認定的。」（角畑，《野草花》214）

因此可以看到就算印地安人再怎樣反對，他們的力量並無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情。相對的，日本人也不願意來到保留區內的集中營，此乃有鑑於美日戰爭的開打，美國政府採取的內政事務，將日本人隔離於某一特定地區。這樣的行動可以解讀為是要預防這些日本人可能在美國造成動亂以幫助日本國，也可以將之解釋成隔離是為了顧及日本人的安危，避免這段期間內遭受忿忿不平的白人攻擊。所以印地安人與日本人都是沒有決定權來決定自己的生活。

隨著引水灌溉工程的展開、完成、擴建，該地區的水流系統越來越廣泛，同時間日本人在這裡的耕作，也活化了這一塊原先是沙漠的環境。這樣的生活環境的改善，為這一塊保留區帶來許多的機會和希望。隨著戰爭局勢明朗化，美國政府開放集中營的日本人，只要經過審查檢視後，就可以離開集中營到外面的城市生活，這個消息也傳至印地安人的耳裡，因此在一次的見面中，法蘭克向澄子說：

「印地安事務部想要你們留下」，他說著。

「我以為印地安人不想要我們在這裡呢」，澄子驚訝且說。

「是有一些沒錯」，法蘭克用那她堅定的眼神看著她。

「我以為你不想要我們在這裡。」

「是沒錯，我的家人也這樣認為」，接著他頭傾向一邊一樣堅定的注視。

「但是我們改變心意了。政府正花錢將水引進保留區，然後你們在耕作這塊土地。」

「那是因為我們是奴隸勞工。」

「我是說不管怎樣你們在這裡就是了。」（角畑，《野草花》159-160）

所以這樣的環境改善以及美國政府的資金注入，似乎也漸漸降低印地安人對日本人的不歡迎。這也表現了他們一開始對日本人的懷疑與猜測，該原因有可能是過去白人所造成的結果，同時也顯示了良好的生活環境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改善生活條件更勝於你跟我彼此間的差異。隨後由於蓄牧的牛會跑進營區，印地安人在他們的領土上架起一排排的圍欄。這一條線似乎表明了族裔之間的界線，終究是有一條鴻溝要跨，這一道鴻溝擺脫不了政治的干涉與猜測，也是一座利益糾紛的分隔島。

雖然界線的畫分，仍舊會有新機的展現；即使友誼賽後的平淡，依舊有著私下的交流活動。法蘭克請澄子帶他的堂哥來與他們碰個面請教討論引水灌溉的事，因為法蘭克的哥哥喬瑟夫與亨利打算戰後返國要從事農耕。一方面基於考慮澄子的堂哥大漢可能會對她與印地安人見面感到生氣，澄子遲遲未跟大漢提起；另一方面她不確定大漢會抱著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印地安人。造成這樣的擔憂，

免不了是因為在營區澄子對日裔美人的觀察，以及從法蘭克那邊所得知有關印地安人對他們的想法，兩者影響之下推測大漢可能會持有的態度。不過當澄子告訴大漢有關印地安人想與他碰個面討論些事情之後，沒想到他答應了。這一步的接觸與交流，雖然非正式的族對族交流，但充份展現了彼此沒有敵對意識，也藉由喬瑟夫與大漢的碰面表現了彼此願意互助互惠的動機與計劃。

美國印地安人與日裔美國人，兩個族群都生活在白人主流的社會中，兩者擁有各自鮮明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也各有不同的生活經驗與條件，但是同時面對來自白人政府的施壓和不公平與歧視的有色對待，雖然都住在美國這塊大地上，確像是個生活與此的局外人。從澄子與法蘭克的交集，及他們倆個純純的對話中反映了當時的生活現況和族群問題；慶幸的是這兩者間並沒有直接的衝突。反之看到的是，從不接受和不開放到接受與開放，兩者之間的往來有著互助互惠的進展，也漸漸更從同理心為出發點，降低了彼此的誤會與刻板印象，慢慢走入更寬廣包容與接受。法蘭克曾對澄子說過，「你們並不是第一個失去東西的人」(角畑，《野草花》160)，這不就說明了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弱勢的處境是存在於兩個以上的族裔族群之間，而不是針對單一某特定族裔族群，處於弱勢就不得不面對到痛楚與損失。唯有向前看，互相幫助才是長遠之路，這也道出了印地安人過去歷史中種種不幸的遭遇，因此對於澄子等日裔美國人，這一句話可以是埋怨，同時也是一種鼓勵。

第三節 國與族的忠誠度展現

一、國家認同的定義

身為移民族群的離散人，是一個橫跨單一界限區分的地域身份，亦即身份是包含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地域區分，而這地域區分的身份就是國與國的分界，離散人在從祖國遷移至寄鄉異國居住，文化上、語言上、習俗上、國家上等各個層面中都會有原鄉與寄鄉的重疊範圍。然而，離散人得面對一個同時來自原鄉以及他鄉的雙重注視，一方面經過多年生活於寄鄉，離散人原先保有的原鄉自我文化、社會、價值、意識等等各種認同問題，在寄鄉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產生混體和同化情況，不再與原鄉的族群有絕對相近和雷同。所以儘管心繫原鄉，但也漸漸地因距離與時效的變化產生一種對原鄉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因為遷入與自己族裔外表特徵大不相同的白人世界，一個攜帶著異文化身份來到以白人文化為主流的國家，排他以及不信任的產生也造成另一層面的疏離感，搖擺於二元或二分對立的兩難，「在兩分的世界裡，外集團的人通常看來具有威脅感。問題往往在於如何決定某個對象的屬性。歷史的因素常常就決定了人們會用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或宗教的標準，來判斷誰屬於那一個集團認同」(石之瑜 38)。終究離散人心理層面同時面臨故國與異國的兩種疏離感，使得他們接受一次又一次對國家認同和忠誠的質疑與猜忌，尤其是在寄鄉給予的挑戰和難堪。

思考國家認同的方向，得先釐清何謂國家認同所蘊含的意義和概念。在江宜樺著作《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中對國家認同有一番精彩的解析，將國家認同拆解成國家和認同兩個部份來討論。當談到「國家」，這兩個簡單的字確包含一個複雜的概念。一般而言，當說到國家時通常都是指稱一個政治權治獨立共同集體；從遠古時代的希臘城邦、羅馬帝國、民族國家、東方的各朝各代、乃至非洲的部落，這些都是可以與國家一詞劃上等號。而且這些廣義的國家代表都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單位出現。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詞的使用漸漸廣

泛，它有可能是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也有可能是多個民族的民族國家，但在今日的國家思維中，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所建構而成的論述是十分不妥並且容易造成隔閡與摩擦；即使有些國家確實是由單一民族而建國的。這邊涉及到的是當談論到民族時，不再只是一昧的將它歸類為有絕對的血緣的族群關係，而是要跳開絕對的族群、語言、習俗、宗教、樣貌等這些因素的限制，而是朝向一種可以表現全體人民的發展指標。國家的建立基礎是等於國族和不等於國族的兩個條件所成立的，前者是主流族群的認定角度，後者是少數族群的認定角度，同樣地，以後現代的視野來觀看國族的觀點，也是需要一個更寬廣和多元的角度，而不是絕對的單一論或者二元論。當論及「認同」，它可以有三種不同的含意。第一、認同的意思是指「等同」，第二、認同是指「確認和歸屬」，第三，認同則是意指「贊同與同意」（江宜樺 8-10）。就字面上來看，「等同」、「確認和歸屬」、「贊同與同意」的意義其實不難瞭解，當一個人認同另一個人，另一個人也認同這一個人時，兩者間將彼此視為等同的，它可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同一個鄉鎮的人、同一個家族的人；也是指彼此確認了兩者擁有相同的外貌特徵，文化習慣，因此這個相同使得彼此產生了歸屬感並且肯定了之中的群體性；更有可能是說彼此間是在一個脈絡下都贊同和同意對方的身份與存在。所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國家認同也就有三個意思的存在，分別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等同自己認同的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一個自己可以確認並歸屬的一個政治共同體、自己贊同和同意承認的一個政治共同體（江宜樺 11-12）。因此可以知道國家認同是含括三個層面來評斷，也從中這三點去審視離散人的國家認同的位置。

然而，談論到國家認同時，常常會被誤解為非我異族的排他觀點，簡易地將之區分為「我族」或「他族」；這個族字所代表往往是被解讀為民族，也就導致國家是由同一個民族而非外國人建造的十分狹隘且盲從的思考。所以以民族為國家認同的最根本尚有討論的空間，應該是指國家的建立之後才有了民族認同，亦即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同意該國家為自己認同的那一個政治共同體，將這一個國家的所有人民認同為同一個民族為基礎，因此這邊也會牽涉到民族認同的部份。

當談到民族，首先自己會將其他的成員認定為共有擁有相同的某些可以相關連的特質，達到彼此相互承認的稱為同胞；同胞不一定要所謂的同一種族和血緣，而是有一種願意生活在一起的信念。所以當有這樣的信念後，自己和其他同胞一起定居的那塊固定的地域，有了感情而成了所謂的家鄉。彼此之間會在這一個家鄉的土地上集體的活動，共享並認可一起建立起的文化、習俗、宗教、法律、語言等等的基礎（江宜樺 47-48）。有了這些基礎的成立，民族的呈現就是一個共同體，也就更能明白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連以及解釋方向；民族國家不再是片面的為單一個民族為一個國家，這裡的民族更不是單一的所謂種族或者族群，相反地，民族國家所構成的民族是一個更寬廣和多元的共同的人民集體概念。

因此，從國家認同和民族之間的關係，可以知道在論及國家認同時，是在問一個個體和集體的「我是誰或我們是誰？」的問題，而且「每一個認同的發生，伴隨著必然的心理壓力，要將自己與不屬於同一種認同的人加以區隔，於是構成一種習慣，在遇到任何一個人的時候，得先識別來人是否為自己同一集體的份子」（石之瑜 35）。從中也可以瞭解到在這樣的集體概念的人群裡，國家和民族本身不只是簡單表面上的名詞定義，它更包括了該團體共享的身份裡有共同的價值觀與道德判斷；例如團結、忠誠、犧牲、奉獻、遵從等等這些願意為自己的政治共同體付出與投入。就整體而言，國家的人民是以集體一個抽象的方式尊重和定位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享受這個國家所提供的安全感、延續感、歸屬感。現在就從國家認同產生的安全感、延續感、歸屬感的角度來探究是否有具體落實在這一群離散身份上。

二、文本範例與分析

二次大戰期間，當歐洲被義大利與德國攻佔，東亞太平洋地區被日本攻佔，其他受害的同盟國在尋求協助之際，美國遲遲未宣示參戰之意，生活在美國日本人以及日裔美國人，時時刻刻抱著一棵忐忑不安的心，生活圈裡也充滿種族歧視

與敵意。直到 1941 年日本突擊美國夏威夷島上的珍珠港，隔一天美國終於向日本宣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時此刻，在美的日本人就像平底鍋上的一隻魚，除了更加的焦躁不安，也完全無技於施。

當戰事傳到加州澄子所居住的社區內，每一戶日本家庭都將象徵與表現日本的東西一一焚毀，藉由擺脫這些物件來說證明自己是美國人。甚至有家庭在自家門口貼上「我是美國人」的牌子，說明了這些日本移民和後裔面對了一個非常難解的矛盾情結。由於面對未知的生命恐懼，才迫使他們採取如此自保的方法，以保住自己的生命、家人、財產、或者是權利。但另一方面似乎也透露出這些日本人心裡有數，才表態自己的身份及願意為哪一國效忠的立場；畢竟當論及國家認同來說明我是誰時，一般而言會減化成單一非我異族的觀念，將之帶入是否同屬於一個國家，這在國家認同部份是十分簡陋和偏激的思維，這也是戰爭開打那一瞬間，對於澄子她們日本人或後裔而言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接連著第一代沒有美國籍的日本移民和持有美國公民的日本後裔，都分別被送進不同程度的集中營，也說明著當下美國當局也暫時不將他們歸於同族的美國人，直到後來一項問卷調查的填寫，可以觀察日本人他們的國族認同位置在何方：

他們將被問很多問題，其中包括兩項特別重要的。第一、當接到指令時，你願意將戰事責任服役於美國軍隊嗎？第二、你願意宣誓無條件效忠美國，不論是什麼自國外或國內的攻擊，並且宣誓拋棄任何形式對日本帝國或者其他外國政府、政權機構的忠誠嗎？（角畑，《野草花》224)

這兩個問題的設計，顯然是政府開始將決定權留給這一群日本人做抉擇，原因可能為二：第一，可以減低本國土地上不必要的猜疑和防戒心，這是因為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有可能會裡應外合，從美國本土發起攻擊。第二，可以徵召更多的軍力保衛國家，也藉此機會讓這些日本人將心中國家認同的底線攤開。的確，這樣的做法是展現自我對國家的價值觀與道德判斷的良好舞台，經由這樣的問題引導出一個是否願意在這樣的戰亂當中，團結起來，展現自己為美國的忠誠，為他們

所居住的家園來奉獻與犧牲。從軍可以說是愛國的最佳表現，因為上戰場是攸關生死存亡。因此戰亡也象徵著一個人願意貢獻整個生命來捍衛自己的國家的最高忠誠表現，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就不容質疑。

然而，當這問卷的消息傳遍到每一個人的耳裡時，不同的質疑和推測在民間廣泛流傳。不過這也意味這些質疑與推測背後是存有不信任感以及對自己的身份與國家認同確定性的未完整。當凱莉老師將這個消息告訴了班上的小朋友，有一位小男孩接著說：

「這是陷阱！假如我爸爸都同意並宣誓放棄對日本的忠貞，然後美國不給他任何權利，那我們不就連一個國家都沒了！」（角畑，《野草花》224-225）

這樣混亂的局面，沒有一個確定的未來，如此的考慮做法是合情合理的。想一想，如果美國當局信任他們的話，其實大可以將他們送進集中營時就做這樣的調查，甚至連這樣的調查都不必，也不用將他們送進集中營，可以過著戰前那一般的正常生活。然而事實確不是這樣，國家是指一個政治共同體，以一個尊重的心態和包容的態度接受和定位國家領域內的每一位個體，讓人有安全感、歸屬感和延續感；但偏偏此刻在美國的日本人卻缺少了這些感受。所以當要他們決定放棄對日本國效忠，擔心原鄉與寄鄉國兩地都會落空也是人之常情。

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澄子的猜測當中：

假如你同意放棄效忠日本，那是不是指政府當局一開始就認定你是擁護日本的？然後在用某種方式處罰你嗎？（角畑，《野草花》226）

確實這樣的推斷也是有其道理，它表示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在國家認同的上，並沒有將美國視同為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將美國確認成為自己的國家歸屬，更不是贊同美國是自己的國家，他們在國家認同解釋的三個層面上，國家的是停留在日本。當然，這不是絕對的二元論，一定要選擇一邊，而是不信任和未知的恐慌所導致。此外，這樣的顧慮也是因為問卷題目動機模糊，引發另一個解讀的可能性，所以使得不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難以抉擇，唯恐可能是個的陷阱，擔心終究雙方

都會落空，也害怕雙邊都無立足之處。

然後有不少日裔美人後代有這樣的問題：

接著有些人想知道究竟什麼是「外國政權或機構」？是否意味著自己無法與第一代來美國的日本人共事呢？（角畑，《野草花》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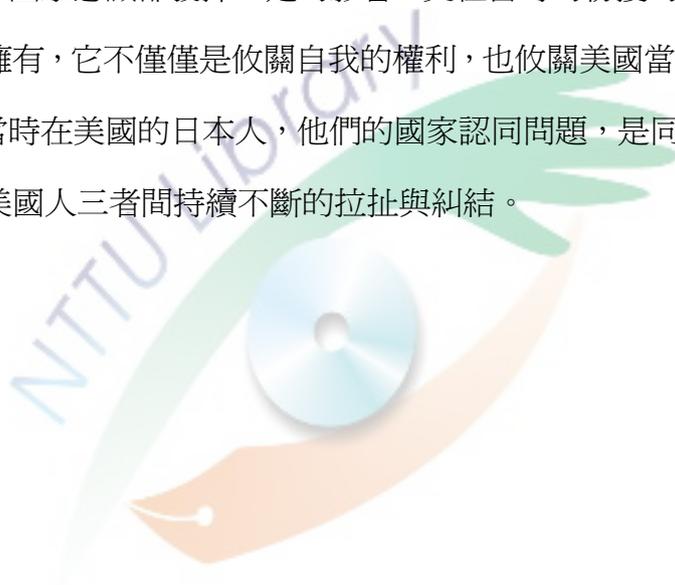
原因在於美國當局將沒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日本人視為與日本有密切的聯繫，可能洩露任何對美國不利的消息。因為國家認同涉及到對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承認、贊同、歸屬。第一代日本移民帶著日本原有的身份、文化、思維，與寄鄉美國是兩個完全相異的特質；除此之外，第一代日本移民出生並成長於日本國土，更有站不住腳的弱點。對於外國政權或機構的假設擴張到包含第一代日本人的範疇內，因為當時在美國的日本民間相關團體的領導者都是以第一代日本移民為主，澄子的爺爺就曾擔任過花卉協會理事長一職，這也就可以合理化為什麼第一代日本移民會特別和日裔美國人分開安置，因為背後有更多的國家安全政策的政治考量和意識型態。

問卷調查後的結果，澄子營區大多數居民的回答為「是，是」，至於少數回答「不是，不是」者則被移送到加州另一個稱為 Tule Lake 的隔離營區。而原本在 Tule Lake 的居民回答「是，是」者則被認定為忠誠國民，可以自行選擇願意前往的集中營。美國政府會對填寫反對者有什麼懲罰或處置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沒有選擇為美國效忠肯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錯不在他們選擇對日本國忠誠，而是錯在當時的環境不允許如此的決定。問卷調查爾後沒多久，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年輕人報名加入軍隊，是另一個檢測忠誠度表現的動作。可以推測美國當局政府對於問卷調查的答覆顯然存有一絲不信任，終究擺脫不了日本人的身份框架。

然而，有一點十分弔詭的是加入美國軍隊的日裔美國人被分配的戰區為何？如果前往歐洲戰場，是對抗德國軍隊和義大利軍隊，以美聯的名義支持其他歐洲同盟國。但是如果前往亞太戰區，這一群日裔美國人對抗的敵軍就是原鄉的日本國軍了。穿著日本軍服的日本軍人與穿著美國軍服的日裔軍人，兩者在戰場面對

面時可想而知彼此的矛盾心理，會手下留情或者是大開殺戒就決定在當下個體的心理狀態。這也許已經不是單純的國家認同問題了，涉及到更多心理層面的意識、價值觀、情感等情緒。但是可以清楚看到一點，即國家認同真的不是減化為同一個民族就可成立，更多的認同背後是以共同建立起的文化、習俗、宗教、法律、語言等等的為基礎。

個體對國家認同基本上無法擺脫團結、忠誠、犧牲、奉獻、遵從，困境的發生往往是檢定這些穩定程度多寡的最佳時刻。身為日裔美國人在面對日本攻打珍珠港，以橫跨美國人和日本人兩種身份的兩難局面，現存的政治共同體的不同世代對族群意識、國家意識都發揮一定的影響。更在當時的紛擾的動亂時空，許多的權利也不再擁有，它不僅僅是攸關自我的權利，也攸關美國當局的國家安全考量。簡言之，當時在美國的日本人，他們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同時間在美國人、日本人、日裔美國人三者間持續不斷的拉扯與糾結。



第四節 離散身份的跨文化尷尬

日本離散族裔的身份，經由第一代日本移民延續至第二代、第三代後裔，在《野草花》的二次大戰的時間背景裡，可以看到日本人與日裔美國人對於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保留，同時試圖表現自己也是美國人的兩種情結。面對美國對日本開戰後，他們焚毀象徵與原鄉日本身份有關的各種物品，這些物品對於離散人來說是一個跟原鄉最親密的連結橋樑。但正因為這些物品的符號表徵，他們才需要焚燒這些物品減輕美國白人當局對於他們的顧忌和猜疑；相對地，日本移民焚毀這些物品又是為了表現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反映了離散人面對自我身份認同和外環境給予的身份標誌一個雙重的拉扯。《野草花》的故事雖然以第三人稱的角度撰寫，然而卻彷彿是從澄子的角度來看待當時的環境氛圍；從整個籠罩在美日的緊張情勢到兩國的戰事開打，塑造一個日本人和日裔美國人的跨文化的身份矛盾，從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情來述說身為一個橫越兩個文化的身份位置該如何擺放。

在美國領土上，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人與非美國人的忠誠分歧呈現了潛在社會凝聚問題，也是國家政局安全穩定的重要關鍵。美國政府面對珍珠港偷襲事件，突如其來的錯愕和國家安全的保障上出現一個危機空檔，這危機空檔也迫使政府當局對國內的日本人有一個強烈的防衛心態，避免他們聯合在美國本土引起國內美日戰役。所以美國政府採取將沒有美國國籍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例如澄子的爺爺和伯父，集中隔離至一個如監獄的營區，其原因在於他們與日本有著最直接的聯繫關係和政治關連。其他擁有美國國籍的日本人則被安置在另一個自由活動度較高的集中營區。美國採取這樣的大規模徹離，有官方自己的原因和考量，也主要是當權者有決定性的權力，可以決定遭受質疑的日本人該怎麼處置，需要做什麼，以及不能做的事等等的政策命令，如此的質疑和政策關鍵點在於保衛國家領土安全的國家忠誠度與認同。

不同族裔族群的美國公民延續上一代流傳下來的文化與傳統，他們可能可以保有自己原先文化的權利，也同時吸收寄鄉的文化權利，但是在很多的時候他們依舊被積極的強制貼上族裔的標籤，不管他們原先是否決定選擇特別去強調它的存在。有時候也因為根據不同的文化區別性會有不同程度的對待，也就因為如此他們會抱怨被剝奪的權利，當然從弱勢族裔的角度這是一個十分不公平的對待；但是在二次大戰日本攻擊珍珠港的事件之後，從美國政府的角度而言維持國家安全和完整是有其必要性的，也是為了保障國家領土上每一位公民的權利，因此在當時強制為日本人貼上標籤，進行搜索也拘禁部份日本人，這些都是可以瞭解的行爲。因為對於國家的忠貞表現，顯然得第一步驟就是檢示一個人源自何方。此外，在國家的忠貞程度表現上，是由許多心理部份與外在環境所構成的，也就是忠誠的情感與忠誠的真實行爲常常是分開的，即假設雖然你生活在美國，但其實你的忠心依舊是原鄉日本，這是美國當局對日本移民最不信任的部份；然而，他們似乎刻意忽略另一個層面，就是雖然身為日本人或者是日裔美人，但是生活在此、出生在此，其忠心就是在美國。加上還有其他因素，依據來自的國家、宗教會有程度的影響，也因為年齡、性別、職業、居住地、出生地等有不一樣的表現。但顯然的美國政府當時將之簡化為不信任，因為日本人與美國人是兩個不同屬性的身份，儘管日本族裔對美國表現的十分效忠，恐怕結果也是一樣的。因為美國立場思考角度為：

一個人可能同時具有黑的認同與白的認同，當他(她)往白的認同發展的時候，黑的認同就降低，但不能就此認定此人是屬於白的認同。一個人是屬於白的認同或黑的認同，必須要靠另外一個人的位置來決定。假如另外一個人更靠近白的認同，則往白認同方向發展的這個人，仍屬於黑的認同，儘管這個人自己與自己的過去比較，可能決定自己現在是白的認同。（石之瑜 43）

除此之外，國家主義或者民族主義與移民常被視為兩個相對立基點不同的過程，這造就了國家主義的地域主權論述概念和移民跨越國界事實碰撞的產生的矛

盾抵觸。移民也往往導致國家身份認同的再次改造與重新論述，在原鄉與寄鄉上都有政治結果 (Eriksen 153-154)。這樣的重新論述和政治結果其實一直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潛在複雜的心態與思維，這正是離散移民得面對的跨文化挑戰。一方面離散身份會與原鄉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延續，另一方面會學習適應並接受部分寄鄉文化的同化效應，達到一個混體的身份現象。二次大戰的情況更加突顯了這樣雙重身份的複雜和矛盾抉擇。矛盾的產生使兩個相對立的感覺和態度同時存在，引發了對於他們的一個身份最初的問題：什麼叫美國人？什麼叫日本人？如果美國人所代表的是藍眼、金髮、白皮膚，那麼所持有的美國綠卡不就只是一層假面具嗎？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政府還賦予這一層沒有實際作用的面具呢？或者是說需要在美國住多久才能算真的美國人嗎？出生在美國的日本後裔還是道地的日本人嗎？只是因為黃皮膚、黑頭髮的就只能稱之日本人嗎？在日本的日本人和在美國的日本人是一樣的身份並可以相互交替的嗎？雖然他們保有與原鄉文化相關的身份連結，但表示他們就與原鄉的日本國民身份雷同嗎？因此或許原鄉對移民族群而言並不是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尤其是對於澄子這樣第三代的移民後裔，因為她未曾踏上日本領土與實質的日本生活，所以如果不是美國人，也不是道地的日本人，這樣的身份最後剩下的是什麼，又該怎麼稱呼呢？認真的思考這些問題，並循著如此的歷史脈絡，放大觀看的視野，以及全球人文轉變的因素和移民人口遷移的歷程，來尋找美國人和日本人身份的建構過程，才能找到最適當且合理的可能性來解答；但另一方面，背負著原鄉的日本身份，似乎也妨礙了移民族群在美國的美國化，因此他們也與美國領土上的美國人有一段距離的差異和隔閡。即使他們可能認為現在居留的寄鄉國才是實質屬於自己的國家，只是不夠真實到讓他們覺得自己完全屬於這邊，所以反映在填寫問卷時有一連串的顧慮和猜疑，因為這樣的矛盾訴說著如此的身份不再僅僅是簡單的二選一的選擇題了。畢竟原鄉的日本國不是真實的，寄鄉美國也不是完整的，那他們究竟該何去何從所涉及的層面就是一層又一層複雜和不穩定的政治和文化局勢。

這樣的跨文化矛盾衍生的尷尬應當是在當時的二戰背景更會被突顯和放大

的議題，因為相同與差異的二元對立的建構，前者往往會被選擇忽略，後者則是被刻意的強化與扭曲，並且會有矮化與醜化的情形發生。當時緊張的戰亂局勢似乎就是最佳的例子，否則澄子他們就不需要去焚毀那些與日本身份有正連結的象徵物品，也更不需要被強制隔離居住到集中營，放棄所有的財產和建立的家園。所以離散移民族群所面對的跨文化尷尬應是一個固有的常態現象，這也強調了離散人在遷移時，身份、觀點、角色都在改變，有可能是無形的轉變，也有可能是有形的轉變，更有可能是無意識的或是有意識的轉換。但不管如何，「跨文化身份是一個成為和身為的身份議題」(Hall 136)，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一直於變動的環境中流動。

這些帶著遙遠的鄉愁並且無法歸返的離散人，跟著歷史隨波逐流的浮萍，只能在他鄉的生活中，尋找同鄉，尋找熟悉的味道，但又必需融入美國的生活習性、地方性格、語言口音、文化習俗、政經策略等等現象，整個歷程它不會是一個簡易的選邊站，也不是一題容易的選擇題，成為和身為的過程會陸續呈現在跨文化生活的離散人一個持續不斷的尷尬矛盾，也持續在兩個流動的跨文化中一直進行身份建構和找尋身份定位。

第五章 總結

第一節 離散文化概括重述

離散人造就的離散文化，從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三方面的時間線並行或交織發展下，述說著一群特殊族裔集體飄泊的生活經驗。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裡，其身處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不同的背景，都有著別於他人的變異認同與價值判準，因此，離散人告訴世人的故事，其發展與脈絡也就有了多元的詮釋和意識。

離散是一座精彩的舞臺，上演的劇碼以團結、歸屬、距離、他鄉、故鄉、身份、地位、再現、建構、根源為主軸，一場連著一場毫無間斷地持續演出。直到今日，離散更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景觀中，最不容錯過的景點。故此，本節將就前四章的論述，綜合討論出從研究文本《閃亮閃亮》和《野草花》為出發，關於離散文化下身份認同與他者處境整體探求問題。

在本論文的第貳章〈離散文化〉的篇幅中，檢視了離散一詞的產出由來和基本的字義。離散源自西方世界，字面上的表意有著離開、散播的移動之意。離散一詞的濫觴是從西元前古希臘時代論起，《聖經》中記載的猶太人族群成為巴比倫帝國的囚犯，大規模地逃亡遠離鄉土；爾後基督教的興起，猶太人背負著神的旨意開始飄蕩的生活型態；以及強盛的羅馬帝國大軍打敗猶太人族群，敬仰的耶路撒冷的教堂在戰爭期間焚毀，開始了集體的飄散人生。因而猶太人集體的離散人生構成歷史最明確也最早的開端，也被稱為典型的離散型式。隨後，第二波大規模的族群遷移是發生在十六世紀初，即非洲黑人的奴隸買賣，送往當時的新世界提供廉價的勞役。而後第三波集體移民活動則發生於二十世紀中期，當時眾多被殖民的地區，其因宗教、權力、經濟、利益等各種原因一一獨立建國，此連鎖效應進而產生全球性的移民行動。

今日離散的相關研究，在人類學、文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是熱門的主題，含括的離散範疇有流放國外者、政治避難者、旅外僑民、商務人士等等，每一種離散人的離鄉動機皆不相同，有些是來自權力壓迫下，導致的非自願性遷出；有些是因地球村的影響下，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出現的自願性遷出。但不管是自願性或者非自願性，離散人共有的特質，是一個跨越單一地域或者國家的身份，儘管遷移原鄉多年，仍然保有完整的集體文化、族群團結、族群意識、國家忠誠與思念懷舊，而且心中有一股重返原鄉的迷思情懷。

離散人因爲橫跨兩個文化以上，身份角色在原鄉與寄鄉中兩個對立的雙重注視下，可以觀察到其身份因爲混體、同化、異質性的元素而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因此會發現離散人需要同時於兩個文化社會中面對接納、排斥、他者、歸屬的問題。尤其是民族之間的情感歸屬，對於離散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支持力量與安定媒介。無論任何挑戰與困境，離散人的基本特點就是必須與原鄉的人、事、物保有不間斷的聯繫。所以離散人的身份認同與建構，圍繞於原鄉、寄鄉、同化、混體、他者的連結關係中。

日裔離散人從原鄉日本遷入寄鄉美國，一併將原鄉的米食文化帶進寄鄉。米食文化中的米食被視爲日本身份在建構符號代表。從飲食的角色，其中的食材、習慣、餐具表現與他者的文化差異，這樣的飲食文化被認爲可以當成一個文化的自我呈現與再現。吃米的日裔美人和以大麥和玉米爲主食的美國白人的區別，突顯了寄鄉與原鄉的飲食差別，這差別也顯示兩者之間一個明確的他者位置。經由米食的傳承，延續原鄉日本的身份連結，於身份認同的部份爲自己保留一層日本身份的關連；儘管這過程中因爲文化同化而出現的身份混體，從飲食層面觀察到一些寄鄉的飲食內容，是身份認同的部份表現自己也是擁有美國人的身份。只是因爲不同世代，對於原鄉日本或寄鄉美國的身份套裝比例，依照個人的意志決定和意識認定來選擇最符合自身的身份認同。所以在這部份，日本人、美國人、亦或日裔美人，三者間是一個流動的身份概念。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語言命名的部份，然而命名牽涉的身份認同，大多數是來

自父母親的意識與意志。文化是不能獨立在語言和語言使用者之外，文化社會的模式，是透過語言建構和再建構所形成，生活在文化社會裡的每一位個體，從「我」的角度，依據語言的使用來呈現一個社會、歷史、政治、宗教等等來建構個人的身份與經驗，因此，一個人的命名，就是整個文化社會下的產物。所以全日文的原鄉命名，完整的透過語言表現對下一代身份期許和表徵，賦予原鄉的日本身份；下一代寄鄉美語命名，保留日語的姓氏，即父母對子女的身份表現期待，是一方面保留日本身份，同時間也聲明為美國人的身份，又是一次混體的身份表現。因此，身份認同的決定權掌握在離散個體手上，讓自己告訴自己和外界世人，其自我的身份是日本人、美國人、還是日裔美國人。

相較於米食文化的延續和語言命名的採用和那化價值，個人使用的文化物品是身份建構與認同，是最容易接觸，但同時間也是最容易擺脫，然而確只是表面而已。一個人的身份建構與發展，是透過與外界的文化社會接觸和互動進行了一連串的建構程序。個人的身份建構是深受文化薰陶，是一種集體身份共享的文化認知概念，此概念會產生一層文化符碼，兩者結合造就出自我身份。除此之外，也會根據不同的物品來進行身份上的建構，因為，一個人會將對於自我身份的情感，投入在這些具體的物質符號中，並將部分的身份寄託於其中，讓自己或是他者，從中去認識該個體的身份和特質。因此，當離散人擁有原鄉日本文化符號的物品並投入情感，這一層連結就建構了自身的日本身份；同樣的持有寄鄉美國文化符號的物品時，那美國人的身份也當然成立。雖然澄子一家人藉由焚燒這個儀式來擺脫日本身份，但也得考慮到物品身份建構後的個人的文化內化思維，因為文化深根影響了自我的思維。因此，個人物品對於離散人是外在表面的身份呈現，重要是潛藏於個人物品背後那一層看不見的文化身份力量。

綜觀上述三點對於身份認同表現的方法，其實都不是既定和不變的過程，隨著離散人個體的需求和外在環境的影響，原鄉和寄鄉兩個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拉扯，在身份的建構與認同上都是處於流動的狀態。

在於他者處境的討論，日裔離散人於種族、階級、習俗、文化等等地方，表

現出與己身不同的意識與觀感差異，如此的身份建構，會依據不屬於我或我們的範圍，來界定他者的關係與位置，也分析出根據如此的關係與位置，可能產生出的厭惡與排斥的現象。對於美國白人而言，移民他鄉寄居的離散人絕對為「他者」的角色，從原鄉遷出之前，就已經擁有原先的身份屬性和族群意識、自我文化與社會思維方式，此種價值觀顯然與寄鄉的原本居民族群有一定相當程度的差異，截然不同的內化價值，深深影響著兩者對同一件事件的判斷與詮釋。離散人也會將同樣的原鄉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只是接收與接受度就難以判斷。因此，即使下一代的文化身份更貼近寄鄉美國，也認定自己為美國人，他們同樣還是會面臨從白人族裔發展出的「白人優越感的觀看凝視」。至此，就日裔美人身處白人社會體系而言，從白人的統治、權力支配與操縱，以及意識型態的轉化、落差與異同等方面，是日本人、美國人、或者日裔美人的認同層面，都發揮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既然身為非白人的「他者」位置，在美國社會當中即為弱勢族群的角色。閱讀文本以及進行文本分析時，觀察到日裔弱勢身份不論是生活、工作、角色、權利都遭受刻意的族群隔離效用，例如：二次大戰期間的日裔集中營，與戰後日裔族群居集中居住於同一個社區，無法實際融入美國白人主流社會。此外，還必需面對弱勢產生的無能為力，沒有權力和支援改變被打壓的現狀，只能委曲求全而默默接受與接收白人社會願意提供的微薄機會，對他們而言是嚴重地有失公平。更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與非美國的忠誠分歧呈現出潛在社會凝聚問題，日裔族群遭受一次又一次的猜忌與仇恨，攸關生死存亡，此階段也將日裔美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國家認同，被迫作一個公開了斷地抉擇。所以不少日裔美人，對於自己的身份歸屬陷入了矛盾糾結。然而，身份的矛盾難題正是離散人處在原鄉與寄鄉之間一直在拉扯的雙重注視，也因為其衍生的身份尷尬，日裔離散人抱著「他者」的角色和位置，在原鄉族人和寄鄉白人之間不間斷地徘徊遊移，還未找到明確的身份定位。換句話說，對於離散人而言，身份認同和情感歸屬在尷尬與矛盾產生當中，還未找到得以深根的立足點，那麼他者的處境也就是離散人生裡，一直持

續演出的戲碼。

這個章節的再次審視兩本小說中重要的離散課題，以及探討身份認同位置的由來，是一個處在流動與拉扯之間的關係，它看似遙遠，卻每一天都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發生；它看似簡單，卻涉及到整個歷史轉變和意識論戰的波動。研究者企圖將核心重點擺放在跨文化的流動身份，藉以瞭解族裔身份在整個離散文化裡的走向，依靠原鄉社會、寄鄉社會、不平等結構、排他情結、意識型態等等許多避免不了的元素在交會塑造與建構。身份定位會繼續以流動和彈性的方式在離散世界徘徊，一直湧進的各種研究觀點和視野，使得過去式和現在式的離散掌舵，難以達到十足信心的操作局面，未來式的離散世界會是以什麼型式出現，亦或離散在將來是否會繼續存在，都必需持續關注並擴大現代的族裔身份、國家情懷、經濟趨勢、世界政局等歷史脈絡。



第二節 離散文化下的童年友誼

離散族群的遷移行爲，區分爲自願性與非自願性兩種，遠離自己原來的家鄉遷移至遙遠的他鄉居住。在過程中，此族群具有特殊性的原生背景，其原鄉的視角，呈現出其固有的身份與文化，並在其寄鄉地建立一套屬於自己並與寄鄉主流文化不同的習慣、風俗、信仰、價值觀等等，在此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生活的族群，成爲不折不扣的離散人。

除此之外，離散人需要同時面對寄鄉社會與原鄉社會的雙重注視，在其中身份的多元、轉變與迴旋下，對寄鄉社會和原鄉社會彷彿充滿著一層圍起了界線的圈套隔紗，雖看似薄薄的一面紗布，確是如此的厚重難開。

自有歷史記載以降，人類有都是過著群居生活，求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面對任何困境或是各種挑戰，爲了滿足自身與子女的生活需求，都會展現出生命的韌性，堅決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環境考驗。尤其是離散人，面對雙重的環境壓迫，依舊堅強的走出一條康莊大道。研究者自身並不是一位離散人，沒有實際經歷過離散人的生活，更沒有經驗如此大環境附加的不平等待遇與種族他者孤立，然而從《閃亮閃亮》和《野草花》的小說中的敘事軸線，藉由作者細膩的筆觸，感受到屬於「離散人」獨特的人文氛圍。

《閃亮閃亮》的凱蒂與《野草花》的澄子，透過人物塑造下純真表現與其生活場域下的童年生活建構，對照研究者自身的兒童階段，她們兩位小主角深受離散文化的影響，非志願性地在交友層面上有了很大的挑戰，故此，當有一段緊密的友誼關係出現，就成爲她們童年生活中最棒的禮物。

凱蒂與澄子身爲日本移民第三代的後裔，或稱爲第二代日裔美人，其外表是屬於黃皮膚與黑頭髮的東方外表，雖擁有美國公民的身份，但卻過著有別於一般美國白人兒童的生活，其因在於一種族的差異產生種族歧視，進而遭受到排己、孤立、歧視等等負面的不平等對待，如此地負面生活概況，就這樣牢固地監禁於

她們身上。所以，對她們而言，朋友關係是一份如此珍貴與渴望的夢想。

人的一生中，在不同的階段都有著不同的朋友，隨著成長、搬遷等因素，新朋友的加入與舊朋友的持續或是離開，都一再地輪流替補與充實整個人生。在這過程裡，其中有一些是真摯的友誼、是一輩子的幸福；而有一些或許是某種錯覺、利用，或只是曇花一現，《閃亮閃亮》中安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與凱蒂的姐姐琳僅維持短暫的情誼。人在初來乍到下，常因為陌生的環境與人、事、物，使得自己緊張且不知所措，一張開心的笑臉、一聲關心的問候、一句熱心的告知，頓時有了一絲依靠與安心，因為孤獨的感覺減弱了，漸漸地發現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心中也緩緩升起暖暖的感覺。這樣的變化十分微妙，無形的在改變，自己在當中常常也搞不清楚是如何產生，並且何時發生，只是自己很自然的察覺到，想與對方一起去餐廳吃飯、課堂上分成同一組、一起打躲避球、下課後一同去洗手間、有小道消息第一個互咬耳朵等等行爲；偶然對方無法一起吃飯、無發一同嬉戲、沒有時間聊聊天，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失望與落沒。所以朋友之間的往來互動是多麼的重要而且有意義。此外，世界上除了親情以外，還有什麼東西能超越友誼的重要性呢？如果親情猶如空氣，友情就如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終究是不能跳脫群群體而獨自生活地。

但這種緊密友誼帶來的溫暖與感動，在移民族群生活圈中誠屬難得可貴地，他們的生活圈僅僅圍繞於相同族裔的團體中，如同前兩章所論述到，因白人排他主義下產生的現象，有色族群無法融入，對於兒童們，似乎也擺脫不了這一關。

單純的小朋友，需要的只是一個可以陪同的玩伴，但從凱蒂與澄子的生長背景裡觀之，她們的玩伴都只是自家的兄弟姐妹或者日本鄰居。校園生活中，凱蒂比澄子幸運地是，她還有姐姐琳可以作伴，而澄子確是整個學校中唯一的一位日本裔。還記得凱蒂第一天上學時，除了有幾位小女生問她一些好奇性的問題外，幾乎都沒有了任何的互動關係，爾後，凱蒂的校園生活，她沒有交到任何一位朋友，只因為她是日本人。

澄子也是經歷同樣的命運，回想起在新生活的一開始，她收到一位女同學的

生日派對邀請函，那樣童稚直接的喜悅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因為在邀請卡的背後，彷彿伸出一雙友誼之手。但事與願違，生日派對一開始，澄子就被「請」了出去，只因澄子是日本人。在兩位小女生身上，澄子對友誼的渴望明顯大於凱蒂，一方面是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不同；另一方面為澄子只有弟弟沒有姐姐，沒有可以訴說心事的對象。

如此孤立的生活慢慢有了改變的契機，凱蒂在媽媽工作的工廠認識了希莉，澄子則在營區認識了小倖與法蘭克。這過程中觀察到兩位的生活圈中，加入了新的角色和新鮮感，從故事中，看見兩位小女生心境上與行為上都有著某些程度的轉變。可想而知，友誼的重要性是從小開始的，先不論及長久與否，朋友的角色會帶給每一位個體不同的轉捩點。

然而，兩本小說的發生場域都是在寄鄉美國，如果將出生於美國的凱蒂與澄子送回日本原鄉之後，交友過程是否會比較輕鬆順利呢？其實不然，因為身份混體和同化效應已經展開，即使是日本裔的身份，她們卻與實際在日本土生土長的日本兒童又是另一層複雜的身份關係。語言就是一層嚴重的隔閡，凱蒂與澄子只會基礎的日語，她們使用的語言是美語，幾乎也成了她們兩位的母語。因為美語的結構、字詞、語法等條件，以及美語環境衍生的文化氛圍，塑造了美國人的身份和思考模式，相對於陌生且遙遠的日語，即使固然為日裔身份，但是不熟悉的日語條件和日語文化，並沒有能力塑造與內化同為其日本人的身份和思維邏輯。因此，當澄子與凱蒂與土生土長的日本小朋友碰面時，就會依據自己對自己，原鄉小朋友對自己，以及自己對原鄉小朋友，套上一件不同身份建構與再現的衣裳。或許，這一件衣裳比起白人世界的薄紗更容易穿脫，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值得好好思考或進一步探究。研究者認為必然有程度相等的困難之處，因為離散人面對的雙重注視，是同時來自於寄鄉與原鄉，之間產生的矛盾不亞於彼此，面對的遭遇也各有千秋，甚至可以加以解釋離散人心中的返鄉迷思，為什麼遲遲都未付諸行動，正因他們心裡都清楚明白，回去原鄉並非是一件得以解決在寄鄉遭遇的困境，換句話說，出生於寄鄉的移民後裔，回去原鄉後是另一個他者的挑戰。

就上述進退維谷的困境而言，朋友之間的互動、交往，是多麼有意義。朋友他會在你難過時，陪你一起度過低潮，鼓勵你再次迎向挑戰。當你開心的時候，他也會陪你一起大笑、一起分享榮耀。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有難同擔、互相體諒、互相幫忙。人生每一個階段都需要的友誼，雖然上述只針對離散生活面而言，交友對於兒童是一場艱辛的挑戰，但是對於成人而言，何嘗不是需要面對的課題嗎？凱蒂的父母與澄子的伯父和伯母，同樣地，有著的交友挑戰，以及其他日本移民族群也皆為如此。家人與朋友是個人在社會中支持度的重要網絡，缺少了其中一項，生活所面對的困窘只會增加，因為朋友在逆境能安慰、傾聽、分擔和幫助，讓自己有了喘息、恢復、最後重新出發。

最後，還是需要再次地審視身份一詞，即「身份牽涉兩個核心價值，即圍繞和衝擊個人的心理狀態和社會權力組織中」(Karner 71)。個人的心理狀態是有能力可以解決，但外在的社會權力只能選擇服膺其中的壓迫，這是兩本小說中都有呈現的狀況，也在前兩章都有進一步的討論。離散人在整個跨文化脈絡中，持續不斷得在尋找自我的身份和歸屬，在流動的身份改變中；而且離散特性與混體特質是兩個對立的型式，前者強調延續上一代傳承的集體文化身份，後者著重於個體的改變與流動，比起前者更加的開放與彈性，因此移民後裔在處與兩者交融的現實環境與狀態裡，成為和身為的限制影響了交友的情感歸屬，這對於日後兒童的人生觀與個性有顯著的後作力效用，或許是養成獨立自主的習慣，也許無法發揮團體合作的精神，或許這些衝擊建立起更堅韌的性格，也許有可能喪失許多的自信。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離散文化對兒童的生活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況且，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兒時回憶，而是一個複雜的兒時意識，讓讀者看到該大環境社會造就的價值觀，而澄子與凱蒂將如何進入如此的社會，如何體會和共享這樣的價值觀。

第三節 離散文化他者論述的啓示

《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的故事背景，因為時間與空間的差異，有著不同的離散移民軸線，以二次大戰事件為分界點，從作品中看見戰爭前、戰爭中與戰爭後的日裔美人，在不同階段的處境、遭遇與身份建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全球化人口大遷移的趨勢中，同樣的離散族裔議題，仍然以更廣泛的型式與意涵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國際媒體也曾經以族裔文化為主題報導，台灣的報章媒體，也時常大肆報導以外籍配偶為主的「新移民」，台灣男性以東南亞國家女性之間的跨國聯姻，由低發展地區嫁到高發展地區，呈現一種獨特的以女性移民為主的現象。在台灣，另一個已經紛擾多年直到今日，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議題依舊在政治版面不定時出現，特別是選舉時間一到，政治人物的出身背景就會再一次的搬上臺面，討論其背其景是否可以達成對台灣效忠的期待。從《閃亮閃亮》和《野草花》至「新移民」和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問題思考，其實可以看見一個共同點，即人類對文化多元的包容程度的發展與脈絡。

綜觀整個離散文化的軸線，他者論述一直深陷在刻板印象以及狹隘的觀念，對於實質的瞭解與認識，在目標上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不過，引發研究者四個大方向的啓示：

首先，多元和同化之間的身份尋找。回歸到小說文本的故事中，在處理離散文化問題時，日裔美國人，在兩個意識型態——主流社會的隔離與主流社會同化的兩端拉扯。第一代移民保有最多的原鄉文化，只為了能繼續在生活層面中與原鄉有一個穩定的往來互動與情感連繫，將此型態延續至第二代與第三代，儘管每一次的傳承都是減少與原鄉的密切程度，但是仍有著一定的影響；同時間，第一代與寄鄉的其他族群，特別是白人主流族群幾乎不互動往來，因為雙方彼此有意識的隔離對方與遠離對方。但另一方面，鼓勵下一代能更加適應新社會。第二代與第三代也漸漸在寄鄉文化的影響之下，放棄一些原有的認

同價值，進而接受主流團體的認同價值，也就是所謂身份接受到同化吸納效用，此過程產生了身份混體，更接近寄鄉土地上的人民，卻逐漸與原鄉的日本人不在雷同，甚至截然不同。也正因為這樣的跨文化身份，兩本小說中都可以見到許多移民者自身的許多矛盾和衝突出現，因此，文化差異在移民者身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得這樣的身份在發展上一直尋找定位點。

其次，文化價值的判準。因為移民的關係，在原有文化和寄鄉文化之間，看待各種文化差異的態度與包容不同。主要在於文化價值的立場與判準上有一套標準，因此在尊重與包容上就無法實際落實。但是哪些文化事物才是有價值，而得以獲得彼此的共同尊重與包容呢？這部份明顯在移民族群與主流族群之間，無法真正找到一個雙方皆認同的地方，原因在於，移民族群在遷移他鄉時，就已經擁有一套自己原鄉的文化價值，要全然拋棄而採納寄鄉的文化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對而言，主流族群自我擁有的文化價值來看待異文化價值，明顯會出現藐視以及不認同的意識型態，所以共同的文化檢視標準就落空了，或者造成價值混亂。

差異性在文化中是普及的狀態，但究竟有多少人，確實認識這差異所真正的表示之意呢？大部份的人面對差異都是抱以負面角度來看待，所以也就導致族群之間無法完全的融入相處。今天的美國和台灣，都是一個多元文化以及多族群共同生的國家，因此在文化價值的判準，不是建立何者是優，或是何者為劣的基礎判斷，而是共同成立文化的差異、樣貌的差異、語言的差異、溝通的差異、宗教的差異與習俗的差異等等各種差異一個決定條件的教育，即差異不等於次等，差異更不等於排斥。

再者，種族主義妨礙多元文化的發展。差異是文化的不同觀念分歧，此表現往往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種族主義所引發的族群衝突。美國的歷史永遠擺脫不了「黑與白」，台灣則是「二二八」，這兩段過去都呈現族群因為差異的分歧留下一道傷疤，付出慘重的代價。兩者都曾經歷過族群隔離的階段，經過不斷的抗爭和討論，多年的協調與努力已經降低了不少衝突的紛擾，但是還未完

全根除種族衝突的危機。雖然《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的角色與事件並沒有實際的種族衝突爆發，但是不平等的待遇與排他主義也是一種種族衝突所引發的情況，只是這一群日裔美人默不作聲的接受這樣的安排，而沒有導致暴力事件發生，所以不能否認的是，在這樣看似平淡的表象之下，種族歧視的心態和種族衝突的潛在仍然是屹立不搖，不論是政府、或者是民眾，這問題尚待更多的努力來解決。今天的社會中，回頭看看一次又一次的傷痛，現存的歧視與忽視是族群衝突的根源，是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另一波的衝突發生，在今日多元文化的氛圍中，可以喚起每位個體正視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的事實，從事實裡去學習與認識。

最後，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挑戰。如此看來，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與落實是刻不容緩，從年幼鼓勵寬廣的包容心態。在美國與台灣都有在推廣，從出版書籍的種類與內容可以觀察到，尤其是美國圖書館協會每年公佈的紐伯瑞得獎作品裡，都可見到許多以不同族裔背景的青少年小說作品。除此之外，每年也有不同族裔為移民主題的繪本讀物的出版，這顯示了美國對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

台灣近年來也引進不少相關書籍，以及將國內本土的多元教育帶進九年一貫體制中，包括原住民母語、閩南語、客家語等等的教授，而不是單一的普通話或者中文。只是這語言的教授和溝通文化的差異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這些課程的安排只是冰山一角，而且還是以中文使用為主要，這會依據學生的民族、階級、文化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成效。

母語是一種文化的根基，而母語的教育是在幫助學生對自己原有的文化一種維護和認識，但是這些母語無法於其他學科課程中使用，對於一些科學名稱與符號無法解釋，也因為每一種語言的溝通方式與語言結構的不同，都會影響學習的效果。而且上段所提及的美國多元文化教材與書籍，基本上也都皆以英語書寫，固然是一個宣導認識的管道，但是讀者們是否真的瞭解其中的意義，則又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此外，這些書籍的主要指涉讀者是白人族裔的

孩童與少年，那對於其他少數族裔族群的孩童們，這些書籍又會產生那一些影響呢？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從白人書寫的角度去認識自己原有的文化與語言，這肯定不是真實的(authentic)實際情況，甚至強化了刻板印象，終究語言的轉換和作者的背景，都因為意識型態的差異，而新增另一層次的詮釋與建構，這樣的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當中。儘管有不足之處，但是對於文化教育的推廣，還是盡了一份值得讚賞的努力。

經由上述的分析整理，可知道《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的價值，除了相關的移民故事，更在文本中傳達了多元文化發展的起因題材，讓小說不再是簡單的故事，還能讓讀者增添對自己的文化與他人的文化的瞭解，以獲得自己未親身體驗的跨文化的移民經驗。

辛西亞·角畑的日裔美籍的身份書寫日本人在美國的移民生活是反映過去的生活經驗與狀態，回歸到真實面，正是如此的真實感，讓讀者在除了閱讀的樂趣之外，還能觸動心坎，跟隨著凱蒂與澄子一頁接著一頁認識她們的窘境；也是如此的真實感，在細膩的敘寫中刻劃了生命的起伏和現實，更突顯了離散的無根的浮萍。

「離散」只是兩本小說的一小部份，「離散」只是研究者選擇探討的一個層面，「離散」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透過文學的永恆價值，不單單是一個表象的呈現，是透視整個故事背後離散的真實和離散對作者的價值影響，讓忽視許久的一種人生觀搬上臺面，讓世人聽聽這一層被遺忘的聲音。

「離散」更是一種人生態度，啟發心靈和揮灑理念，使得這些啟示與價值讓讀者得以產生共鳴和學習洞悉人生。離散人的一生，應該就像《閃亮閃亮》的書名閃閃發亮，也如同《野草花》一般，不論在如何惡劣的環境中，都可以百花綻放。

註 解

- ¹ 關於離散比喻稱號細節，請參閱，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Theorizing Diaspora* (Oxford: Blackwell, 2003)，頁 2-7。
- ² 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原則與行動，基本上是政治策略與民族情感結合，人民對民族政權的忠誠勝於一切。更多的民族主義細節，請參閱，洪鑣德。《民族主義》。台北：一橋出版，2003，頁 25-42。
- ³ 跨國主義是強調全球人民之間的相互聯繫與活動，而不再局限於國與國間的地域界線劃分，於政治、經濟流動等方面影響全世界的人民。更多的跨國主義細節，請參閱，Thomas Hylland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Pluto, 2002)，頁 159-156。
- ⁴ 移居基本上就是一個人離開原來的國家地區，定居在另外一個國家。更多的移居細節，請參閱，Steve Fenton, *Ethnicity* (Cambridge: Polity, 2003)，頁 115-124。
- ⁵ 關於更多霍米巴巴的混體論細節，請參閱，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頁 145-174。
- ⁶ 關於西方和東方想像世界的內容細節，請參閱，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王志弘等譯。台北：立緒文化，1999，頁 69-102。

引用書目

英文書目

- Abdel-Hady, Dalia. *Immigrant Identities, Communities and 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The Lebanese Diaspora in New York, Montreal, and Paris*. New York: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4.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raziel, Jana Evans, and Mannur, ed. *Theorizing Diaspora*. Oxford: Blackwell, 2003.
- Braziel, Jana Evans, and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Theorizing Diaspora*. Ed. Jana Evans Braziel, and Mannur. Oxford: Blackwell, 2003. 1-22.
- Chow, Rey.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obie, Ann B. *Theory Into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Boston: Thomson Learning, 2002.
- Eriksen, Thomas Hylland.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Pluto, 2002.
- Fenton, Steve. *Ethnicity*. Cambridge: Polity, 2003.
- Fuhrer, Urs. *Cultivating Mind: Identity as Meaning-making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Fukao, Noriyasu. *A Study of Ethnic Identity of Japanese Americans: An Approach from Japanese Christian Church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 Hall, Joan Kelly.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2.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Theorizing Diaspora*. Ed. Jana Evans

- Braziel, and Mannur. Oxford: Blackwell, 2003. 233-246.
- 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Joseph, John E.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Kadohata, Cynthia. *Kira-kir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 *Weedfl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 Karner, Christian. *Ethnic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Lowe, Lisa. "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rking Asian-American Differences." *Theorizing Diaspora*. Ed. Jana Evans Braziel, and Mannur. Oxford: Blackwell, 2003. 132-155.
- Mannur, Anita. *Culinary Spaces: Contesting Food, Gender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and Its Diaspora*.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2.
- McGillis, Roderick, ed. *Voices of the Oth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 McLemore, S. Dale, and Romo.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2005.
- Ohnuki-Tierney, Emiko.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pencer, Stephen. *Race and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中文書目

-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1995。
- 生安鋒。《霍米巴巴》。台北：揚智文化，2005。
-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2000。

阿瑟·施勒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美國的分裂：種族衝突的危機》。

台北：正中書局，1994。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擎松圖書，2003。

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閃亮閃亮》。張子樟譯。台北：東方出版，

2006。

林文寶。〈台灣兒童文學〉。台東：東師兒文所，1999。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台北：前衛出版，2006。

洪鑣德。《民族主義》。台北：一橋出版，2003。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7。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東方主義》。王志弘等譯。台北：立緒文化，

1999。

